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30

2023/4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一、参考主题

- (一)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三) 统一战线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五) 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 (六)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 (七)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研究
- (八)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九)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视角研究
- (十) 统一战线(含各领域)研究述评

##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作者向我刊投稿，视为同意将文稿的汇编权、发行权、翻译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我刊。

## 三、基本要求

对符合如下基本要求的稿件，我刊优先审稿，审稿通过后优先刊用。

(一) 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鲜明体现大统战视角。

(二) 立题。问题提出部分要有精到、深入的文献综述，能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一般不少于10条。

(三) 结构。论证框架合理，论文一般应有一二级标题，结构有相当的系统性。各级标题能够明确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思路，内在逻辑严密。行文善于运用主题句、观点句。

(四) 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引文差错（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和参考文献著录信息）；无逻辑错误；坚持学术化表达和学理化阐释。

(五) 体例。论文须包含规范的题目、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著录及作者有关信息。参照《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和我刊已出版论文体例进行撰写和排版。

(六) 篇幅。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宏富，优秀论文不限篇幅。

(七) 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不高于15%。请作者慎重投稿：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八) 审稿周期。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欢迎作者通过投稿邮箱直接向本刊编辑部咨询有关情况。联系电话：(023) 62874725。

(九) 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 关于我刊。微信公众号：tyzxxjy，全刊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 年第 4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罗振建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林华山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4期（总第40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7卷

##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01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  
与路径选择 / 钱再见 高晓霞
- 10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  
/ 谢 静
- 18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功能、难点与优化  
/ 曾祥明 徐华晴
- 27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 陈章喜 邓 彪
- 39 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  
/ 严安林 洪志军
- 4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 陈云云

### 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 60 “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薛庆超
- 80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 田凯华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 90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 于颖
- 100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 曹一飞

###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 110 美国对华认知战：动向、影响与应对 / 郭永虎 张函语
- 124 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与中国应对  
/ 罗昕 张骁
- 134 ChatGPT：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转向及后果 / 曹克亮

###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145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 张威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3 No.4(Sum No.40) Vol.7

---

- 01 From "Important Magic Weapon" to "Powerful Magic Weap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Path Selection of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Qian Zaijian&Gao Xiaoxia
- 10 Building Digital Governance Alliance: the Concept Re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Network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Xie Jing
- 18 The Functions,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United Front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eng Xiangming&Xu Huaqing
- 27 Hong Kong's Func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Chen Zhangxi&Deng Biao
- 39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or Promoting and Realizing National Unity Yan Anlin&Hong Zhijun
- 49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ntribution for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ork Chen Yunyun
- 60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the Opening up of a New Realm of Marxism in China—from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ue Qingchao
- 80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Strategic Funct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ian Kaihua
- 90 The Germinal Logic, Unique Connotation and Great Value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Yu Ying
- 100 From New Culture to New Civilization: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pproach of the Subjectivity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Cao Yifei
- 110 U.S.–China Related Cognitive Warfare: Trends, Impacts and Responses Guo Yonghu&Zhang Hanyu
- 124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merican and Western Cognitive Warfar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hina's Response Luo Xin&Zhang Xiao
- 134 ChatGPT: The Robotic Turn of the Ideologist and Its Consequences Cao Keliang
- 145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feres in Xinjiang Affai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Zhang Wei



#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钱再见<sup>1</sup> 高晓霞<sup>2</sup>

(1.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统一战线与治理现代化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审计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的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把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从“重要法宝”升华为“强大法宝”，具有内在依据。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论述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提法调整或者“概念升级”，而是对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战略定位更加重要、战略作用更加突出的理论反映和实践要求，突出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法宝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包括大统战结构、同心圆结构、共同体结构在内的圈层结构。这种圈层结构使统一战线展现出更加强大的治理功能，包括元治理功能、民主治理功能、全球治理功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强大法宝作用，要把准政治方向，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加强党的领导；嵌入国家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坚持守正创新，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关键词:** 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强大法宝；圈层结构；治理功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4-0001-09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4.001

**作者简介:** 钱再见，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统一战线与治理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高晓霞，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完善和效能提升研究”（20ZZA001）

**引用格式:** 钱再见，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1]</sup>这一重要论断提出后，学界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有研究认为，“强大法宝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体现<sup>[2]</sup>，是深刻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sup>[3]</sup>。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协调政治秩序与促进发展的强大法宝<sup>[4]</sup>，不仅是概念升级<sup>[5]</sup>，而且是对统一战线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和认识的再提升<sup>[6]</sup>；新时代统一战线发挥强大法宝功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sup>[7]</sup>。国外已有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展经历了从策略到战略再到思想意识的转变<sup>[8]</sup>；统一战线远不只是策略，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而“几乎是本能的思维方式”<sup>[9]</sup>。晚近以来国外一部分学者的研究中掺杂了较多的意识形态因素，甚至充满误解、偏见和仇视，将统一战线看作中共“锐实力”的组成部分，诬称其为“自我毁灭的秘密武器”<sup>[10]</sup>，甚至把统一战线法宝说成是所谓“社会控制工具”“秘密武器”<sup>[11]</sup>。他们也看到，统一战线不仅是概念性的、工具性的，而且是制度性的<sup>[12]</sup>。阐释对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正确认识，反驳对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错误认知，都需要加强对统一战线战略定位问题的学理分析。

为进一步加深对统一战线战略地位从“重要法宝”跃升为“强大法宝”内在逻辑的理解，本文对统一战线“法宝论”的形成与发展、强大法宝的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探析。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的科学概括与理论升华，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新时代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是更高的战略定位，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价值。统一战线内在的圈层结构决定了其具有更加强大的治理功能。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是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功能的必由之路。

## 一、统一战线“法宝论”的形成与发展

统一战线“法宝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的科学概括与理论升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深入推进，统一战线“法宝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 （一）统一战线“法宝论”的形成

统一战线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问题是解决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努力争取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sup>[13]</sup>，指明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一般原理和根本原则。1922年，党的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调整了党的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主张，并且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战线”<sup>[14]</sup>。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为开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促成了1924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政党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5年，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



钱再见, 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9.

工农联盟问题。1935年12月25日,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直接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1939年7月9日, 毛泽东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学讲话。他说, 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 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sup>[15]</sup>。1939年10月, 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三个主要的法宝。”<sup>[16]</sup> 毛泽东关于“三个主要的法宝”的论述, 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思想的形成<sup>[17]</sup>。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即开始从组织上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机构建设, 1939年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此外,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1940年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 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且占有一定比例确立了原则和保障, 坚持以民主新路和民主的制度建设跳出历史周期率。1940年4至6月, 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被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九个方面之一, 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的重要论断。

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充分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视为法宝, 是因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 而不是什么“秘密武器”。

## (二) 统一战线“法宝论”的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强调指出, 统一战线有其策略性, 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1979年10月19日, 邓小平在谈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时明确指出: “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不是可以削弱, 而是应该加强, 不是可以缩小, 而是应该扩大。”<sup>[18]</sup> 新的历史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从而大大拓展了统战对象的范围, 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2000年12月4日至6日, 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 指出: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 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 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sup>[19]</sup>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重要法宝, 也是党的一个政治优势和一项长期方针, 必须不断加强, 从而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在2006年7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 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的论述, 即“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sup>[20]</sup>。2012年11月8日,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 “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sup>[21]</sup> 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思想首次写入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 党中央十分重视统一战线这一战略策略问题, 强调统一战线不仅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而且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 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向政治联盟的转型, 为统一战线彰显法宝地位和作用开辟了新空间。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重要法宝,

既是一个政治优势，也是一项战略方针，需要从战略上谋划，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落实。统一战线法宝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战略性，需要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 （三）统一战线“法宝论”的升华

新时代以来，党对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2014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追求的团结，是广泛的团结，也是坚强的团结，是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团结。”<sup>[22]</sup>统一战线的团结目标是有丰富内涵的，彰显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战略定力和法宝功能。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sup>[23]</sup>人心和力量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问题，其解决必须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从而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不断走向新的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sup>[24]</sup>。《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对统一战线的定位：“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sup>[25]</sup>对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战略定位的新表述更加突出了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sup>[26]</sup>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强大法宝”的重要论断。

新时代以来，党对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进行充分的实践探索、制度创新和理论总结，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论述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提法调整或者“概念升级”，而是对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战略定位更加重要、战略作用更加突出的理论反映和实践要求，突出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法宝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 二、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战略定位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各个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具有“三个更加重要”的战略价值。其圈层结构包括大统战结构、同心圆结构、共同体结构，内在地决定了其具有更加强大的治理功能，包括元治理功能、民主治理功能、全球治理功能。

### （一）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战略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离不开统一战线去团结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

钱再见, 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9.

苦奋斗的精神<sup>[15]</sup><sup>55</sup>。2016年11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 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 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sup>[27]</sup>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统一战线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其一, 从国际局势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为突出, 形势更为严峻。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其二, 从战略全局来看,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需要把各方面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 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任务更加艰巨。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其三, 从社会结构来看,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快速发展, 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赋予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新的历史环境, 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地位孕育出更大的战略价值。

## (二) 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圈层结构

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结构是指统一战线作为政治联盟的构成要素、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包括主体结构、对象构成、活动范围等方面, 具有典型的圈层特征。

其一是大统战结构。“大统战”既是一种战略思维, 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和工作格局。大统战是对应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战略性思维、全局性视野和制度性安排, 目标是推动全党都来重视做好统战工作,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sup>[28]</sup>, 最大限度地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提出, 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sup>[25]</sup><sup>8</sup>。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八条原则之一, 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 也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战略方针、发挥凝心聚力政治优势的重要保证。在具体实践中, 大统战工作格局是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结构性问题、形成统一战线工作合力的内在要求, 主要由领导体系、工作体系、协同体系等方面构成, 致力于形成和完善“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内外互通”的统一战线组织运行体系。

其二是同心圆结构。同心圆既是统一战线的结构特征和政治格局, 也是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和制度安排。统一战线作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 强调的是在多样性的现实中达成广泛共识, 强调“求同存异”; 同时, 强调在一致性中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 承认“和而不同”, 凸显政治联盟的包容性。在同心圆政治格局和同心圆制度安排中, 同心是共同的政治基础, 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而共识则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基础在重大问题上不断达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动方向, 即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 在目标上同心同向, 在行动上同心同行。统一战线的核心和根本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统一战线就是要不断巩固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政治基础, 在发扬民主包容差异的合作中画出最大同心圆。其目标则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当然, 必须要认识到的是, 同心并不意味着同化, 同心也是指“和而不同”。在利益分化的多元社会中所能够达成的共识, 实际上是一种“最大公约数”。同心强调的是坚守政治底线, 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的“清一色”或者排斥多样性, 而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是在多样性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统一战线“同心

圆”源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具体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其三是共同体结构。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自然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处理不同政治社会力量的关系，通过思想引领、政治吸纳、民主协商、公众参与，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以思想共识、共同利益把各种主体紧密连结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统一战线的共同体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在国内先后通过阶级联盟、政治联盟的组建，把各阶级阶层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统一战线工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围绕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在国际层面，统一战线坚持“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色，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中始终致力于实现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努力扩大国际友好伙伴圈、朋友圈，构建新型国际统一战线。

### （三）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治理功能

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结构的立体性决定了其所能发挥功能的多样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治理功能主要包括元治理功能、民主治理功能和全球治理功能。

首先，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元治理功能。从治理理论的视角来看，风险社会、问责困境和治理失灵背景下出现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正是需要政治权威出场并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sup>[29]</sup>。点多面广既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大特点，也是统战工作的难点和风险点。面对来自资本逻辑渗透、交往理性虚化、数字社会“去中心化”等方面的多重挑战<sup>[30]</sup>，只有坚持大统战战略，增强大统战意识，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才能切实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体现在统一战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之中，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强大法宝作用。

其次，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民主治理功能。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实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探索的经验结晶，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新型民主模式，是中国式民主对西式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治理功能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不仅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制度载体。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重要理念和制度特色，有利于团结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具体说来，统一战线在参与式治理过程中推进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落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再次，统一战线强大法宝的全球治理功能。统一战线共同体结构的功能特质主要体现在参与性、

钱再见,高晓霞.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1-9.

交互性、秩序性、共生性、能动性等方面。其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三个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也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凝心聚力强大法宝功能的具体体现。同时，统一战线要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之中，促进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政治中的对话协商，维护全球秩序稳定和公平正义，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和合作共赢，坚决反对世界上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和强权政治行为。

### 三、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路径选择

充分发挥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首先要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加强党的领导，把准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同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此外，要进一步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 （一）把准政治方向：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加强党的领导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sup>[31]</sup>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政治性是统战工作的第一属性。大统战要求在元治理意义上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思想政治引领，在整体性治理意义上加大制度建设力度，运用数字治理技术赋能大统战工作，在参与式治理意义上加快队伍建设步伐，从而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同时，要树立大统战思维，增强大统战意识，进一步明确统战部门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各项责任和具体任务，着力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统一领导体制、牵头协调体制、各负其责体制，建立健全保障大统战工作格局有效实施的教育培训机制、监督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 （二）嵌入国家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统一战线要解决的是政治上的“人心”问题和治理中的“力量”问题，其所发挥的价值功能说到底就是凝心聚力的强大法宝功能。凝心聚力作为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和工作要求，也是统一战线的价值目标和基本功能。在“人心”与“力量”的关系中，“人心”是第一位的，是“力量”源泉也是其发挥正功能和“向心力”作用的根本保证<sup>[32]</sup>。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政治使命主要是在同心圆的意义上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凝聚最大的政治共识，即谋求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功能主要在于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永恒主题，推动多元共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同心圆与共同体的关系中，同心圆强调的是同心基础上的领导，共同体凸显的是共识条件下的合作和聚合。国家建设的首要前提是如何使存在于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内的人们聚合成为国家能够确立其上的人民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与生俱来地具有双重使命，一是增强党的力量，巩固党的领导；二是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协调与国家整合<sup>[33]</sup>。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建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鲜明特色。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面向世界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要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建设中发挥强大法宝功能作用。

### （三）坚持守正创新：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是新时代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功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既要依据统战理论规律，又要掌握统战方针政策，准确把握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的根本要求和使命任务，进一步健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同时，要基于共同体理念，增强共同体意识，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工作的治理功能和整体合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统一战线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统战工作也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sup>[34]</sup>，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用活用好“海龙王的法宝”，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 四、结语

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战略定位，具有“三个更加重要”的战略价值。统一战线战略定位从“重要法宝”上升为“强大法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理论认识达到新水平。统一战线强大法宝地位源于其大统战结构、同心圆结构、共同体结构等圈层结构形成的强大治理功能。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不断适应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需要，将全面发挥出强大法宝功能。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舒启明.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N]. 光明日报，2022-11-04（6）.
- [3] 王小鸿，胡国喜. 统一战线百年历史经验 [J]. 群言，2023（3）：10-13.
- [4] 郭道久，郝若雯. 统一战线：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心基础的强大法宝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3）：14-24.
- [5] 许奕锋. 浅谈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N]. 人民政协报，2023-04-26（12）.
- [6] 孙信. 统一战线是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J]. 东岳论丛，2023（2）：145-151.
- [7] 路璐，李小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13.
- [8] Van Slyke, Lyman P.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70（3）：119-135.

钱再见, 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9.

- [9] Van Slyke, Lyman P.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57.
- [10] Groot, Gerry. “A Self-Defeating Secret Weapon?The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f Corporatism on United Front Work”. In Jennifer Y.J. Hsu, Reza Hasmath (eds. ) *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 Adapti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47-67.
- [11] Brady, Anna-Marie.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M]. 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 2017.
- [12] Yoshihara, Toshi. Evaluating the Logic and Method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J]. *Orbis*, 2020 (2): 230-248.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07.
-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2021: 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29-130.
- [16]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6.
- [17] 陈喜庆. 关于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新时代法宝作用的几个问题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4): 4-12.
- [18]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03.
- [19]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43.
- [20]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 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解答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6: 9.
- [2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年11月8日) [N]. 人民日报, 2012-11-08 (1).
- [22]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31日) [N]. 人民日报, 2014-01-01 (3).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6.
-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2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1: 5.
- [26] 李桂华, 孟雅睿. 中国政党协商制度生成与发展: 从“座谈”到“制度”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1): 31-38.
- [27] 习近平.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11月11日) [N]. 人民日报, 2016-11-12 (2).
- [28]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29] 钱再见, 汪家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政治权威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J]. 行政论坛, 2018 (3): 39-48.
- [30] 孙冲亚, 何祥林.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统一战线: 功能、挑战及其进路 [J]. 理论月刊, 2021 (7): 51-58.
- [3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03.
- [32]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68-76.
- [33] 林尚立. 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4): 1-6.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39.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 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

谢静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对社会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导致网络统战的理论与实践均与几乎全民皆网的“数字化生存”相脱节。新时代，网络统战迎来理念重构、机制创新的新契机。在理念重构方面，当以网络所代表的新时代之“新”观照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构建网络统战新理念。网络统战首先应该是网络社会中的统战，是借助网络技术构建新的关系连接网络的实践形式，即不断建立连接的过程。在实践创新层面，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探索网络统战新机制——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一是要深度介入治国理政，体现强大法宝价值；二是要促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变革与转型，提高治理体系的“弹性统合”能力；三是要加强执政党联结社会的能力（连接力），提升政党嵌入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在上述两个层面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的基本原则。首先，在治理过程中建设统战网络，通过治理实践孵化治理联盟。其次，在培育治理联盟连接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在打造治理联盟的基础上，发展政治联盟。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具有场景化、事件化、复合化等基本策略和可行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网络统战；统战网络；治理联盟；弹性统合；社会连接力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010-08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4.002

**作者简介：**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

**引用格式：**谢静.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 [J]. 统一战线学  
研究, 2023 (4): 10-17.

谢静.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 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17.

2022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 走好网络群众路线”<sup>[1]</sup>, 对已推进近20年的网络统战理论和实践均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统战是新时代统战事业的新领域、新方向, 不仅是应对新时代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新变化、新现象的新举措, 更是重构统战理念、创新统战机制的新契机。2005年, 中央统战部提出“网络统战”概念和思路,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之一, 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把网络统战与党的群众路线相融合。可见, 从概念的提出、实践的摸索到理论的拓展, 网络统战一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网络技术迅猛发展, 对社会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但长期以来, 由于我们对此认识不足, 导致网络统战的理论与实践均与几乎全民皆网的“数字化生存”相脱节。因此, 结合新的形势和要求, 总结近20年网络统战实践, 构建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论框架,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统战机制, 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 网络统战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针对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这里的“网络人士”主要包括两类人群, 即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前者主要是指在新媒体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以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后者则是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群。实际上, 这两类人群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在统战实践中, 新媒体从业人员往往依据工作场所和性质来确定; 而网络意见人士则因身份庞杂, 其确定缺乏统一标准, 主要通过订阅量、阅读量等间接指标予以确认。网络统战的第二个领域则是将网络作为常规工作的辅助性工具, 在传统统战工作中引入和使用网络传播技术。该领域针对的是全体统战成员而非特定群体, 比如运用网络技术开展联情联谊、召开会议、开展宣传等活动, 属于典型的“+互联网”思路, 并未真正赋予新时代统战工作以新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机制。

针对网络统战实践, 近年来亦有少量研究、总结, 尤其是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之后, 有刊物集中发表相关文章, 探讨网络统战的基本概念、工作方式、工作路径等。但一方面, 许多研究流于一般的评析, 缺乏网络传播、社会治理等相关理论的支持, 未能真正从理论上阐释、分析网络统战的本质和价值; 另一方面, 大多数讨论缺乏具体的经验材料, 流于空洞的能指游戏, 缺乏可操作性。概言之, 目前有关网络统战的实践和研究存在三个方面不足: 一是仍然沿用传统的、固定的手段和方式来标识和确认网络人士, 局限于特定身份群体, 与网络高度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不相适应, 未能真正体现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时代特性; 二是局限于可见的网络技术使用, 未能真正理解网络逻辑, 未能从“网络改变社会”的角度考察网络对于统战工作的深层次影响; 三是统战对象与统战工具两个领域相互割裂, 并未把网络人士及其技术和人脉资源系统性地嵌入日常统战工作之中, 更没有从中发展出具有创新价值的新机制和新思维。

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创新与发展。鉴于此, 本文立足于时代特征和战略高度, 从以下两个层面深入探讨网络统战的内涵与价值: 一是理论层面, 以网络所代表的新时代之“新”观照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构建网络统战新理念; 二是实践层面, 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之“高”探索网络统战新机制——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在上述两个层面讨论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场景化、事件化、复合化等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的基本策略和可行路径。

## 一、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以网络逻辑构建统战网络

网络不只是传递信息的新工具，也不只是新经济形态，更是新的发展方式，进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在信息技术刚刚兴起的年代，人们主要从产业与经济形态方面理解信息的价值和影响，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信息社会”<sup>[2]</sup>概念即为典型。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全面应用，信息化已经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演变为“信息主义”。美国社会学者卡斯特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将信息技术纳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加以考察，把信息主义看作接替工业主义的新发展方式，具有不同的基础结构和运作原则。也就是说，在信息主义视野下，网络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建基于全新的底层逻辑，即网络逻辑。“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sup>[3] 434</sup>

从信息主义视野下新的社会形态来理解网络，意味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关系结构的诞生与发展。与工业社会形态相比较，网络社会更趋于形态化，也更具有动态性：无论人、事、物，能否被连接而成为网络节点，是其现身于社会的关键；而且，连与断的努力，以及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联，持续地型塑着网络社会的拓扑形态。也就是说，网络社会的具体形态取决于节点连接的过程与结果。动态性、连接性是网络逻辑的核心所在。

由此观照，网络统战首先应该是网络社会中的统战，是借助网络技术构建新的关系连接网络的实践形式，即不断建立连接的过程。因此，新时代的网络统战理论，首先需要从网络时代的社会形态变化入手，以网络逻辑为依归，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研究当前的网络统战实践，探讨这些理论问题：网络社会中的个体政治身份和联盟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给统战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应对挑战的工作理念、可能性路径有哪些？笔者早前曾撰文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的新变化，提出“数字统战”的观点，即统一战线需要适应数字时代的到来，统一战线发展和工作创新应在形态意义上深入认知和前瞻布局“数字统战”，要在身份识别与认同、利益表达与协商、集体行动与组织等方面做出创新突破，以实现政治联盟的新型建构<sup>[4]</sup>。这些理念层面的改变还需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探讨、深化。为此，笔者进一步提出建基于网络逻辑的“数字化治理联盟”新概念，作为新时代网络统战的实践路径和运作机制，以期推进有关数字统战的研究。

**建基于网络逻辑的数字化治理联盟凸显了数字时代统战工作需要把握的两大特征：第一，以更加动态、灵活的方式界定网络人士、网络群体，突出其连接性、群体性；第二，将网络统战工作的任务和目标视为构建广泛的“统战网络”的过程而非结果，体现统战工作在网络社会形态下流变不居的特性。**如果说传统的统战对象大多依据身份群体来抽象归类，那么网络统战则更突出连接性，以构建具体连接的统战网络为目标。而治理联盟正是治国理政战略高度下，统战网络最重要、最关键的现实领域。数字化治理联盟应是在社会治理中实际合作而具体连接的统战网络，并且随着合作状态而不断改变关系形态。

如前所述，当前的网络统战工作主要针对两类人士，且主要以经济指标、流量指标等外在、客观标准加以界定、确认。如果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下，从本体特征来界定工作对象是一种较

为便利、可操作的方法,那么,在流动性、复杂性大大增加的网络社会,这种方法已经越来越困难。如刘志礼、李佳隆所述,网络人士群体样态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内部成员整体重构”和“代表性优化”的特点,需要不断调查研究以把握其具体构成与变化特征<sup>[5]</sup>。相比流动性导致的确认困难,在实践中更常见的问题是忽略其群体性特征,只是将网络群体看作符合某些经济或流行特征的特定类别,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并非真正的群体。而网络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构建群体的连接,网络技术不仅能帮助既有的社会群体更有效地连接起来,还催生了大量虚拟社群<sup>[6]</sup>及其连接。因此,只从个体而非类群来界定网络人士和网络群体,并不能真正体现网络逻辑的现实意义。变化的个体、流变的关系,需要转变对网络群体的理解与界定,即需要从关系(连接)而非本体(客体)去理解和把握网络统战的工作对象。也就是说,当某一个体在特定关系网络(由连接而形成的网络)中凸显时,即可将这—个体及其所在群体视为目标对象。当然,这种连接须与核心工作相关,即某种程度上涉及治国理政的战略大局。

网络社会的流动性导致的身份辨识与确认困难进一步提示我们,与其被动地等待所谓网络人士或群体的出现,不如主动出击,通过网络统战促进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连接,打造符合目标的网络群体,并在群体中凸显具有影响力的网络人士。有的研究在解读网络统战时,提出了“统战网络”的概念,强调统战工作乃“做人的工作”<sup>[7]</sup>。不过,该文并未展开讨论:为什么做人的工作就形成了网络?我们知道,个体化的工作无助于网络的形成。从网络传播理论来看,只有真实的互动才能建立连接、形成网络。传统的统战实践是将独立的统战对象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凝聚成特定的团体,并相应开展一定的群体性活动。在传统沟通技术条件下,因为“建群”相对困难,这种团体对个体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当前新的网络技术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群体性交往,导致各类网络群体爆发式增长,而传统的组织团体模式则由于缺乏群体形成所必需的密集交往、强烈情感共鸣等特征,渐渐丧失了群体性。因此,借助网络技术构建关系密切的连接成为当前网络统战的新任务。这种借助网络统战而生成的统战网络,不仅是新兴的同盟者,而且因为其真实的连接而更加具有超越个体的力量,能够在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加主动、倍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网络逻辑背景下新的社会形态中的网络群体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其成员身份标识未必十分明确,群体边界也不一定十分严格,身份与边界既可以重叠,也可以流动,成为网络社会的新型动态关系的基本特征。

## 二、网络统战的机制创新: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

构建统战网络对网络统战工作的应变性、机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没有适当的着力点和实施方向,恐令人无所适从、无处下手。为此,基于网络逻辑的网络统战需要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探索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的实施路径,为网络统战的机制创新提供具体思路。作为网络社会形态背景下统战网络的具体形式,数字化治理联盟的构建应当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创新突破基点:第一,深度介入治国理政,体现强大法宝价值;第二,促进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变革与转型,提高治理体系的“弹性统合”能力;第三,加强执政党联结社会的能力(连接力),提升政党嵌入社会的深度和广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sup>[8]</sup>。这一表述点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难题——规模困境：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幅员辽阔，需求多样，状态复杂。传统中国因为资源不足、能力有限，只能通过“简约国家”<sup>[9]</sup>、采取“双轨制”进行社会管理，以“观念一体化”来驱动“松散关联”的组织形态<sup>[10]</sup>。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通过强化组织整合力，提高了国家凝聚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社会进入网络时代，这种规模困境将与新的问题结合，比如“风险社会”的整体性危机<sup>[11]</sup>、复杂社会的“不确定性”问题<sup>[12]</sup>等，对国家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加强基层治理、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层社会作为特殊的“节点”，一方面处于政府组织体系的上下结构联结之中，另一方面连接了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关键的枢纽。但是传统的“板结状态”造成的“单向结构”，使其不能完成当下的治理需要<sup>[13]</sup>。有学者将当前基层治理的种种困境总结为“普遍信任”不足，“治理不足”与“治理过度”并存，结构性传导阻滞，自治能力难以提升等<sup>[14]</sup>。规模困境和基层治理难题，都集中反映出传统治理体系的“沟通性”障碍，即科层制组织的纵横沟通不畅以及组织内外的沟通阻滞，在应对复杂性、流动性上呈现先天不足。

针对基层治理的上述难题，有学者认为应当解决两个相互影响的问题：一是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二是构建起“纵向的秩序协调机制”，最终“建立一种纵、横结合联动的秩序整合新框架和新规则”。基于这一认识，该学者特别强调：“有必要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情境下政党的组织优势和富有弹性、黏合力的政党运行机制”，因为党建具有体系整合、政治引领和组织支持等战略意义<sup>[15]</sup>。另有学者在分析当代超大城市治理时，也提出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实现“统合性治理”<sup>[16]</sup>。这些建议突出了党建的引领作用，也在区域化党建等新的领域看到了政协合作的新可能性。不过，我们尚需进一步讨论和回答下面这些问题：党建如何实现富有弹性的统合？如何在保持政治核心的同时扩展社会连接？笔者认为，这正是统战大有可为的地方。正如成伯清所说，当前社会组织的统战工作，强调党建引领较多，关注统战作用不足，“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必须将之与发挥社会组织更大的统战作用联系起来，借此夯实大团结大联合的社会基础”<sup>[17]</sup>。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正是在党建的引领作用之下进一步实现“弹性统合”的重要机制。

如果我们将网络统战上升到“元治理”的高度，则完全有望破解当前基层治理中的有关困境和难题。元治理是治理体系对于自身结构和运作的不断调整、优化，是一种自我治理。“元治理活动特别关注社会要素（主体）及其关系不断建构和重构。”<sup>[18]</sup>网络社会形态下，网络统战借助新的网络传播技术，在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框架下，通过深入探索和破解困扰基层治理体系的纵横沟通问题、阻碍体制内外合作和信任问题等，在参与治理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打造具有一定可见性和稳定性的数字化治理联盟，成为“弹性统合”的组织与制度基础。由是，依靠党建引领和统战联合，实现复杂社会所需要的整体性治理<sup>[19]</sup>、敏捷治理、韧性治理<sup>[20]</sup>，能够真正发挥统一战线在治国理政战略大局中的强大法宝功能。

通过网络统战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不仅有望促进治理体制的创新，而且能够推动统战工作自身的革新与发展。有研究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历史时确认了两种范式：经典的“敌友我”范式和新型的“共同体”范式。“共同体”范式“把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政

谢静.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17.

治基础之上的所有同盟者都视为‘自己人’，着重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功能，着力于构建全民族的命运共同体”<sup>[21]</sup>。这一共同体范式体现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这里所提出的通过网络统战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主要是以共同体范式为基本框架护航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治理联盟不强调观念的统一，也不强求情感的认同，而是在解决现实的、具体的治理难题的过程中，形成最大公约数的连接与联合，真正把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sup>[22]</sup>。

更进一步，数字化治理联盟的构建还有助于加深政党嵌入社会的深度，更为有效地连接国家与社会。与西方的“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不同，我国的社会曾经发育不全，呈现出“组织化社会”<sup>[23]</sup>或者“总体社会”的状态，党、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三位一体的“一元格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的兴起，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和社会的“三元关系”<sup>[24]</sup>，而协作互动则成为“三元关系”的新命题。网络统战如果能够通过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筑起紧密连接、动态互动的沟通机制，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政党赋予新的价值，也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样本。

### 三、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基本原则与实践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在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下，统战工作的实践涉及的是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问题。不过，从政治联盟的角度出发，以往关注较多的是人心的凝聚，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力量汇聚的技术与方法，而这正是网络统战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数字化治理联盟力图在汇聚力量的基础上凝聚人心，通过大联合促进大团结。

团结与联合，是统战领域二重性的表现，也是社会领域二重性的反映。有学者曾从社会性和公共性来分析社会的二重性，认为它们分别由连结和团结所产生。社会性是指每个人无论出于何种需要，“都必须与他人发生接触和交往”的属性，人与人之间总是会产生某种连结，这种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属性类同，而是依靠具体的接触和交往而实现的实在关联。公共性则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团结。在现代网络社会的开放、流动和分化之下，连接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凌乱，公共性需求越来越强却越来越难于整合。因此，“怎样以社会性演生公共性，又以公共性超拔社会性，从而促进社会性与公共性的互动共生，实现从连结到团结的良性递推，就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根本挑战”<sup>[25]</sup>。

把连结与团结看作一种递推关系，正是网络统战构建数字化治理联盟实现从联合到团结发展的逻辑依据。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的如下基本原则。首先，在治理过程中建设统战网络，通过治理实践孵化治理联盟，而不是先建设统战网络然后再在治理实践中使用之。其次，在培育治理联盟连接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在打造治理联盟的基础上，发展政治联盟。这一原则意味着，与宣传工作的观点说服、思想认同不一样，网络统战工作首先需要建立交往、连接，建立合作关系。

具体而言，网络统战构建的数字化治理联盟意味着一种网络式的连接机制或关系形态，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和可见性。有学者在讨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时提出一个相似概念“治理性交往”。它是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实质上“将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拓展至一个新的空间”<sup>[26]</sup>。“治理性交往”概念富有创意，它突出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关联与互动。不过，由于交往一词本身所具有的行动性、过程性含义，“治理性交往”概念凸显了基层治理的“生气与活力”，却难以反映交往的社会性结果，也不利于具体实践的开展。

从实践角度来看，通过网络统战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关键是要构建灵活、高效的治理单元，以体现政党的执行力，提高社会的连接性。这种治理单元规模可大可小，因时因事而相应调整。由于采用网络数字化技术，这些治理单元的时空跨度可以高度灵活，因而合作效率也更高。同时，这里的网络形态又意味着治理单元的多元性，它囊括组织上下、左右和内外的不同主体，甚至可以呈现多中心的结构形式。在网络统战模式下，统战部门和工作人员既可以是发起者，也可以是主要驱动者，更可以是主要连接者。同时，联盟应尽可能吸纳网络资源丰富的个人或群体，他们“自带流量”，具有较高的连接力。

**网络统战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的第一种策略是场景化。**从实践策略而言，网络统战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可以借鉴现有城市治理经验，广泛施行场景化策略。在公共治理中，场景主要是指“由时间、地点、议题等特定场景元素以及政府、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所构成的具体画面或特定过程”<sup>[27]</sup>。比如，针对渣土偷倒问题，基层网格化管理即可将其场景化，采取相对固定的治理措施和流程进行处置。网络统战打造的数字化治理联盟，可以根据社会治理目标和任务，建立网络统战的系列场景，并且逐步常规化。需要注意的是，场景化策略强调在应用环节中技术与特定治理需求和治理问题的适配度。数字化治理联盟也需要针对具体治理问题建立与统战工作性质、网络技术与群体相匹配的联盟构建场景，比如针对社区环境问题组建广泛参与的居民治理网络。

**网络统战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的第二种策略是事件化。**如果说场景化策略是针对常规性问题而预制的行动策略，那么事件化策略则是针对非常规性、突发性事件而采取的对策。如有学者所说：“风险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的主题，已从传统简单静态的‘部件管理’向多变复杂不确定的‘事件治理’转化。”<sup>[16]</sup>围绕事件而展开的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元、更及时的合作，而网络统战跨越部门和领域的连接力在此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现。不过，网络统战构建的数字化治理联盟，应超越行政部门社会治理的即事性，针对需要弹性统合的问题或事件、针对相应的人群开展工作，比如影响范围广大的疫情、需要多方合作的重大节庆活动等。

**网络统战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的第三种策略是复合化。**在当前社交媒体基本成为传播与沟通主流媒介的情况下，人们建群结社的成本大幅下降，各种临时性、虚拟性群体层出不穷。传统的统战工作花费巨大精力所开展的团体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因此，与其费力地进行基础建设，不如灵活地利用既有网络群体，以我为主，重新建立治理性连接。这不是稀缺状态下的“你输我赢”游戏，而是社交充足状态下的“双赢”局面。不同目的与状态的群体，可借助数字化社交媒体形成复合化、叠加式的新连接。在网络统战工作的介入下，这些复合网络不仅可以壮大社会治理实践队伍，而且可能带动、影响既有连接和关系，使其更加健康、积极。

实践策略最好的出处始终在于实践本身。本文主要希望弥补网络统战研究中网络理论的短板，从网络理论出发，根据网络逻辑来构建网络统战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机制，努力提升网络统战的价值，



谢静. 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 新时代网络统战的理念重构与机制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17.

进而用网络统战的新理念来拓展统一战线在数字时代的工作视野和实践空间。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2]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M].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 [3]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4] 谢静. 数字统战前瞻: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3): 1-8.
- [5] 刘志礼, 李佳隆.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4): 61-66.
- [6]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 [7] 陈喜庆. 关于加强网络统战工作的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16-20.
-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9]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J]. 开放时代, 2008 (2): 10-29.
- [10] 周雪光.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 [J]. 社会, 2019 (2): 1-30.
- [11]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2] 陆铭. 探求不确定中的确定——复杂社会的危机及应对 [J]. 探索与争鸣, 2022 (9): 44-52+177.
- [13] 徐勇. 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与结构转换 [J]. 探索与争鸣, 2023 (1): 5-9.
- [14] 燕继荣. 基层治理的理想与现实 [J]. 探索与争鸣, 2023 (1): 10-14.
- [15] 李友梅. 关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J].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17 (1): 190-195.
- [16] 唐亚林. 当代超大城市治理的运作原理建构 [N]. 文汇报, 2021-11-21 (8).
- [17] 成伯清. 大团结视域下社会组织的统战意义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18-20.
- [18] 左晓斯. 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评价研究 [J]. 社会科学, 2016 (4): 55-63.
- [19] 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 (10): 52-58.
- [20] 唐皇凤, 王豪. 可控的韧性治理: 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J]. 探索与争鸣, 2019 (12): 53-62+158.
- [21] 路璐, 李小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3.
- [22] 余源培. “历史合力论”是爱国统一战线重要的哲学基础——兼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7-14.
- [23] 林尚立. 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 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 (1): 4-8.
- [24] 景跃进.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J]. 探索与争鸣, 2019 (8): 85-100+198.
- [25] 冯仕政. 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 从连结到团结 [J]. 社会学研究, 2021 (1): 1-22+226.
- [26] 商红日. 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四种制度形式论要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74-80.
- [27] 付建军. 模态、张力与调适: 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J]. 探索与争鸣, 2023 (1): 113-121+179.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功能、难点与优化

曾祥明 徐华晴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主体基础，全域化巩固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大统战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形势下，基层统战工作除了需要覆盖统战成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基层社区，也很有必要延伸至全面振兴中的乡村场域，在国家治理末梢发挥团结联合功能。加强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是进一步聚合乡村力量、实现城乡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然之举。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以“聚人”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以“用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兴人”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价值功能。当前，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存在来自主体、客体以及工作机制等方面的现实难点。在乡村场域发挥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需要进一步优化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政治生态、思想环境与工作机制。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基层统战工作；乡村振兴；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018-09

---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4.003

**作者简介：**曾祥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专家；徐华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18AKS024）；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习近平新型职业农民观研究”（2023SKPYMY03）

**引用格式：**曾祥明，徐华晴.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功能、难点与优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18-26.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探索形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深刻蕴含着统一战线的政治底色。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具体展开的内在要求。从纵向场域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延伸至基层社会, 形成基层统战工作。历史上,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适应革命形势需要, 经历过从“上层统一战线”到“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调整, 注重在乡村场域巩固工农联盟、夯实群众基础。现实中, 随着统一战线成员向基层社区分布, 统战工作在基层全覆盖日益凸显时代价值。基层统战工作除了需要覆盖统战成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基层社区, 也很有必要延伸至全面振兴中的乡村基层场域, 在国家治理末梢发挥团结联合功能。为此, 本文聚焦乡村基层统战工作话题, 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中乡村全面振兴、统战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乡村基层统战有利于凝聚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乡村资源, 是我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法宝, 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发布的系列有关文件都强调了乡村凝聚发展合力、团结各类人才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 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用, 凝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sup>[1]</sup>《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组织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sup>[2]</sup>新时代加强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 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sup>[3]</sup>《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也规定了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基础性地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巩固工农联盟仍然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 仍然要发挥好统一战线将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上层和基层的有关成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一战线能够组织在农村地区工作、活动与生活的党外人士、民营经济人士、新乡贤等优秀人才, 引导统战成员服务乡村振兴事业。近年来被誉为“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浙江绍兴上虞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汇聚社会力量, 科学搭建“乡贤回村”平台, 有效建立“乡贤建村”机制, 努力营造“乡贤治村”氛围, 畅通了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参与乡村治理渠道。随着网络直播、短视频的发展, 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乡村网红”, 如从李子柒到自贡桃子姐再到藏族小伙丁真等。除了“乡村网红”, 还有一大批返乡人才, 如南阳市六届人大代表王付良返乡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恩平市李劲新返乡推广簕菜文化等。他们以自身的“大流量”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助力了乡村振兴。乡村社会逐渐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创新覆盖的重要场域。

作为赋能基层治理以及促进乡村地区社会团结的关键机制, 统一战线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统战工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一是学理层面的阐释, 主要解读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价值意蕴与时代意义。相关研究或是从汇集广泛人才、汇集更多资金、协调各种关系等角度肯定统一战线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服务作用<sup>[4]</sup>, 或是探讨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助力发展、引领风气、化解矛盾的作用<sup>[5]</sup>,

或是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sup>[6]</sup>、基层治理<sup>[7]</sup>等维度探讨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二是现实层面的挖掘，主要解读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现实问题。相关研究从统战工作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力不足、基层统战“下沉”不到位等维度，诠释乡村基层统战工作遭遇的困顿<sup>[8]</sup>，并将对基层统战工作认识不深、工作人员结构不合理、大统战工作效能不足以及基层统战工作创新不足等视为主要原因<sup>[9]</sup>。三是实践层面的思考，主要解读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实现进路。相关研究提出确立新乡贤统战工作基本格局<sup>[10]</sup>、规范乡贤认定程序<sup>[11]</sup>、实施统战成员信息网格化管理<sup>[12]</sup>、建立三级联动体系<sup>[13]</sup>等建议。这些研究为乡村场景中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发展作了理论铺陈，但尚未充分立足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主体基础、全域化巩固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等高度，系统分析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功能、难点和优化问题。

鉴于此，本文从统战主体、客体以及桥梁机制三个层面切入，分析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运转体系。本文认为加强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既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工农联盟的赓续，也是推进基层协同治理的生动实践，还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抓手。

## 二、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价值功能

统战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乡村基层统战是确保党在乡村发展事业中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法宝，其内蕴“聚人”“用人”“兴人”等价值功能，能够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全面共同富裕。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具有历久弥新的整合建构功能，有利于在尊重统战成员合理意愿与诉求的前提下，将致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一切积极力量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 （一）以“聚人”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基础功能在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14]</sup>基于国家角度，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基于乡村角度，人心向背是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否的重大因素。统一战线在协调多元主体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冲突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不仅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多元并包的创新力量和主体资源，而且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谐稳定的乡村政治环境。

首先，创造农村良好政治生态，为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固本培元。社会阶级、阶层格局的变化是统一战线科学配置社会力量的基本依据<sup>[15]</sup>。农村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都是整体生态中的政治个体，他们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身份层面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要通过统战工作对其思想认知加以正确引导和合理疏导，以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预期目标。统一战线的核心意义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sup>[16]</sup>。团结力量、联谊交友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方式和手段，是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客观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谐的乡村环境是团结动员各阶层人士的重要条件。

其次，整合农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凝聚致力乡村振兴的广泛力量。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村地区涌现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新乡贤等新群体。画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

不能忽视乡村场域中的各类新群体。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同心圆“在党的领导下,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sup>[17]</sup>。乡村基层统战工作能够将乡村场域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有效地整合起来, 使他们分散化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地汇聚起来, 形成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利益聚合。乡村基层统战工作通过凝心聚力, 有利于推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和提升发展效能。

### (二) 以“用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关键价值在于以用好人才为本、发挥其才能为要。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一个政党只有善于集中民智, 与人民共书历史、共创时代、共铸梦想, 才能凝聚磅礴的群众伟力, 以更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向前向美向上向善<sup>[18]</sup>。从统战史来看, 党始终善于集中民智、用好民智, 将统一战线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纳入乡村发展战略。乡村场域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新乡贤等统战成员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的“乡村先行者”和“重要带头人”<sup>[19]</sup>, 是乡村发展的“排头兵”, 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中间媒介。他们在实现自富的同时, 能够带动其他村民致富, 对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乡村整体发展具有示范带动效应。

首先,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调动各方力量、汇聚更高水平人才。乡村振兴中, 人才振兴是关键。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指导, 更需要具有实操经验的人才。乡村基层统战工作能够为乡村农业发展汇聚智力资源和专业力量, 引导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技术技能和理论知识, 助力农产品提质增产, 解决乡村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从而助推农业农村创新发展。统一战线充分发挥调动各方面力量的组织优势, 针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实际, 组织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领域的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乡贤等, 充分发挥他们为乡村的产业发展以及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其次, 为乡村治理培育热爱乡村、扎根乡村的基层工作者。“广纳群言, 广集民智”<sup>[20]</sup>, 调动统战成员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激发乡村社会活力。工作、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党外人士、返乡大学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及新乡贤等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多, 覆盖的社会领域广泛, 可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成效。除此之外, 统战成员参与乡村治理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有着智力和资源优势, 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具有较高的积极性。统战工作所构建的联合平台为乡村地区的民主协商提供了多样化的途径, 促使多元主体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 并将其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正向效能。

### (三) 以“兴人”促进共同富裕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指向, 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和内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的。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在团结人、凝聚人、用好人、培育人的基础上, 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乡村发展以及结构重建的实践中,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能够促进乡村场域下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的全面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首先,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互通机制。从主要任务来看,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推进能够落地为乡村的现代化安排, 能够转化为实际共同富裕成效。从乡村内部各群

体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方式来看，乡村振兴不仅是城乡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新技术、新形态、新观念共同作用于乡土社会，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化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互通性，而统一战线是二者互通互联的重要机制之一。乡村基层统战工作能够促进阶层以及乡村社会和谐，形成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社会和谐恰恰是人全面发展过程中重要且必要的社会环境，同时也是共同富裕的外部特征。可见，共同富裕诸多内涵与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呈现高度的一致性。统一战线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次，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渠道。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在整合人才资源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其才能充分发挥、促进其全面发展。这些不同群体也是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重要的社会力量，是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为此，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乡村社会的动员功能，在调动统战成员积极性的基础上，把他们的智力资源优势与乡村地区发展实际相结合，从政治团结与联合的高度拓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渠道。可见，积极团结他们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并有效引导他们发挥自身优势，是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责任与使命，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然要求。

### 三、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现实难点

统一战线具有理论自觉性和实践导向性。乡村场景中的统战工作在发挥“聚人”“用人”“兴人”等重要作用、推动“三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场域困境”“责任困境”和“乡土困境”等方面的现实难点。

#### （一）主体力量之“难”：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场域困境

当前，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存在部分主体的作用发挥较为薄弱的现象。就实际看，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着内动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乡村基层治理的多元任务与基层统战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竞合关系。在县（区）以下，乡镇（街道）一般没有设立专门统战工作部门，党委（党工委）统战委员往往身兼多职。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主体的主要精力往往用在完成一般的基层治理任务上，对调动优秀人士、新乡贤等返乡参与乡村建设等工作没有常态化、精细化问题。有的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主体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把民营经济人士等具有明显经济优势的群体作为重点对象，而忽略了对活跃在乡村的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退休人员以及大学生等群体的团结与吸纳，工作的着力点存在失衡现象。另一方面，乡村基层工作干部队伍的结构与乡村基层统战工作需要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为解决乡村干部队伍数量不足或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公考等渠道进入乡村基层工作。但由于部分年轻干部对乡村情况不太熟悉，新老干部工作的衔接机制还不完善，干部“传、帮、带”落实不到位等因素，乡村基层统战工作队伍老化、断代问题日益显现。

#### （二）客体意识之“乏”：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责任困境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还存在着统战工作客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意识较为薄弱的现象，存在客体思想建设的责任困境。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乡村不断产生各种新型社会职业，形



成了新的社会群体, 随之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得到增强<sup>[21]</sup>, 需要有效回应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思想观念多样化状况。多元化的观念和诉求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可能作为诱发性因素导致出现乡村秩序不协调不稳定问题。一方面, 我国乡村地区思想观念日益复杂多元, 乡村无序传教、境外文化入侵等问题偶有发生。例如, 在我国边疆的一些农村地区, 西方国家打着宗教旗号挑起事端; 在我国东北等有关农村地区, 外国宗教对村民的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成为外国传教士的活跃之地。“教族捆绑”“无序传教”带来的农村意识形态安全隐患不可小觑。另一方面,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全面地对乡村各方力量进行整合和调动。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如何团结“乡村网红”“返乡农人”等新群体, 引导他们协同发力持续服务乡村振兴, 成为迫切任务。

### （三）桥梁机制之“弱”：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乡土困境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存在着统战工作机制尚需完善的现象。一方面,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机制尚不能很好回应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统一战线是兼具集体性、组织性、多元化的创造活动<sup>[22]</sup>, 只有各方面机制达到动态统一并使其效能得到充分释放才能实现统战工作的高效和可持续。当前, 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下, 一些具有特色示范的乡村地区吸引了大批新乡贤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涌入。随着乡村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 深入基层的党外知识分子数量不断增加, 在乡村基层就业的大学生队伍不断扩大; 人口跨区自由流动, 使得各个民族散居杂居成为普遍现象; 乡村网红、新媒体从业人员在乡村地区不断涌现。乡村地区的统战工作对象日益增多, 对象越来越多元化, 面临着如何“汇聚思想合力”<sup>[23]</sup>、实现利益平衡、精进人口管理等许多重点难点问题。另一方面,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机制的实际效能有待提升。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政策机制支持, 不仅给予统战成员的激励不足, 而且有效落实相关举措的方式方法也相对落后。农村基层统战工作任务越来越重, 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在这种形势下, 基层统战工作的有序推进、团结整合目标的有效实现, 有赖于乡村统战工作所构建的一系列桥梁机制。

## 四、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优化进路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聚人”“用人”“兴人”等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来自统战主体、统战客体以及统战机制等层面的多重困境。这些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统一战线在乡村的组织力和作用力。从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主体、统战工作客体与统战工作机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发力, 实现其在政治生态、思想环境和有机系统上的自洽耦合, 有利于在乡村场域发挥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 （一）激活主体力量, 优化政治生态

针对当前基层统战工作主体力量较为薄弱的问题, 要坚持优化政治生态, 激活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人是环境, 个个是生态”, “做好各方面工作, 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sup>[24]</sup>。面对基层统战工作主体功能薄弱的现象, 需要进一步优化基层统战工作的政治生态环境, 增强基层统战工作主体的责任意识与能力, 全力推进基层统战工作现代化。

第一, 要加强乡村基层党的建设, 强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sup>[25]</sup>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得到加强，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农人、新乡贤等的吸引力。要逐步明确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主体，厘清“该谁干”问题；明确职能边界，厘清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干什么”问题；明确工作程序，厘清乡村基层统战工作“如何干”问题，使统一战线在乡村建设中发挥出应有价值。

第二，要强化对统战工作主体的培养教育，增强乡村基层统战干部的能力。一方面，积极引导统战干部及时“补钙”，强化学习和领悟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乡村基层统战是大统战工作的“神经末梢”，容易存在被弱化忽视的现象。为此，要把统战工作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树立“统战无小事”<sup>[26]</sup>的观念，不断提升统战工作主体的政治自觉。另一方面，加强青年统战干部的培养，构建新老干部衔接机制，增强基层统战干部队伍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sup>[14] 42</sup>开展乡村基层统战工作，需要高度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造就，促进新鲜血液加入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提高基层统战干部队伍的能力水平。

### （二）唤醒客体意识，完善思想环境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针对统战工作客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根据时代特征、乡村特色，在工作理念、实践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对各类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观念特点进行充分调研，运用创新媒介和手段，协调好工作的内容与形式、价值与方法，激发统战工作对象的内生动力。

第一，以科学的理论增强统战工作客体内生力。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27]</sup>统一战线要团结所联系成员，必须对其进行理论说服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基层统战工作主体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与引导，加强对统战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意识到乡村建设与自身发展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主体还要根据不同类型统战对象的特点，制定出相匹配的工作方案。例如，要为乡村网红搭建组织化平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常态化基地等，提高统战对象的参与度和适配度，使其在与主体进行思想交流以及不同客体进行对话中提高政治辨识力和政治认同感。此外，要结合乡村实际，采取统战成员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引导统战成员，使党的意志通过统战工作及时传到乡村基层，不断提高统战成员参与乡村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责任意识。

第二，以丰富的形式载体提升协同驱动力。乡村思想环境的优化需要多样的、契合乡村本土的形式和载体，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基层党组织和统战成员协同发力，从而在思想上达成政治共识，在行动上推动乡村共建。首先，丰富基层统战工作载体。要以生动鲜活的统战案例和形式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阐释和解读，引导各方主体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并引导其参与乡村公益活动，从而增强集体意识和凝聚力。要利用好微信、短视频平台等网络传播渠道，使统战对象在思想认知和道德观念等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创新乡村基层统战工作方式。要积极搭建统战平台，出台相关政策。例如，有的地方通过有效整合基层各类统战服务事宜，列清“权益维护及帮扶、侨务办理、补贴申报”等清单，在服务统战成员的同时，引导其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乡村振兴。

### （三）优化桥梁机制，构建有机系统

针对当前相关统战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的状况，要坚持构建有机系统，优化桥梁机制。其总体原

则是在乡村基层社会根据实际需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第一, 从价值逻辑看, 要构建利益平衡机制。利益的多元化、差异化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是现实乡村社会的常态, 适时到位的统战工作能够使统战成员形成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统战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过程。为了有效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 统一战线要协调好乡村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建立联系协调机制、联谊交友机制, 使乡村的整体利益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统一战线在乡村扮演的“利益调节者”角色有利于规避风险、化解冲突, 有效防止群体利益冲突演化为基层政治冲突, 进而奠定乡村团结的利益平衡基础。

第二, 从共治逻辑看, 要构建力量聚合机制。统一战线的基本功能就是要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调动起来并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乡村场域, 要挖掘统战成员的资源优势, 发挥其参与乡村基层治理的效能。我国乡村地区发展变化迅速, 新生社会力量复杂多样, 基层治理面临多重困难, 需要统战工作主体采取一定的载体和机制把新生力量和原有群体结合起来。比如, 近年来, 陕西省在搭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的基础上, 有效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数据显示, 2019年, 在乡村振兴方面, 陕西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捐赠乡村振兴数字图书馆5万套、电商人才孵化基金200万元、医疗卫生物资80余万元。新形势下, 基层统战工作主体需针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搭建更多的桥梁与机制, 把一切可以吸纳的优秀力量凝聚到乡村振兴事业中来, 将统一战线的力量聚合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成效。

第三, 从系统逻辑看, 要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sup>[28]</sup>。大统战工作格局旨在调动各方力量的积极性, 形成统一战线工作的合力。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完善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统一战线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形成了大统战工作格局的主体框架。然而, 乡村基层统战工作仍然是大统战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为此, 要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要构建系统化的统战机制、形成基层统战工作合力, 把统战工作做到细致、落到实处, 提高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要在放大系统化、一体化统战效能的基础上实现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融合共通, 推动统战工作实现由力量“相加”迈向力量“相融”阶段。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 人民日报, 2018-09-27(1).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N]. 人民日报, 2023-02-14(1).
- [3]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8.
- [4] 李彦儒, 尹德志. 基层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研究[J]. 现代农业研究, 2021(6): 76-78.
- [5] 范景鹏.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统战工作[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86-91.
- [6] 林苗. 文化统战视野下基层统战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承[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2): 91-96.
- [7] 徐君, 杨顺书.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的新变化新趋势新布局——以四川为例[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1): 91-99.
- [8] 薛一飞, 邢海晶. 新社会阶层基层统战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6): 38-45.

- [9] 汪秀梅.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J]. 甘肃政协, 2022 (2): 41-47.
- [10] 张翠莲, 李桂梅.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统战工作路径研究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3): 65-68.
- [11] 蒲小勇, 谭宏玲. 新时代乡村基层统战工作研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振兴的困境及思考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4): 41-45.
- [12] 李艳霞, 周小斌. 统一战线融入城乡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湖北省基层统战工作为例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4): 38-43.
- [13] 创新开展新时代乡贤统战工作助推乡村振兴 [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5): 74-79.
- [1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5.
- [15] 蔡宇宏. 构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谐阶级、阶层关系的路径研究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 (4): 99-104.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23.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35.
- [18] 王平, 张佳敏, 周旭霞. 统一战线的民主功能分析: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68-77.
- [19] 吕浩然, 郇思含. 新乡贤在促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治村模式、优势和完善路径 [J]. 农业经济, 2023 (2): 103-105.
- [20]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7.
- [21] 林绪武, 张玉杰.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建设的百年变迁及当代价值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 (2): 44-50.
- [22] 丁俊萍, 颜苗苗.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4+181.
- [23] 曾祥明. 习近平统战思想探析 [J]. 新疆社科论坛, 2015 (4): 5-8.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408.
- [25]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87.
- [26] 杨荣国, 张新平.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1 (11): 103-113.
-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10.
- [2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陈章喜 邓彪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澳门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建设数字中国, 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作为新发展业态的数字经济, 目前正在经历快速发展阶段, 在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香港在金融发展、基础研究、制度安排、对外联系等方面具有众多优势, 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可采取的对策包括: 推动香港数字金融的大发展; 促进香港数字贸易的不断优化; 深化香港与内地的数字经济合作; 完善香港数字经济的产业链; 推进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关键词:** 数字经济; 香港; 知识外溢; 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4-0027-12

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加强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手段及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方位, 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同时描绘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新走向, 也为香港、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将对港澳地区未来繁荣稳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发挥作用<sup>[1]</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同时, 报告涉及支持香港、澳门发展

---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4.004

**作者简介:** 陈章喜,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经济社会与区域合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邓彪,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 陈章喜, 邓彪.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27-38.

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支持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为港澳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因此，分析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既是香港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走向经济成长新阶段后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

## 一、文献回顾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1996 年唐·泰普斯科特 (Don Tapscott) 最早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他强调人类通过技术建立网络，将智能、知识和创造力结合起来创造财富。但由于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紧密相关，因此概念的界定随技术进步不断更新。英国经济社会研究院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各类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2016 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关于数字经济及其发展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展开了一些分析。丁声一等通过对英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的梳理，提出了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及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sup>[2]</sup>。张新红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网民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将为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sup>[3]</sup>。钟春平等系统梳理了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并从数字经济总量、创新能力、产业发展及监管角度就中美发展数字经济差距的原因展开分析<sup>[4]</sup>。张伯超等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sup>[5]</sup>。许宪春、张美慧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对数字经济的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进行测算<sup>[6]</sup>。彭刚、赵乐新基于数字经济的基础层和应用层两个维度，对我国的数字经济总量进行了测算<sup>[7]</sup>。李智和何浩淼通过构建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应用以及数字经济产出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sup>[8]</sup>。刘军等从信息化发展指标、互联网发展指标以及数字交易发展指标三个维度构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我国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sup>[9]</sup>。

关于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功能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其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整体分析。曹靖等人运用突变计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和绿色经济效率，认为大湾区绝大多数城市创新投入强度逐年显著提升，但绿色经济效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sup>[10]</sup>。彭芳梅通过 TOPSIS 评价法与改进引力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空间联系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表现出三级圈层结构，并且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了空间联系分析的结论<sup>[11]</sup>。笔者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量化评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卫生、公共管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关联度较大，而居民服务、文体娱乐、旅游业、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等行业的关联度较小<sup>[12]</sup>。申勇等构建了开放度测算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层级较高，是较大区域范围的经济增长引领人<sup>[13]</sup>。二是关于香港与内地关系的研究。陈



陈章喜, 邓彪.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27-38.

德宁等构建了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模型, 得出两地经济耦合度增长迅速的结论<sup>[14]</sup>。李文辉等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 认为香港与内地跨境技术转移具有明显的邻近特征, 且广度在不断上升<sup>[15]</sup>。王鹏等构建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 实证分析了香港知识溢出对广东省创新能力的影响<sup>[16]</sup>。郑文江等基于驱动因素、合作层次和创新模型三个角度构建了三维分析框架, 认为政策的直接推动让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但合作水平还不够深化<sup>[17]</sup>。

既有研究显示, 应充分发挥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及优势。现有文献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优势、差距、测算等方面。现有文献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面。但囿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约束, 既有文献对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政策选择还缺乏深入研究。香港是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的节点城市, 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 随着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不断推进, 香港数字经济发展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基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视野, 系统研究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香港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试图为香港数字经济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局提供参考。

## 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与脉络

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及其技术的广泛使用, 21 世纪以来, 不断有人提出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的观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交融愈加密切, 数字经济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政策、社交媒体的标题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 数字经济的规模估计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4.5%~15.5%。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显示, 数字经济被视为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引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 数字经济迅速发展, 全球网络协议流量在 2017 年至 2022 年间增长三倍以上, 特别受疫情影响, 互联网流量显著增长。数字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范围都在飞速增长。

数字经济的飞速增长也伴随着国家之间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近年来, 各国陆续把发展数字经济视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转换经济增长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sup>[18]</sup>。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为在国际竞争中抓住话语权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所必须抢占的制高点, 美国、印度和欧盟等国家或区域陆续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sup>[19]</sup>,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2007 年 6 月, 我国首部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发布, 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16 年,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发布, 其中指出战略目标是到 21 世纪中叶, 信息化全面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网络强国地位日益巩固, 在引领全球信息化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同年在 G20 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首次提及了数字经济概念。2017 年数字经济正式被写入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2020 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白皮书(2020 年)》进一步明确了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等四个部分。2022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要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



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可以看出，我国把数字经济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且不断出台相应政策以推进其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我国迈入新时代后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中国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2017 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达到 26.70 万亿元人民币，较 2016 年的 22.77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 17.24%；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 34.8%<sup>[20]</sup>。2022 年 7 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 45.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增长 16.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9.8%，数字产业化基础实力持续巩固，产业数字化发展进入加速轨道。此外，数字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引发了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性深刻变革<sup>[21]</sup>。无论是对政府、企业、人民三方，还是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医等方面，数字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2 年 3 月发布的《大数据看 2022 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中，数字经济位列第五位。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备受人民的关注。

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坚持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在把握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潮流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此后，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包括《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2019—2025 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21 年工作要点》等文件。2020 年底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其独特的发展优势，在数据资源、数字关联产业、数据基础设施、应用需求等方面都具备国内首屈一指的条件<sup>[22]</sup>。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数字经济两大国家战略交汇机遇的同时，有望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跑者<sup>[23]</sup>。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城市，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发展的根本利益同国家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作出更大贡献，对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

### 三、香港参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香港产业为现代服务业、基本没有制造业、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城市建设空间有限的特点，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加强自身经济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同时继续保持与世界其他城市的关联，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 （一）数字产业化成效显著

2021 年香港独角兽榜单中，18 家独角兽企业具有“香港基因”，其中以高端制造、机械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居多。其中，DJI 大疆创新，Sense Time 商汤科技等高科技公司市值估值过百亿，说明香港促进数字产业化成效显著，已有初具规模的高科技公司。从表 1 可以看出，香港历年资讯与

陈章喜, 邓彪.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27-38.

通讯科技业增加值从2011年开始,连续为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超过1 000亿元的贡献,除2009、2014、2015 年外,资讯与通讯科技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都为正,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08 年开始到2017 年为止(除去2009 年),历年都在5%以上,这说明数字产业化可以为香港创造较为可观的国民生产总值。另外,资讯与通讯科技业每年为香港创造了超过10 万人的就业岗位,历年资讯与通讯科技业的就业人数占到了香港就业总人数的3%左右,为香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容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科技人才。

表1 香港资讯与通讯科技业相关数据

年份	资讯与通讯科技业增加值(十亿元)	增加值增长率(%)	增加值占GDP比重(%)	资讯与通讯科技业就业人数(人)	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
2008	80.8	-	5.0	103 107	2.9
2009	70.2	-13.1	4.4	114 230	3.3
2010	95.0	35.3	5.5	122 383	3.5
2011	115.4	21.4	6.1	133 101	3.7
2012	124.1	7.6	6.2	129 495	3.5
2013	139.3	12.2	6.6	129 780	3.5
2014	133.7	-4.0	6.1	129 535	3.5
2015	132.0	-1.2	5.7	130 657	3.5
2016	137.6	4.2	5.7	128 703	3.4
2017	145.9	6.0	5.7	129 641	3.4
2018	156.0	6.9	5.8	130 885	3.4
2019	156.9	0.6	5.7	126 289	3.3
2020	158.6	1.1	6.2	125 443	3.4

资料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 (二) 产业数字化不断推进

目前,大部分香港人每天出行必须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地铁,自2021年1月23日起,全线超过90个车站已开通二维码付费乘车服务,意味着香港地铁数字化改革初见成效。香港建筑工地上已经采用移动应用设备和平板电脑替代传统手工记录,不少项目采用了数字化新技术包括BIM、RFID、视频监控、无人机扫描等技术,推动工地的信息化应用和管理。香港理工大学还开展了基于定位技术的主控式施工管理系统,基于BIM云和图像处理技术的智慧建造管理平台等课题的研究和应用<sup>[24]</sup>,相信未来的建筑工地会因为数字化而更加便捷和安全。此外,香港还鼓励智能养老,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举办“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展示的产品包括老年人智能家居、远程医疗、康复科技、社交机械人、社区健康管理等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和保持良好生理及心理的数字化产品,让养老产业顺利进行数字化变革。此外,香港在零售、仓储、运输等行业中积极促进本领域的数字化变革,比如货拉拉公司进入了香港2021年独角兽企业榜单。

1997 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就明确了未来香港应该发展高增值、高科技产业；2015 年香港特区政府又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求并推动了创新及科技局的组建；2018 年设立的再工业化资助计划，拟建设专门研发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平台<sup>[25]</sup>。2021 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的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香港北部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北部致力于发展世界一流科创产业。2022 年初，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提出成立“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同年 6 月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旨在推动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为香港勾画发展数字经济的蓝图与奠定未来升级转型的良好基础。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积极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的成立，香港与内地的高新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引进高新科技人才和技术。2020 年香港固定宽频互联网用户数占固定互联网用户数的比例达到了 98%，比 2010 年的 74% 提高了 24%，反映了香港市民对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的需求与日俱增（表 2）。香港特区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推动措施，促进了香港市民对于数字经济的热情。

表 2 香港互联网用户相关数据

年份	按每百名人口计算的 固定互联网用户数	按每百名人口计算的 固定宽频互联网用户数	固定宽频互联网用户数 占互联网用户数比重 (%)
2010	40.7	30.2	74.2
2011	42.7	31.6	74.0
2012	42.6	31.5	73.9
2013	37.3	30.9	82.8
2014	34.5	31.2	90.4
2015	34.7	31.9	91.9
2016	38.0	35.4	93.2
2017	37.6	35.7	94.9
2018	36.8	36.0	97.8
2019	38.0	37.1	97.6
2020	39.3	38.7	98.5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 （三）香港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参与

对普通香港市民而言，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电子消费券计划，旨在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老年人而言，香港借助社会力量积极为其创立专门的数字应用软件环境，通过建立老年人专用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多种途径培训老年人技能，多种方法激励老年人使用信息技术等方式促进老年人参与数字经济，分享数字经济的成果。如表 3 所示，在各种促进数字化的措施下，香港 10 岁以上人群使用互联网人数逐年递增，2020 年约有 600 万人使用互联网，约占 10 岁以上总人数的 92% 以上，证明各种措施有效促进了香港市民参与数字化。同时，香港从特区政府、高校科研引领、基础教育界教师实践等方面合力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sup>[26]</sup>。

陈章喜，邓彪.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27-38.

香港特区政府出台政策、香港高校编制教材，教材中包括教学指引与案例，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合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小學生之间的兴趣，从而间接地推动了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

表 3 使用互联网人数相关数据

年份	在统计前 12 个月曾使用互联网的 10 岁及以上人数 (千人)	占有所有 10 岁以上人数的百分比 (%)
2005	3 526.2	56.9
2006	3 770.4	60.8
2007	3 961.4	64.8
2008	4 123.9	66.7
2009	4 300.0	69.4
2012	4 580.1	72.9
2013	4 671.8	74.2
2014	5 052.5	79.9
2015	5 394.9	84.9
2016	5 577.5	87.5
2017	5 738.0	89.4
2018	5 856.1	90.5
2019	5 988.0	91.7
2020	6 013.6	92.4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报

#### 四、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优势

多年以来，香港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规范及比较成熟的现代治理体系，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在亚太地区处于强势的发展领域。香港除了为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多层次、宽领域、最有效的增值服务外，也为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制度财富，这是“一国两制”条件下创新发展国家数字经济的重大优势。香港的众多优势为国家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服务，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体制优势

根据国家的区域战略部署，港澳与前海、横琴、南沙等新一轮平台建设与合作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南沙的定位应是促进粤港澳全面合作发展知识经济新兴产业。横琴的定位应是发展澳门非博彩的其他相关产业，为推动澳门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探索横琴与港澳共同转型发展的合作新模式。前海的定位应是为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提供金融和其他现代服务，与香港金融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形成全方位合作和错位发展的新模式，发展香港非金融和非房地产的其他相关产业，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动、错位竞争的新型平台网络，促进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基本指向是：

粤港澳合作构建全方位国际合作平台，打造全球性科技创新和资讯创新中心；粤港澳合作建设对外投资服务基地，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高端要素和资源支撑。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将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地区新一轮改革平台建设的合作协调机制，促进国家数字经济平台建设。

### （二）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功能优势

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处于该城市群的核心位置。就广州而言，其集聚了大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技术资本；就香港而言，其集聚了大量全球资本、人才和高端要素；就深圳而言，其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实体企业和改革基因。在全面深化粤港澳合作过程中，将以创新思维建立香港、深圳、广州都市功能的合作机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与合作，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全球最具活力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新增长极。在此背景下，构建香港、广州、深圳城市功能跨境分工的合作机制不可避免。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将按照生态规律构建命运共同体，如就绿色低碳、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签订区域合作协议；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构建利益共同体，就区域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等做出机会和利益共享的制度安排；按照社会规律构建和谐共同体，如就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与社会安全网建设等达成跨境机制性合作。香港国际大都市的功能优势将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服务。

### （三）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区位优势

香港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大都市，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成为国家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型服务、高增值制造和现代农业领域合作的重要区位平台。香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特征之一是国际化，这是香港长期在开放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自由港优势和高度开放优势。香港不仅在美、日、欧有良好人脉和商业联系，而且在亚、非、拉也积累了百年以上的商业存在和发展经验。这对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走出去”，起着独特的作用。在香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短平快”是香港经济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所形成的奋斗精神及独特优势；“高增值”是香港在长期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育出来的营商特色及价值定位。香港作为国家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管理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亚太及世界的创新中心中发挥着坚强的作用。国家融入和引领全球发展大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使香港国际化优势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内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升华。香港在“引资”“引智”“引技”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引入现代创新经济的制度环境，为建设创新型的数字强国服务。

### （四）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优势

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将更好地发挥金融中心和离岸市场的功能，为国家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体制改革提供支撑，同时在更高层次上为国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服务。香港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市、期市、汇市并开发人民币远期、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工具，形成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企业家及各类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服务专才北上，与内地企业合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国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预见的是，香港企业家创新精神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内帮助内地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香港和内地企业家合作，通过质量创新，提升内地产品品质，满足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差异化需求。从长期看，香港某些高科技产业，如生物医药研发、中医药检验检疫等，在与内地合作过程中可以

陈章喜, 邓彪.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27-38.

在研发、制造等环节培育起新的优势, 推动科技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大发展。

#### **(五)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贸易和航运优势**

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及相关增值服务在亚太地区居于领先地位, 香港的传统贸易、离岸贸易、保税贸易、跨境电商以及国际转口转运贸易的功能强大。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 香港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会不断得到拓展, 进一步为构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服务。香港将积极参与国家推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合作构建以周边为基础, 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如香港配合国家参与 TISA (全球服务贸易协议) 谈判, 推动两岸三地服务贸易谈判, 参与中国与东盟 FTA 升级版、中日韩 FTA、RCEP 等区域合作等。香港将积极参与国家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 合作构建境内、跨境、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金融供应链, 合力取得海运、港口、空运及相关服务的定价权。香港将积极参与国家扩大内陆沿边地区开放开发, 合作提升新疆对中亚、云南对南亚、广西对东南亚、宁夏对西亚北非等地开放的能力建设。这些平台建设和离岸体系建设将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 **(六)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工商支持服务和专业服务优势**

香港在综合工商支援服务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明显, 表现在双语、财金专才云集、国际商业网络发达、中介服务经验丰富等。香港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管理和综合物流等领域相对内地企业有较强优势, 同时比国外商业竞争者更了解内地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目前香港的中介作用已转向为境内接单并在境外组织生产和组装、商品和服务在内地销售的同时, 沿“一带一路”构造价值链的商业新模式。这与香港过去从境外接单并完成各项增值服务后, 在内地完成生产和组装, 产品行销全球市场的商业模式有所不同。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 香港的商业模式可与内地贸易、生产和金融企业一道结成产业策略联盟, 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 共同开辟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非洲、拉美市场, 与内地合作进入美、日、欧高增值商品和服务市场, 为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 **五、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路**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国两制”、金融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众多优势, 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的重要功能不言而喻。综合考虑香港在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为充分发挥好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功能, 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思路如下。

### **(一) 推动香港数字金融的大发展**

数字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功能。数字金融有助于区域、国家的低收入群体的创业行为, 带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从国家层面看, 中国内地发展至今, 虽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绩, 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从香港层面看, 存在着相当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与资本财富拥有的差距, 这也间接导致了香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与不同财富阶级群体之间更加尖锐的矛盾。香港应该聚焦数字金融与社会公平, 引导与支持数字金融的发展, 抓住机遇保持并不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加强数字金融信



贷管理，便利小额金融借贷的数字化操作，落实借贷个人身份与征信的审核以及资金发放与收回的法律法规，方便低收入群体进行资金借贷以开展创业行为，为国家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验之路。

### （二）促进香港数字贸易的不断优化

香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及进口，有利于内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香港作为世界级港口，通过对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出口以及进口，能够有效促进内地特别是广东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将内地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推介和销售，既能增加香港转口的收入，又能提高内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要发挥香港作为世界级贸易港口的作用，大力促进贸易行业的海运、空运便捷化并出台相应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从事高科技贸易行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优化贸易进出口程序，以网上审批等为主，便利企业的操作、降低人力成本。同时打通贸易渠道，促进贸易企业沟通贸易集装箱，顺畅产品对接和交接等程序，让企业能够顺利将产品运出去。此外，贸易行业管理要便利贸易出口与进口交收，便利高科技产品进口与出口审核，完善商品转口的法律法规与税收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提供良好的销售通道与环境。

### （三）深化香港与内地的数字经济合作

数字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有效分工，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sup>[27]</sup>。未来，数字经济将会实现香港与内地的有效分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共赢。面对新的挑战，香港要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不动摇，既要坚持“一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荣誉，明确只有祖国好才有香港好的观念，弘扬爱国爱港的理念，塑造爱国爱港的氛围，积极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局；同时要发挥“两制”的独特优势，鼓励香港数字经济企业在自由市场有序竞争、良性竞争，建立健全香港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引进国外及中国内地数字经济与其他领域领军人物、杰出人才与技术，同时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香港第三产业极为发达，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规模较小，应该与广东省及内地各省开展更广阔与更深层次的合作，除水、电、蔬果等生活必需品在数字领域的合作外，在交通、网络、管道等方面也应主动对接内地，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潮；在工业制造方面应适时将落后产能转移至粤东西北及内地各省，通过与内地的数字经济合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四）完善香港数字经济的产业链

从现实来观察，现有的大多产业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变革，给现有的产业以便利化、降低维护成本、根据需求适时调整供给等优点，因此要促进香港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能给很多产业赋予新的数字价值。不同于以往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具有的稀缺性，数据资源有很强的再生性和可用性。如数字经济与养老结合产生了数字养老。目前医院、社区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实时监测，老年人吃饭、出行的智能化，老年人人际交往的网络化，是正处于超老龄化或老龄化社会的香港与中国内地所要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又如数字经济与教育结合产生了数字教育，大数据精准捕捉的考证考试服务、实用技能的网络培训具有广阔市场。再如数字经济与城市管理结合产生的智慧城市，对居民所需要的服务提供网上办理，便于居民预约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测与公示。香港应该以降低税收、提供补助等方式鼓励各行各业积极融入数字经济发展，引导企业拉长自身产业链，扩展数字经济产业链，利用好维护好现有的数字基

陈章喜, 邓彪.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27-38.

基础设施, 容纳更多数字经济从业人员, 更好更快发展数字经济。

### (五) 推进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国家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相对福利效应会更大, 但要防止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时间滞后效应。数字经济能够让现今的弱势群体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取得与普通入等同的地位,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福利的改变、创业的热潮, 能够让弱势群体不再被动地处于弱势, 或许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股强大推动力量。香港发展数字经济的成果应该由全体香港市民所共享, 惠及全体人民, 照顾低收入群体及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都应该享受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便利性、快捷性和实实在在的物质、精神利益。香港应该出台政策, 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对弱势群体进行培训、照顾, 让未能跟上数字化大潮的弱势群体学习数字化操作, 享受数字化的便利, 同时利用数字化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此外, 香港还应该出台如电子优惠券、数字津贴、数字住房抵用券等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补贴, 让弱势群体在数字化大潮的冲击之下能够顺利过渡, 切实解决香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丁声一, 谢思淼, 刘晓光. 英国《数字经济战略 (2015—2018)》述评及启示 [J]. 电子政务, 2016 (4): 91-97.
- [3] 张新红. 数字经济与中国发展 [J]. 电子商务, 2016 (11): 2-11.
- [4] 钟春平, 刘诚, 李勇坚. 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J]. 经济纵横, 2017 (4): 35-41.
- [5] 张伯超, 沈开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定量评估与特征分析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 (1): 94-103.
- [6] 许宪春, 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5): 23-41.
- [7] 彭刚, 赵乐新.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测算问题研究——兼论数字经济与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J]. 统计学报, 2020 (3): 1-13.
- [8] 李智, 何浩淼. 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 (9): 18-22.
- [9] 刘军, 杨渊璧, 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 (6): 81-96.
- [10] 曹靖, 张文忠. 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0 (9): 1987-1999.
- [11] 彭芳梅. 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基于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实证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7 (12): 57-64.
- [12] 陈章喜, 吕多鑫.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 理论描述与实证评价 [J]. 澳门研究, 2018 (4): 108-118.
- [13] 申勇, 马忠新. 构筑湾区经济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度的实证分析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7 (1): 83-91.

- [14] 陈德宁, 陈军才, 何一鸣. CEPA 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度与效应分析 [J]. 学术研究, 2014 (1): 85-92+160.
- [15] 李文辉, 张芷欣. 香港跨境技术创新转移网络演化研究——以专利计量信息为依据 [J]. 科技和产业, 2022 (7): 334-342.
- [16] 王鹏, 赵捷. 香港知识溢出对内地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J]. 当代港澳研究, 2014 (3): 117-132.
- [17] 郑文江, 俞佳敏, 黄璐, 等. 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分析框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香港的区域合作为例 [J]. 科技管理研究, 2019 (24): 47-53.
- [18] 张雪玲, 焦月霞.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 (4): 32-40+157.
- [19] 许宪春, 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5): 23-41.
- [20] 刘军, 杨渊鋆, 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 (6): 81-96.
- [21] 王齐齐, 许诗源, 田宇. 中国数字经济研究二十年: 研究评述与展望 [J]. 管理现代化, 2021 (6): 118-121.
- [22] 曾坚朋, 王建冬, 黄倩倩, 等. 打造数字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路径建构 [J]. 电子政务, 2021 (6): 29-38.
- [23] 杨海深, 王茜. 全面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 [J]. 新经济, 2019 (10): 15-19.
- [24] 李恒, 黄霆, 罗小春. 数字工地在香港的研究与应用 [J]. 工程管理年刊, 2017: 55-64.
- [25] 朱兰, 邱爽, 吴紫薇. 发展思路、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例 [J]. 当代财经, 2022 (3): 3-15.
- [26] 刘述.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香港老年人数字融入路径研究 [J]. 中国远程教育, 2021 (3): 67-75.
- [27] 田鸽, 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 [J]. 管理世界, 2022 (5): 72-83.

责任编辑: 刘泃菡



# 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 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

严安林 洪志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上海 200233)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之间在理论内核、历史脉络等方面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断对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事业具有战略意义, 对中央对台工作部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要求。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确保团结一切爱国促统力量, 为推进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凝聚强大合力。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坚实的制度保证。三是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夯实雄厚的物质基础。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为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提供根本动力。五是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强化一中原则的国际格局和提升涉台国际话语权, 营造实现国家统一的良好外部环境。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民族复兴; 两岸关系; 国家统一; 战略意义; 实践要求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4-0039-10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4.005

**作者简介:** 严安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洪志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外部环境塑造研究”(22JJD810022)

**引用格式:** 严安林, 洪志军. 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39-4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从鲜明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深刻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sup>[1]</sup>。这一系列重大论断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点和创新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成就，更是对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丰富与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与准确把握这一重大论断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国家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意涵。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之间在理论内核、历史脉络等方面有着一衣带水的关系。在内核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国家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在脉络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写明“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党的三大历史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站位和战略思维处理两岸关系和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深刻揭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与题中应有之义，引发了各界对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关系的探讨。一是论述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应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是国家统一的前提，只有实现民族复兴，才能实现国家统一。”<sup>[2]</sup>多数学者主张，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关系，认为“没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就没有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要求；而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sup>[3]</sup>。也有文章从方法论视角指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sup>[4]</sup>。二是论述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的关系。党的二十大后，两岸学界持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之间的互动关系。部分文章从宏观视角认为“两岸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使命，而‘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力”<sup>[5]</sup>，“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统一”<sup>[6]</sup>。也有部分文章从中观层面进行理解，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国两制”的关系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能够确保我们有能力完成国家统一的具体方式、策略和节奏”<sup>[7]</sup>。

既有文献以战略性、综合性视角阐述了这两对重要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然而，部分文献在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时，更多将前者视为一个目标或是愿景，较少从前者的理论体系中阐释其对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意涵。为此，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以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等诡谲多变形势下，本文尝试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理论体系着手，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对对台工作部署提出的实践要求，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深刻意涵。鉴于此，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

## 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确保团结一切爱国促统力量，为推进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凝聚强大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党的领导是国家统一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对台工作中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积极巩固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促统力量, 为国家统一事业凝聚磅礴伟力。

**其一,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解决台湾问题、推进国家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揭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 要求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对台工作与推进国家统一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把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对台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sup>[1] 514</sup>。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移的历史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在优势、根本和关键力量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8]</sup>。进一步而言, 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也就没有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祖国完全统一的实现。党的领导不仅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命运, 更攸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最终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国家统一的政策效果、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创新上均取得了重大成就<sup>[9]</sup>。在政策实践上, 不断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夯实和平统一的基础, 推动并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 积极营造有利于中国完全统一的国际环境, 一个中国原则持续得到强化。在理论主张上, 提出了“两岸一家亲”“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两岸命运共同体”等新观念, 提出了“习五条”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等新理论、新主张。因此,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在对台工作及推进国家统一中的集中统一领导。

**其二, 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促进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1] 35</sup>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深刻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一直以来, 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有着广泛的联系, 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历史大势,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为此, 要持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 积极发挥其在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发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和发 展协商民主, 有利于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及和平统一中的作用与影响。

**其三, 激活港澳地区和海外同胞的爱国促统力量, 共担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既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又能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和发展自信心, 集聚海内外同胞爱国促统的磅礴力量。一是支持港澳地区的爱国促统力量。在历史演进中, 港澳地区与台湾地区有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联系, 包括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出现经济腾飞, 并列“亚洲四小龙”; 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实施着有别于大陆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香港曾是海峡两岸实现直航前的中转地; 港澳地区



业已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地。当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准确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态势，有利于消除台湾同胞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和偏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港澳地区爱国爱港爱澳力量能够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反“独”促统作出积极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优势作用。二是巩固海外同胞的爱国促统力量。爱国爱乡是广大海外同胞的优良传统，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建设，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祖国发展、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海外华人在推动两岸关系、遏制“台独”势力与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海外侨胞成立了旨在促进国家统一的各种民间协会；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影响居住国的政党、居民和媒体以增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积极在岛内、两岸和国际社会上营造中国统一的良好氛围<sup>[10]</sup>。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在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海外同胞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中的社会组织与人脉网络作用。

##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坚实的制度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以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其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尊重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鲜明特色。”<sup>[11]</sup>同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两岸关系的实际与台湾同胞的需求所作出的正确判断，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的重要主张。首先，一个中国原则和推进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sup>[8]</sup>其次，“一国两制”是把中国国情、两岸关系实际和台湾同胞福祉三者有机结合的最佳制度安排。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sup>[1] 53</sup>“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和平统一理论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按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香港、澳门、台湾的客观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是党和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恢复行使香港和澳门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其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持续探索和丰富“两制”台湾方案的内涵，确保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首先，正确处理好“一国”与“两制”之间关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一国

严安林, 洪志军. 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39-48.

“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科学构想, 其中如何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一国”与“两制”之间关系极为重要。“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两制”是“一国”的从属和派生<sup>[1] 170</sup>。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中, 唯有将坚持“一国”的原则基础与尊重“两制”的差异有机结合, 才能有效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为此, 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抗拒“九二共识”并声称以“对等尊严”“不设任何政治前提”进行两岸对话。实际上, 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并非中国大陆的“一厢情愿”, 而是海峡两岸双方长期互动所达成的政治共识和历史成就,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也完全印证了“九二共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简言之, 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两岸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 什么困难都可以设法解决。其次, 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为国家统一后的治理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深刻主张, 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 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sup>[12]</sup>。“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状况, 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 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2022年8月10日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阐明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特别是规划两岸统一后的治理问题, 包括“台湾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台湾内部地理幅员的差异、历史演进的特殊、政治认同的多元、产业分布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悬殊等现实问题,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丰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治理内涵提出了更为严格紧迫的理论与实践要求。

### 三、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夯实雄厚的物质基础

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也增强了大陆在两岸关系中的战略主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将致力于促成两岸经济合作, 增进台商、台胞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 最终实现综合实力与制度优势相互贯通的国家统一。

**其一, 坚持在大陆发展进步中推进和谋求国家统一是对台工作的战略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 是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两岸关系而言, 没有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厚植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制度效能, 就没有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与中国大陆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的战略主动的现实。正如《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所指出: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sup>[13]</sup> 国家统一说到底还是发展基础上的统一, 发展是推进国家统一的根本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 经济实力取得了历史性飞跃。2022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21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位<sup>[14]</sup>。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于两岸关系的前景而言, 要求持续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进步，实现好自己的发展目标，增强“牢牢把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的能力和信心，最终完成祖国完全统一。

**其二，强化两岸经济合作，接续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陆改革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87 年 11 月，两岸隔绝状态结束后，两岸人民往来和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随之发展。大陆方面积极鼓励台商投资的相关优惠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动，持续掀起了台商投资的“大陆热”。2008 年 6 月，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达成了一系列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协议，尤其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促成了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促进了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陆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其中台商投资大陆的项目数量和金额随之攀升。截至 2022 年，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 12.7 万个<sup>[15]</sup>。台企投资大陆的规模、产业和空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名誉董事长萧万长时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台胞来到大陆，30、40 年过去了，大陆有这么大的发展变化，祖国大陆的发展功劳簿上要记上台胞、台企一笔<sup>[16]</sup>。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台商、台企既凭借中国大陆的经济快速发展而获得广阔机遇和空间，又因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海外销售渠道<sup>[17]</sup>，对大陆部分企业、行业的改革和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同时也有效缓解自 2016 年以来台湾当局试图实行两岸经贸“脱钩”和 2018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经贸科技领域的大肆打压。台商、台企不仅仅是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见证者，更是持续积极奋斗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其三，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首先，祖国的发展进步为遏制“台独”势力提供了基本力量。“台独”势力及其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固守“台湾独立”理念的民进党两度上台，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层面实行“去中国化”政策，操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台独”主张，捏造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新版“两国论”。对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取得了重大进展。政治上，“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被写入党章；法律上，制定与实施了《反分裂国家法》；军事上，通过军机、军舰巡航和“围岛”军演等例行性、常态化方式有效慑压“台独”分裂势力及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政策上，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及“台独金主”“台独组织”予以精准打击与制裁。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进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陆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特别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推进极大提升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其四，中国自身的快速进步有力反制美国等外部势力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近年来，美国等外部势力持续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的重大障碍。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但当前，美国积极怂恿其盟友从政治、军事、价值观等层面操弄“以台制华”“反华挺台”伎俩，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此，中国政府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开展对外涉台重大斗争，例如针对 2022 年 8 月美众议长佩洛西窜台挑衅行径，就通过在台岛周围组织一系列联合军事活动、有原则地取消或暂停中美之间八项对话机制，对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相关个人及机构采取制裁措施等方式予以反制。正如《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所指出：“现在的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实力大

幅度增强, 更不可能再让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sup>[13]</sup> 概言之,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将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 增强历史主动和斗争能力, 有力挫败和反击“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挑衅, 为推进国家统一排除障碍。

#### 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为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提供根本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 要求加快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迈向各领域融合发展, 增进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持续弘扬和传播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 实现心灵契合的国家统一。

**其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 更是推动国家统一的坚定准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sup>[1] 20</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进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sup>[1] 53</sup> “尊重”主要表现为“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关爱”主要表现为“愿意率先给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共享大陆发展进步的成果。“造福”则表现为“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进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提高台湾同胞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增进台湾同胞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台湾同胞充满感情, 用词恳切到位。“关爱”和“造福”是两个带有浓厚感情的词汇, 特别是“造福”一词首次使用, 使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与“两岸一家亲”的重要理念熔于一炉<sup>[18]</sup>。可以说,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不仅是现阶段大陆推进和谋求祖国完全统一的遵循, 而是国家完全统一前、中、后均一以贯之的坚定准则。

**其二, 稳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迈向各领域融合发展的步伐,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大陆持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两岸融合发展深化升级, 脚踏实地、有所作为, 没有因岛内政治格局变化而调整节奏。大陆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 在政策措施中支持鼓励台胞、台企、台青、台生到大陆进行投资、就业、创业、就学, 逐步推进台湾同胞实现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先后发布实施了包括《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若干措施》(简称“31 条措施”)、《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助力台企 11 条”)、《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26 条措施”)、《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 22 条措施”)等, 从各领域为广大台胞、台商提供了充足的生活、就业、就学等方面的制度化、法律化保障, 深化两岸同胞“同等待遇体系”, 贯彻落实“两岸一家亲”理念, 真正做到了“发展为了台湾同胞”“发展依靠台湾同胞”“发展成果同台湾同胞共享”的承诺。相较于大陆扩大和增进台胞切身福祉的做法, 民进党当局不遗余力地成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以各式各样的借口阻挠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与往来，尽显处理两岸关系的无能、失能。

**其三，继续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国家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sup>[11]</sup>，“在夯实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sup>[1] 21</sup>。同样地，我们所追求的国家完全统一，不仅仅是形式的统一，更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统一。为此，必须继承和弘扬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华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二十大报告均鲜明指出“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sup>[1] 53</sup>。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同是炎黄子孙。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瑰丽灿烂，展现于两岸同胞生活的多个方面，既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思想宝库和精神家园，更是维系两岸同胞民众情感的重要纽带。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能够持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内涵，更能增进和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防范和抵御“文化台独”“教育台独”逆流的侵袭，为两岸统一奠定强大的社会、思想基础和根本动力。基于历史因素，海峡两岸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各自精彩的重要贡献。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具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优秀特质。因此，文化价值视角下中国大陆推进和实现的国家统一，不是消灭差异的统一，不是定于一尊的统一，而是多元互鉴的统一、求同存异的统一、心灵契合的统一。

## 五、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强化一中原则的国际格局和提升涉台国际话语权，营造实现国家统一的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也将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推进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巩固深化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与构建涉台国际话语权中实现国家统一。

**其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使然，也是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必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加剧，世界呼吁与需要更多更大的和平稳定力量，推动世界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理论观念与实践行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稳定的正能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理念与中国智慧，积极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倡导和促成以政治对话解决危机、冲突，增进世界的持久和平稳定<sup>[19]</sup>。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创新和突破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更多选择，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当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和放弃自身正当的核心国家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sup>[20]</sup>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这不仅体现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联合国



宪章》原则上, 更体现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中。概言之, 中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上获得了快速进步和显著成就, 也坚持在走和平发展道路过程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进和实现国家统一。国际社会也期待一个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继续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挥更大作用。

**其二,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中持续强化一个中国原则, 阐明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与提升国际话语权, 营造国家统一的良好外部环境。**首先, 强化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就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伴随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攀升,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 一个中国原则也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与强化。当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有 182 个, 而台湾当局所谓“友邦”则仅剩 13 个, 更多国际组织将一个中国原则奉为重要的工作准则。其次, 要打破美国及外部势力将中国国家统一与走和平发展道路对立起来的谬论。实际上,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国家统一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中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持续把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持续助力实现国家统一。美西方有关国家出现上述错误认知的原因在于美国等外部势力持续散播“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说”, 过分夸大中国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和刻意捏造“时间表”, 刻意将中国统一与称霸扩张关联起来。

关于采取非和平方式的条件, 《反分裂国家法》中写明“‘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sup>[21]</sup>。关于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与反对称霸扩张的问题, 中国长期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sup>[22]</sup>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同时, 我国仍应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清晰传播与说清楚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对台大政方针与大陆反制“台独”势力与外部势力的正当性、必要性。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前提条件, 也是推进国家统一的有效保障和有力支撑。

##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 and 实践中推进与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唯一的康庄大道, 民族复兴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完全统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要求。历史与现实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得通、行得稳的正确道路, 有利于牢牢把握着两岸关系的战略主动。面对未来国内外未知的风险挑战及台海地区的惊涛骇浪,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保持战略清晰、战略自信和战略主动, 也必将为促进和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创造有利条件，为统一后的两岸关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25.
- [2] 史晓东.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J]. 台湾研究，2022（6）：1-9.
- [3] 孙亚夫.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J]. 台海研究，2018（3）：1-2.
- [4] 王英津.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发展创新与时代意义 [J]. 台海研究，2022（1）：1-13.
- [5] 张亚中. 从二十大报告看两岸关系的未来 [EB/OL]. (2023-01-12) [2023-04-07]. <http://hk.crntt.com/doc/1065/3/7/3/106537321.html?coluid=33&kindid=4372&docid=106537321&mdate=0120132902>.
- [6] 刘相平.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核心内涵及其实践路径初探 [J]. 台湾研究集刊，2023（1）：1-16.
- [7] 李应博.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EB/OL]. (2023-02-15) [2023-04-07]. [https://www.gmw.cn/xueshu/2023-02/15/content\\_36368750.htm](https://www.gmw.cn/xueshu/2023-02/15/content_36368750.htm).
- [8] 习近平. 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10 月 9 日） [N]. 人民日报，2021-10-10（2）.
- [9] 严安林. 论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推进两岸统一的历史性贡献 [J]. 台湾研究集刊，2021（3）：8-17.
- [10] 蒙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3.
- [1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2023-02-08（1）.
- [12]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栗战书出席 汪洋主持 [N]. 人民日报，2019-01-03（1）.
- [13]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23）：12-22.
- [14] 2022 年我国 GDP 突破 120 万亿元增长 3% [EB/OL]. (2023-01-17) [2023-04-07]. [http://www.news.cn/fortune/2023-01/17/c\\_1129292803.htm](http://www.news.cn/fortune/2023-01/17/c_1129292803.htm).
- [15] 大陆台企这十年：在大时代成就大梦想 [EB/OL]. (2022-09-30) [2023-04-07]. [http://www.news.cn/tw/2022-09/30/c\\_1129045832.htm](http://www.news.cn/tw/2022-09/30/c_1129045832.htm).
- [16] 追梦筑梦圆梦 | 40 年，台商与祖国共成长 [EB/OL]. (2019-01-02) [2023-04-0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1539783751940067&wfr=spider&for=pc>.
- [17] 王建民，李海燕. 台商与大陆改革开放 40 周年——台商是大陆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 [EB/OL]. (2018-10-12) [2023-04-07]. [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rdzt/2018ggkf/2/201810/t20181012\\_800144045.html](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rdzt/2018ggkf/2/201810/t20181012_800144045.html).
- [18] 中评论坛：二十大与对台总体方略 [EB/OL]. (2023-02-01) [2023-04-07]. <http://www.crntt.com/doc/1065/6/4/1/10656411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6564112&mdate=0201085610>.
- [19] 李强.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二三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日，海南博鳌） [N]. 人民日报，2023-03-31（2）.
- [20] 习近平：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核心利益做交易 [EB/OL]. (2013-01-30) [2023-04-07].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130/c1004-20369774.html>.
- [21] 反分裂国家法 [EB/OL]. (2005-06-21) [2023-04-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6/21/content\\_8265.htm](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6/21/content_8265.htm).
- [22] 习近平. 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2021 年 4 月 20 日，北京） [N]. 人民日报，2021-04-21（2）.

责任编辑：刘泮菡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 原创性贡献

陈云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党的侨务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侨”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独特机遇”和“宝贵资源”，并对海内外侨情、侨务工作、侨务资源、维护侨益等作出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爱国贡献论——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肯定海外侨胞的地位和作用；侨务资源论——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方面认识侨务资源的特殊价值；“根魂梦”论——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梦多重维度阐述海外侨胞与中国的内在关系；统一动力论——从海外侨情变化视野明确侨胞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特殊力量；友好桥梁论——从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民间外交、展示中国形象视角论述海外侨胞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的综合价值；维护侨益论——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层面强调新时代维护侨益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独创性思想贡献丰富发展了党的侨务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侨务篇。

**关键词：**华侨华人；侨务工作；侨务理论；海外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3）04-0049-11

---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4.006

**作者简介：** 陈云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2BDJ080）；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究”（22MLB003）

**引用格式：** 陈云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49-59.

侨务工作作为一项关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党的侨务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侨”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独特机遇”和“宝贵资源”，并对海内外侨情、侨务工作、侨务资源、维护侨益等作出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形成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深中肯綮、影响深远的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近年来，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是源起发生研究。相关学者认为该重要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为思想基石，既吸收了中共历代领导人的侨务价值观、侨务改革观、侨务民生观、侨务外交观，又继承了习仲勋同志的侨务思想<sup>[2-5]</sup>。二是基本内涵研究。有学者认为该重要论述主要围绕“一个根本主题”“两项核心理念”“三种重要作用”等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具体内容展开<sup>[6]</sup>；包括率先提出“大侨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宗旨，精准概括海外中华儿女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高度赞扬华侨华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开放和促进中外友好中的作用，支持鼓励华侨华人为居住国作贡献等方面，彰显浓厚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历史情怀、人民情怀、世界情怀<sup>[7-9]</sup>。三是价值意义研究。有学者认为该重要论述的价值意义集中体现在涵养侨务资源，构建“大侨务”、凝聚侨心共圆中国梦，发挥侨胞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中的独特作用<sup>[10-11]</sup>。

现有研究较为详实地回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动因、理论基础、内涵要义、特征价值、践行逻辑，较为深入地阐述了该重要论述与毛泽东、邓小平、习仲勋等人侨务思想的内在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走进当代并指导新时代侨务工作。同时，当前研究呈现“双融入”趋势，即“理论梳理”融入“现实考察”、“侨务研究”融入“党史研究”<sup>[12]</sup>，这为未来深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当前研究存在若干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简要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而缺乏深度把握其对党的侨务理论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二是未能与时俱进地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三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而对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浙江、上海工作时期的关注还不够，相对缺乏从侨乡工作至今的全程贯通式研究。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 一、爱国贡献论：肯定海外侨胞的地位和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既有世界移民的共性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外部资源，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力，更是因为数量庞大的华侨华人对母国和家乡<sup>①</sup>怀有特殊情感，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到过特殊作用。习近平敏锐地捕捉到了海外侨胞对祖（籍）国的这种浓烈又特殊的情感，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度肯定海外侨胞的地位和作用。

---

<sup>①</sup>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籍法的视野下，中国非华人政治上的祖国，而是文化和血缘层面的“家乡”或“母国”。因此，“爱国”仅限于华侨，华人只能以“爱乡”来表述其对中国的感情和联系。

### （一）海外侨胞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精神传统

客观认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精神传统是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首要条件。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留学海外、出生侨乡或本身就是华侨，这种特殊经历和身份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华侨，并对华侨的爱国主义有着真切体会。历史上，海外华侨倾力支持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并掀起了以支援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两次爱国高潮，这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继续发扬爱国爱乡精神传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正是基于对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特质的深刻洞察，才提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和“独特机遇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这契合了海外侨胞的共同利益和热切期盼。同时，习近平还将海外侨胞视为新时代中国最重要的海外爱国力量，强调要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和海外统一战线工作。

海外侨胞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对中国总有一种血浓于水、无法割舍的亲情，心灵深处渴望中国强大，并时刻关心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兴衰、民族的荣辱时刻牵动着“侨心”。习近平指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sup>[13]</sup>同时，他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大会及各种涉侨大会上，多次颂扬海外侨胞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和爱国行动。特别是当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海外侨胞心系祖国和家乡，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疫。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向踊跃提供援助的海外侨胞表达了谢意，对其在抗疫中的作用也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表明，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家国情怀的肯定彰显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够成为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精神旗帜。新时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特殊背景下，爱国爱乡作为再造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话语，能够充分激活他们支持民族复兴事业的集体记忆，并被赋予鲜明的时代内涵。

### （二）海外侨胞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近代中国国运不济、民族危亡之际，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的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洋务救国”“立宪救国”“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文化救国”等进步事业，并为“振兴中华”作出了不朽贡献。新中国成立伊始，大批华侨精英毅然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国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发展、对外交往贡献了侨力。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以极大的热情和空前的规模，率先参与和助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并为中外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促进港澳回归和发展两岸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海外侨胞在与祖国和家乡互动中凝结的爱国爱乡精神，既是伟大侨力生成的内在驱动力，又是党团结侨胞、做好海外统战工作的精神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海外侨胞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强调侨史资源是促进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2020 年 10 月，他在汕头参观侨批文物馆时指出：“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sup>[14]</sup>他在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中、会见世界侨团联谊大会代表时也阐发了海外侨胞对于中国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平统一以及对外交往的战略价值。从话语角度看，习近平反复强调海外侨胞对祖国和

家乡的贡献，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一种凝聚侨心的话语表达，根本旨趣在于最大限度凝聚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嘉庚先生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其爱国爱乡精神穿越时空同样受到习近平的称赞。无论是在侨乡福建工作还是中央任职，习近平始终不忘陈嘉庚先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2014年10月，他在给厦门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回顾了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感人事迹，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sup>[15]</sup>。2021年4月，他在致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中也指出：“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sup>[16]</sup>可见，习近平知侨、懂侨、爱侨、惜侨，熟悉侨史，感念爱国侨领对祖国的突出贡献。

## 二、侨务资源论：明确新时代涵养侨务资源的基本策略

海外华侨华人之中蕴含的丰富侨务资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民族复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习近平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指出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得益于充分利用侨务资源。侨务资源作为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战略资源，具有属地性、广泛性、组织性、市场性、民族认同性、地区差异性等鲜明特点，能够助力中国高质量吸引外资及有效缓解当前面临的高端人才缺乏的压力。

### （一）侨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资源

与一般外国投资者不同，海外侨商或多或少包含着对祖国和家乡的情感因素，即“文化共识”。重视吸引侨资是党的领导人的普遍共识。习近平长期在侨乡工作，对侨资作用的认识深刻且具特色。新时代侨资规模趋于大型化，联合投资日益兴起，科技型侨企比重增加，同时我国对海外高精尖技术、人才、关系网等需求更为迫切。近年来我国吸收外资的方式、领域呈现多样化，习近平多次指示要精准引进侨资，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他还深化了对侨资价值的认识，从单一物质层面拓展至多个维度，将侨资与侨智、侨网等整合为侨务资源，这是侨务话语、概念、思维、理念等方面的综合创新。他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广大华侨华人功不可没。30多年来，华侨华人发挥在资金、技术、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各地投资兴业，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作。”<sup>[17]</sup>一方面，中国借助侨资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找到了改革开放的“启动金”，侨资推动了市场经济因素的成长，中国由此成为市场机制和贸易导向的经济体，并将新的企业制度、管理方式、思维理念等带入国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新活力。另一方面，广大侨商也吃到了中国发展的“红利”，纷纷将研发和生产基地留在大陆，极大地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

### （二）侨智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宝贵资源

检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现代学科体系创建和科技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个时代的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群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做侨务引智工作，多次接见华裔科学家，大批海外杰出人才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邓小平等将引进侨智作为加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



重要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用战略眼光重新审视华裔人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价值。

一方面，将引进侨智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深度融合。在新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时代，华裔人才是全球“抢人大战”的焦点，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将引进侨智置于科技创新与民族复兴的视野中，认为海外侨胞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雄厚的经济力、广泛的商业网，且蕴藏丰富的智力资源。这不仅跳出了侨务资源等于侨资、侨汇的传统视域，全面准确地把握侨务资源的时代内涵，而且洞悉侨务资源中“含金量”最高的侨智，将其提升到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建立和健全引才、用才机制，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华裔人才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度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以中国梦为感召加大海外引才力度。习近平基于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时代与未来广阔视野，将引进华裔智力与实现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用中国梦凝聚、吸引和争取侨心，又主张通过引进侨智助力实现中国梦。2014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sup>[18]</sup>海外侨胞具有明显智力优势，并在国际科技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将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大有作为。

### 三、“根魂梦”论：明确新时代侨务工作的主线

我国先民因躲避战祸、跨洋谋生、渡海传道离开祖国和家乡，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可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毛泽东基于海外华侨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角度，致力于引导他们与国内民众共同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浪潮。邓小平等基于海外侨胞与国内民众在资金、技术、事业等层面客观存在的领先性和“视角差”，更多地强调借助“海外关系”开启改革开放之路。习近平则从多重维度对“侨胞—中国”关系进行阐述，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sup>[13]</sup>。

#### （一）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

习近平从血缘和亲情角度重申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强调他们在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不能缺场。2014年6月，他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在世界各地有几千万海外侨胞，大家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sup>[13]</sup>2015年9月，他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招待会上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等比较感性的话语表达海内外同胞特殊的亲缘关系。习近平还多次使用“海内外同胞”“中华儿女”“中华民族”等话语统称中华民族或其海外成员，这能够激发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当新冠疫情出现时，海外侨胞是最早了解、最为关注、最先采取行动支持祖国和家乡抗疫的群体。据调查，侨胞对中国抗疫表示支



持，近 80%的侨胞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抗疫<sup>[19]</sup>。中国同样支持海外侨胞抗疫，向其寄送“侨爱防疫包”，开通 24 小时服务热线，这生动诠释了海内外同胞同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血缘亲情。

### （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认同能够避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政治认同的敏感性。毛泽东侧重发挥海外侨胞的政治力为民族独立富强服务，邓小平更多强调侨胞的经济力、科技力。习近平非常重视海外侨胞的文化力，作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这一重要论断。新时代党和国家以中华文化为纽带，通过邀请海外侨胞回国参加共祭始祖、姓氏寻根、人文交流等活动，强化祖先认同、进行文化再造、激活文化基因，筑牢海内外同胞共同的文化根基。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sup>[13]</sup>。可见，中华文化作为塑造海外侨胞精神世界的核心要素已被赋予特殊使命。同时，习近平强调文化认同这一“最大公约数”，这对于展示海外侨胞良好形象、加强侨社团结统一、强化“文化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准确把握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系是党的侨务理论的立论基础。习近平对海外侨胞梦与中国梦的关系作了系统阐发，其侨务工作重要论述也是围绕中国梦这一主线展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党和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唤醒海内外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话语。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sup>[13]</sup>。他常用“民族复兴”话语凝聚侨心、构建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目的是引导侨力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实际上，中国梦与侨胞梦是辩证统一、双向互动的关系。实现中国梦需要汇聚侨力、侨智，海外侨胞是中国梦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梦也要惠及海外侨胞，由全体中华儿女共享。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民族复兴贯穿侨务工作，强调侨务工作要服务于民族复兴总目标，通过邀请海外侨胞共同参与民族历史集体纪念活动，增强其对民族复兴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

## 四、统一动力论：明确海外侨胞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特殊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系统阐述了如何借助海外侨胞力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思想，成为其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海外侨胞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坚定支持者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sup>[20]</sup>中国是世界性的侨务大国、强国，海外侨民有数千万之巨。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海外侨胞在祖国和平统一中的作用作了肯定性评价。他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sup>[21]</sup>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前提就是大陆与台湾在各

个层面的理解和沟通。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的特殊成员，爱国爱乡是其基本属性，他们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期盼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海外侨胞会有意识地向台湾社会正面、客观地介绍和宣传大陆对台方针政策，能够以“局外人”的视角和身份促进两岸的理解和沟通。

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联系密切，易于引导国际舆论，对中国和平统一意义重大。习近平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sup>[22]</sup>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当局在海外侨社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将其视为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推行“务实外交”和增强自身实力的“最重要资源”。因此，要实现祖国统一，必须善于凝聚侨务资源，团结中华儿女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006年5月，习近平在纽约华侨华人欢迎晚会上指出：“希望各位侨领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不负众望，服务同胞、团结协助、共谋福祉，为华人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sup>[21]</sup>

## （二）侨务对台工作是侨务工作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侨务对台工作是指从侨务工作渠道、通过华侨华人开展对台湾岛内外社团和人士的争取团结工作，以建立反对“台独”、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统一战线。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sup>[23]</sup> 习近平清醒地意识到，有效沟通是两岸理解互信的第一步，台湾许多家庭都有“海外关系”，与海外侨胞在意识形态、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较多共识，因此侨胞在两岸化解误会、协商对话、和平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习近平指出：“在抓好中小侨工作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做好大侨的工作，这样就等于掌握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金钥匙’。”<sup>[24]</sup> 他认为侨务工作的重点是新生代侨胞，他们是助力祖国和平统一的特殊生力军，这为新时代侨务对台工作指明了方向。2004年4月，习近平到浙江侨务机构调研时强调：“侨务工作要切实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侨服务，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服务。”<sup>[25]</sup> 该讲话虽然是他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地方侨务工作的具体指示，但对于新时代国家层面的侨务工作同样具有重要启示价值。新时代海外侨胞在推进两岸和平发展过程中大有可为，其中遍布世界的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及民间团体，召开洲际性大会共同探索中国和平统一的路径，积极促进两岸人民在探亲、旅游、经贸、科技、教育、学术、文艺、体育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

## 五、友好桥梁论：明确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点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和中国现代化激荡交织的进程中，中国日益深度融入世界，海外关系和侨务资源对我国发展的价值更为凸显。中国的强大需要硬实力，也需要道德、文化、形象等方面的软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洞悉世情、国情和侨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客观事实审视侨务工作，拓展“以侨为桥”思想，认为侨胞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在沟通中外方面具有超越官方外交的特殊优势。他强调：“通过以侨为桥，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日益增多。这些双向的交流推动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sup>[24]</sup> 可见，习近平对侨务资源的认识维度更加丰富，更多阐述其对助力中国走向世界的综

合价值。

### （一）海外侨胞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

一方面，立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认识海外侨胞的文化价值。习近平强调：“海外中华儿女到中国寻根，说明大家对祖（籍）国有着强烈的亲近感，认识到自己血管中涌动的是中华血脉，都愿意传承和发扬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sup>[26]</sup>这深刻论述了海外侨胞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及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另一方面，重视发挥海外侨胞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特殊作用。与中国综合实力快速跃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不容乐观，为此习近平赋予海外侨胞以特殊的文化价值，强调他们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2015年9月，他在西雅图出席侨宴时提出：“希望大家积极主动宣介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每一位旅美侨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使者，希望你们身体力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夯实中美关系民意基础。”<sup>[27]</sup>他还号召海外侨胞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和使者，从“接受者”转为“传播者”，做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代言人和贡献者。

### （二）海外侨胞是民间外交的使者

民间外交历来是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习近平指出：“侨务工作的主体在海外，优势在海外。”<sup>[21] 265</sup>在他看来，海外侨胞了解住在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熟悉海外市场的运作模式，在开展民间外交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当国家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时，海外侨胞是“民间大使”；当国家关系交恶时，他们是“润滑剂”；当国家关系处于蜜月时，他们常做锦上添花之事。在侨乡工作时期，习近平就已思考“以侨为桥”问题，即如何借助海外侨胞遍布全球的商业、贸易、金融网络助力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新时代，他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期待，提出要积极开展侨务公共外交。他指出：“海外侨胞要运用自身优势和条件，积极为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更好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sup>[18]</sup>华裔新生代是海外侨社的未来和希望，习近平高瞻远瞩地认为他们能在侨务公共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勉励他们“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国家和人民了解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成为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民间使者”<sup>[13]</sup>。

### （三）海外侨胞是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

系统阐述海外侨胞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一大亮点和原创性内容。习近平认为海外侨胞是中国形象的展示者，能够用当地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近距离地向世人讲清楚、讲完整、讲透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理念，充分展现中国可信、可爱、可敬的国际形象。2014年9月，他在会见马尔代夫华侨华人时提出殷殷嘱托：“积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要树立我们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树立我们中华文明的良好形象。”<sup>[28]</sup>在实践中，一方面，通过全方位侨务外宣工作让海外侨胞了解我国的治国理念、发展成就和外交政策，使其在真实、立体、全面、客观认识中国的基础上肩负起传播中国形象之重任。另一方面，通过塑造海外侨社形象和侨民形象展示中国形象。近年来，西方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中国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沉渣泛起，海外侨胞在不少国家遭受种族歧视、融入困境甚至辱骂暴力。如何维护中国形象和侨民形象，对党和国家侨务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 六、维护侨益论：明确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基本职责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但晚清以前政府一直严防民众出国，视华侨为“化外之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维护侨益，新中国成立后就制定了一系列包括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国籍、保护华侨及归侨侨眷权益等在内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sup>[29]</sup>。伴随世情、国情和侨情的变迁，虽然党和国家维护侨益的具体内容、措施不断变化，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派船接回大批难侨，到新时代习近平多次派专机接回遭遇险境的海外中国公民，党和国家坚决维护侨益的立场和政策、思想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

### （一）维护侨益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海内外侨情所决定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适应‘走出去’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sup>[20] 60</sup>。一方面，海外侨胞系中华民族的海外支脉，是中国“出嫁的女儿”，与国内同胞同根同源、荣辱与共，其民族属性、爱国爱乡传统、历史贡献及潜在价值等，都内在要求党和国家必须维护侨益。另一方面，侨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保护。从地方到中央、侨乡实践到大国治理，习近平在不同任职阶段对维护侨益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始终强调侨务工作要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宗旨，为海外侨胞排忧解难，并通过护侨、撤侨等手段坚决维护侨益，以彰显侨务工作的人民性和侨本性。2015年也门撤侨，我国仅用1天时间就将滞留的571名侨胞全部撤离；同年尼泊尔撤侨，我国派出2架客机将处于地震中的侨胞带回祖国；2023年苏丹撤侨，我国派军舰将1300多名侨胞安全转移。海外撤侨既是中国形象的全面展示，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系海外侨胞安危、践行以侨为本理念的突出体现。

### （二）以侨为本是新时代侨务工作的红线

习近平比较早地洞悉到保护海外侨商经济利益的战略价值，针对海外侨胞来华投资，前瞻性地阐述了“对投资者有利”的思想，将引进侨资与维护侨益、凝聚侨心统一起来，主张不要“工具化”看待侨胞，摒弃“喜新厌旧”“嫌贫爱富”“见利忘义”等错误思想认识。浙江工作期间，他明确指出侨务工作“两个服务”理念，即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和全心全意为侨胞服务，强调侨务工作的立足点是为侨服务，要“尊重和爱戴侨胞”。同时，他将国家利益和侨胞利益统一起来，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层面强调新时代维护侨益的战略意义，并向侨胞承诺：“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继续关心和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在当地的创业与发展，切实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广大侨胞提供优质服务”<sup>[21] 265-266</sup>。这在学理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上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情感上温暖了侨心，实践上有助于铸牢海内外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我国侨务工作鲜明的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为民情怀。

### （三）侨务干部是“贴心人”和“实干家”

侨务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且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因此，建设一支熟悉侨情、心系侨胞、热心侨务的干部队伍，是解决侨务工作“为了谁、依靠谁”和“做什么、怎么做”

的基础条件，也是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目标、新布局、新战略和海内外侨情的深刻变迁，在准确把握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关系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将“贴心人”“实干家”作为新时代我国侨务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并希望他们进一步增强为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力求为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提供热情、高效、优质的服务。习近平熟悉侨情、热心侨务、关爱侨胞，要求侨务干部在实践中做到“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sup>[30]</sup>。侨务干部当好侨胞“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实干家”，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维护侨益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侨务干部的价值追求与责任担当。

## 七、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海外侨胞、侨务工作、侨务资源置于治国理政视域中加以审视，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侨务理论的论域和视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世情、国情和侨情的变化，阐明侨胞的政治功能，并将侨力拓展至其他领域，强化侨胞对于改革开放、侨乡建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经济价值，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化意义，对于中国科教文卫事业的重要作用。同时，习近平创造性地将侨务工作的范围拓展至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强调侨胞是架起两岸交流、合作、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习近平还将侨胞视为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怀着对“侨”的深厚感情，亲自谋划、指导侨务工作，并对海内外侨情、侨胞贡献、侨务实践、侨联工作、侨务文化、侨务资源等都作出系列原创性阐述。该重要论述明确了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这一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根”“魂”“梦”为侨务工作主线，“三有利”为侨务工作原则，“大侨务”为侨务工作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侨务工作重点，“贴心人”“实干家”为侨务队伍建设基本要求。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独创性的思想贡献丰富发展了党的侨务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侨务篇。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陈云云. 习仲勋侨务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49-160.
- [3] 杜淳. 统一战线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侨务思想的理论传承与创新——以毛泽东、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为中心的考察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24-31.
- [4] 张春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之实践与理论渊源探析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9(3): 1-7.
- [5] 李其荣. 习近平侨务思想与新时代侨务工作 [J]. 丽水学院学报, 2019(3): 48-52.
- [6] 张克兵, 黄清迎.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三维解读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1): 86-91.
- [7] 任贵祥. 习近平关于侨务问题的重要论述及丰富内涵 [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8(2): 31-39.

- 陈云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49-59.
- [8] 张国雄. 习近平侨务“大局观”的继承与发展 [J].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 6-10+15.
- [9] 张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论述的五重情怀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5): 181-187.
- [10] 林琳. 以习近平侨务论述为指导 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J]. 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 1-5.
- [11] 吴桂韩. 运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最新成果指导新时代侨务工作 [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1): 5-9.
- [12] 贾梦茜, 金新. 中国共产党侨务政策的百年演进: 历程、机理与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51-59.
- [13] 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 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14-06-07 (1).
- [14] 习近平肯定华侨贡献 [EB/OL]. (2020-10-14) [2023-04-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490274763023786&wfr=spider&for=pc>.
- [15] 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 [EB/OL]. (2014-10-22) [2023-01-23]. <https://news.12371.cn/2014/10/22/ARTI1413943647375878.shtml>.
- [16] 习近平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 [N]. 人民日报, 2021-04-07 (1).
- [17]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 [EB/OL]. (2013-09-25) [2023-02-07]. [https://www.gov.cn/ldhd/2013-09/25/content\\_2494744.htm](https://www.gov.cn/ldhd/2013-09/25/content_2494744.htm).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64.
- [19] 张春旺, 张秀明. 世界侨情报告·2021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4.
- [2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58.
- [21]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 266.
- [2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7 月 1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0.
- [23]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24] 习近平. “大侨务”观念的确立 [J]. 战略与管理, 1995 (2): 111-113.
- [25] 习近平强调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N]. 浙江日报, 2004-04-14 (1).
- [26] 2010 年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 习近平出席并讲话 [N]. 光明日报, 2010-07-26 (3).
- [27] 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的讲话 (2015 年 9 月 23 日, 西雅图) [N]. 人民日报, 2015-09-25 (2).
- [28] 习近平幽默插话聊文明: “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 [EB/OL]. (2014-09-17) [2023-05-07].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9-17/6598173.shtml>.
- [29]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64-1065.
- [3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李克强作出批示 [EB/OL]. (2017-02-17) [2022-12-25].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2/17/content\\_5168827.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02/17/content_5168827.htm).

责任编辑: 刘泚菡





# “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 ——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薛庆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阐发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历史内涵和深远时代意义，特别是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邓小平在推进“第二个结合”方面做出了示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立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新征程将以“两个结合”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继续深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改革开放；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060-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的“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概括、新的理论判断和新的理论定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4.007

**作者简介：**薛庆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引用格式：**薛庆超.“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60-79.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sup>[1]</sup>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sup>[2]</sup>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阐发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历史内涵和深远时代意义，特别是为科学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方面中华民族面向整个世界敞开了巨大的胸怀，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风云变幻，各种思潮潮起潮落，呈现出激烈交锋的局面。面对世界上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局面，中华民族要在世界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华民族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才能在动荡不已的国际环境中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守正创新、阔步前进。

目前，学界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学者从现实、历史和理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质就是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sup>[3]</sup>。有学者重点分析“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认为从历史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不同层面的融合过程；从理论维度而言，“第二个结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从现实维度而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要直面“中国之问”的求解，更要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实现“问题域”的转变，以此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sup>[4]</sup>。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结合角度，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实践成果进行研究与展示。

## 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进“第二个结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 （一）邓小平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邓小平从幼年起开始接受严格的农村私塾教育。他 5 岁进入私塾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性著作——曾经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等背诵得滚瓜烂熟，并且按照严格规范的传统要求要求进行写毛笔字的训练，奠定了遒劲有力的“邓体”书法基础。7 岁开始，邓小平进入协兴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国文（中国语文）、体操（体育）、国画（中国画）等课程。1915 年秋天，邓小平转学插班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后来，广安县财政局办公室即为邓小平当年读书时的教室），学习国文、算术、理科（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历史、地理、修身（道德教育）等新式教育课程。1918 年夏天，14 岁的邓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读书，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博物、修身、体操等。邓小平通过农村私塾、协兴初级小学堂、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广安县立中学，受到了系统完整的基础教育，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科学的初步基础。然后，他到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从戎马倥偬、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时期到日理万机、宵衣旰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一直保持着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身学习、终身阅读的习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经常利用一切休闲时间，见缝插针，随时随地读书。邓小平经常阅读的书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另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他百读不厌的主要是两套书：一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著作《资治通鉴》（毛泽东曾系统阅读《资治通鉴》17 遍），一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性读物《康熙字典》。这两套书从革命战争时期便伴随着他，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不知道他究竟阅读过多少遍。因为岁月久远，这两套书的纸张早已发黄。于是，每当这两套书出现破损时，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用胶布粘贴修补一下；后来有了透明胶带，每当这两套书出现破损，工作人员就用透明胶带粘贴修补。因此，这两套书里面，很多地方贴着胶布和透明胶带。工作人员多次建议，将这两套书送给国家博物馆，给他重新购买新的《资治通鉴》和《康熙字典》，他坚决不同意<sup>①</sup>。同时，邓小平注重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曾经仔细阅读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撰写的反映美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头著作《光荣与梦想》。这本巨著重点反映从 1932 年美国罗斯福执政到 1972 年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了邓小平的心智，他从中汲取了许多深邃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历史智慧。邓小平的家人回忆说，邓小平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书。邓小平从头到尾通读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最爱阅读的是《三国志》。在现代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上演了现代版的“三国志”——中国、苏联、美国之间的互相博弈与彼此之间的力量消长，主导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邓小平一位女儿说，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事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统统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sup>[5]</sup>。1961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杨静仁汇报西藏工作。其间，邓小平针对当时某些基层具体工作中出现的“瞎指挥”问题，明确指出：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了严

<sup>①</sup>根据笔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谈话记录，谈话记录原件存笔者处。

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

邓小平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sup>[6]</sup>据邓小平家人回忆，有两个历史时期邓小平阅读《资治通鉴》的时间最多：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遇到暂时的严重困难，急需从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借鉴治国理政的方法；一个时期是“十年动乱”时期，邓小平被下放到位于江西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进行劳动改造，需要从历史典籍中获得早日消弭内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历史镜鉴。

在邓小平政治生涯最艰难的岁月里，阅读文史著作是他战胜困境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道，从北京到江西初期，邓小平和家人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运去的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里面是他们离开北京时打包的“邓小平藏书”。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两拍’、《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和《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及现代作家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等等；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有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大仲马、莫里哀、萧伯纳、泰戈尔、海明威等等的诸多作品；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当然，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sup>[7]</sup>

正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以及中外文学作品，使邓小平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中沉稳淡定，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心情。书籍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进步的精神营养。读书可以增长智慧，阅读历史著作可以增强经邦济世的本领。邓小平的女儿曾感叹道：从北京运到江西的这又沉又重的几大箱子书，真是我们的宝贝啊。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解除寂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sup>[7]</sup>。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最喜欢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被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称为“半个红学家”。

关于邓小平在江西期间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情况，其女儿邓榕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详细回忆道：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受益匪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sup>[8]</sup>。1972年12月5日，兴国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到即将返回北京工作的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

书籍，有些还是厚厚的古代历史书籍。卓琳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1976年邓小平再次身处逆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依然伴随着他的日常生活。1977年7月他再次恢复工作，领导中华民族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80岁生日。当天，女儿邓榕在刊登着《在江西的日子里》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上面写着：“老爷子，这是我和平平送你的生日礼物，请阅。毛毛，8月22日。”邓小平高兴地看了这份非同寻常的生日礼物，在报纸上面亲笔批示“看了，写得真实”<sup>①</sup>。

邓小平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新将“实事求是”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强调“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sup>[6] 357</su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全党全国人人皆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代代传承。特别是邓小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和《礼记·礼运篇》中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小康”的期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历史智慧和灵感，赋予“小康”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政治含义，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征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奔小康”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最大共识。全国上下，男女老少，人人皆知，朗朗上口，明白晓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对“小康”的千年期盼。

## （二）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领导全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认为“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以柔克刚”“劲气内敛”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处世之道。毛泽东将“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古为今用、点石成金，赋予评价邓小平的崭新政治内涵。邓小平早年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就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具有高屋建瓴、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指挥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水平，旗帜鲜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1956年，他开始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年动乱”初期，邓小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邓小平“人才难得”。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

当时，毛泽东以“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sup>[9]</sup>评价邓小平。1973年12月，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央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1973年12月14日，在毛泽东召集的由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

---

<sup>①</sup>江西省南昌市小平小道陈列馆展览的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照片上面有邓小平亲笔批示和毛毛写的向邓小平祝贺生日的话。

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sup>[9]</sup><sup>1991</sup> 次日上午,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由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都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sup>[9]</sup>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sup>[9]</sup>毛泽东历来对中央党政军领导成员要求严格,很少予以高度评价。因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殊为难得,尤其是评价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sup>[9]</sup>,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这个评价既说明了邓小平待人和气、与人为善的个性,又展示了邓小平意志坚定、政治能力强的特质。毛泽东具有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其善于点石成金,古为今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sup>[9]</sup>,是为推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制造舆论,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邓小平雷厉风行,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名,1974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讲坛上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1975年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邓小平迅速领导开展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大见成效,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奠定彻底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sup>[10]</sup>“同年(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sup>[10]</sup>这是历史的结论。

邓小平“三落三起”“愈挫愈奋”,知难而进,斗志昂扬。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邓小平首先表示:“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sup>[11]</sup>接着,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七十三岁了,想再活二十年到三十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外国通讯社讲我七十四岁,给我加了一岁,实际是七十三岁。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sup>[11]</sup>最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表示:“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



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sup>[11] 69-70</sup>从邓小平恢复工作到逝世，整整 20 年，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列宁于 1897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写道：“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sup>[12]</sup>邓小平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6] 3</sup>。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中国共产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邓小平指导全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制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导全党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大门。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党和国家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2000 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问道：“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江泽民回答：“在中国，这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

邓小平的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 20 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奔腾向前，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sup>[13]</sup>

###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启时代大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著名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微言大义、内涵深邃、寓意丰富的成语、典故、寓言、故事，犹如星汉灿烂，不可胜数。这既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藏。其中，解放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周易》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就蕴含着世界上万事万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类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才能顺利前进的含义。这种适应就要求解放思想而不是束缚自己的思想。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sup>[14]</sup>

“实事求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二十四史》。东汉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里写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但是，中国古代强调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只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治学方法。唐朝颜师古注释“实事求是”时，将其界定为“务得事实，每求真也”。就是说，根据古代经典书籍和历史材料去研究探索思想精义，即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也。近代以降，“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愈益得到重视和传播。湖南湘乡东山学堂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地方。该校章程中明确写着：“穷则变通，苟非事实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浙江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则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1914年天津北洋大学将“实事求是”确立为校训。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迁入岳麓书院，校长宾步程为该校题写“实事求是”的匾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古为今用，点石成金，将“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基因，代代相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多次深刻阐述“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sup>[15]</sup>。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载入党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首先需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亲拟了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首先是“对会议评价”，然后列出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邓小平亲拟提纲后，召集有关同志商谈起草讲话稿问题。按照这个提纲，他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阐述。然后，邓小平就讲话稿的题目问题，问道：这个题目好不好？大家都认为很好，题目很新鲜。于是，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讲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既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论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书，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提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震撼了世界。1978年12月的法国《观点》杂志把邓小平列为当年新闻人物，并把邓小平称为“不倒的第二号人物，不倒的重返政坛的人”<sup>[16]</sup>。1979年1月上旬，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该刊1979年第1期序言指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按照邓小平阐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精神，接着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其主要成果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sup>[10]</sup>。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sup>[13]</sup>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加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sup>[6] 382</sup>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sup>[15] 372</sup>。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邓小平一贯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他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sup>[15]</sup>邓小平理论与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sup>[13]</sup>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专门系统阐述实事求是问题。他认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 and 兴旺发展起来的”，“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sup>[17]</sup>。2020年9月17日，他在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前提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的命题。历史证明，坚持实事求是贯穿百年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历史基因与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长盛不衰，绵延不绝，蓬勃兴旺，持续发展，日新月异，其中一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故鼎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著作《周易·杂卦》写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写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著《礼记·大学》写道：“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上述经典著作关于求新、创新的论述，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革故鼎新”的理念。

从哲学意义上讲，“革故”与“鼎新”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过程。“革故”是“鼎新”的前提，“鼎新”是“革故”的结果。“革故”是革除旧的事物，“鼎新”则要求“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西汉文学家扬雄在《太玄·玄摛》中写道：“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唐代吕岩在《吕子易说》中认为，“革故鼎新”指革除旧的事物，建立新的事物，“必有信下之志而后改上之命，则命无不行，而革故鼎新之治成矣”。宋代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写道：“皇帝始亲决万机，革故鼎新。”《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毋犯雷霆，当效革故鼎新之意。”清代黄图珮在《苏岭募葺广福庵引》中写道：“第开创年久，不无倾圮，于是求诸施者，欲图革旧鼎新。”可见，中国古代已经认识到，“革故鼎新”反映了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革故鼎新”阐发了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更替，新事物是在旧事物基础上发展变化的结果。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朝历代口口相传，男女老少人人皆知的俗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实质上表达的也是“革故鼎新”之意。

“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1600年，商朝开国皇帝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刻在器皿上。其目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断创新。古代中国屡屡出现“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史不绝书。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已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特质。从古代“管仲改革”到近代“戊戌变法”等，其宗旨都是期望通过革新内政，改革军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达到使中华民族强盛的目的。从《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革故鼎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革故鼎新”意识和“与时偕行”精神的民族。

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sup>[6] 90</sup>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从此，中国迈上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然而，实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论述，前人没有先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新路。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6] 258-259</sup>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成为中华民族最大共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sup>[6] 117</sup> 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外开放大潮滚滚，经济特区率先垂范。邓小平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sup>[6] 372</sup> 经济特区犹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了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阔步向前。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党的十三大确立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踏步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sup>[18]</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往开来，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全方位顶层设计，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重大举措，在实践中不断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发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壮丽的气象，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自信自强走向世界的巨大推动力。

#### （五）“黄狸黑狸，得鼠者雄”与农村改革蓬勃兴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著《聊斋志异》写道：“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其含义是“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夫人卓琳曾说过，邓小平休闲的时候经常阅读《聊斋志异》，不仅在北京休闲时阅读，外出也要让工作人员将《聊斋志异》的部分内容做成活页，以便休闲时阅读。四川人的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源于《聊斋志异》的“黄狸黑



狸，得鼠者雄！”。

经过对中华文化俗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运用，“黄狸黑狸，得鼠者雄”在20世纪60年代被译为白话文而名扬天下，并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联系到了一起。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传诵着“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歌谣，投入农业生产，农村呈现政通人和、粮食丰收的景象。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脱离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情况下急剧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严重后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严重压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安徽等地在农村搞起了“责任制”，一般称为“包产到户”。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包产到户’是救命政策”，符合农村现状；而一部分人却认为“‘包产到户’是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批判。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最早提出了农村改革思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sup>[19]</sup>。邓小平的讲话实质上是中国农村改革先声。他鲜明地指出了农村出现困难局面的症结所在，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包产到户”和“责任到田”；在农村生产方式问题上“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质是农村生产方式如何变革由农民群众说了算。

邓小平的讲话在全国产生极大的震撼力和冲击波。“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辟论述，通俗易懂，鞭辟入里，生动好记，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在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中，邓小平的话被变成了“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列宁认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sup>[20]</sup>从1956年至1978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三起三落”，由此可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历史必然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主持安徽工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为改变安徽农村的落后面貌，以实事求是精神，主持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减轻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社员负担，允许和鼓励人民公社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也可以责任到人。

在“省委六条”推动下，1978年夏季安徽省肥西县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县委大胆实行“特殊政策”，允许把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借地度荒”“种保命粮”。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并很快在附近10万农户中蔓延开来。但是，各种各样的阻力同时产生，



对“包产到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万里坚持“实践第一”、坚持让实践说话，两次到江淮地区丘陵之间偏僻的小井庄村，主持召开全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充分肯定。

“穷则思变”“变则畅通”。改革就意味着对旧事物的否定，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争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时，“小岗变法”应运而生。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安徽省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二十户农民中的成年男性大都当过生产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为小岗村特有的规律。1977年底，小岗村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户大小，户户外流”。面对这种严重状况，绝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而认为主要在于“经营管理”和某些政策及干部作风问题。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举行秘密会议，做出“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决定。当时，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为此，小岗村18户农民用中国传统方式起草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果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然后，每个人在“契约”上郑重摁下自己的手印。这一举动使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进而开启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小岗变法”的实质用小岗村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此可见，小岗村农民仍然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精神境界。

“小岗变法”不胫而走，很快引发极大争议。万里坚决站在农民一边，对“小岗变法”坚决支持。当时，万里曾与一位同志发生过争论。这位同志说：“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问道：“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对方说：“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对方答：“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局部地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了农村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问题的经验教训，原则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会后，《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风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sup>[15] 315</sup>邓小平的讲话给中国农民吃了“定心丸”，对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促进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产生重要作用。

每当农村改革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1981年8月，他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性质：“‘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

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sup>[21]</sup>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党，第一次正式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中国农民热烈拥护。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共中央从1982年开始，连续五年出台五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深入发展。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农村改革犹如“星火燎原”，由点到面，迅猛展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伟大贡献。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了解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他感慨地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贯通古今、古为今用，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与中国现代发展交相辉映。据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江泽民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文史著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每天晚上处理完公务后，都要阅读两个多小时书籍，其中阅读最多的是历史著作和历史人物传记，从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历史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等理念。从改革开放的蓬勃兴起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中共中央领导人树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进入梦寐以求的全面小康时代。但是，世界风云急剧变幻，中国发展也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sup>[22]</sup>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立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百年大党经验结晶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凝聚历史经验，形成三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sup>[23]</sup>。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23]</sup>这是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正式将“两个结合”载入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sup>[22]</sup>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这与“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契合。在天下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与“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高度契合。在社会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上代代相传的“天下大同”“世界大同”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道德观方面，《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文明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善天下”“利济苍生”，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度契合。

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使诞生在世界西方欧洲工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东方的亚洲农业国家——中国找到了“知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24]</sup>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24]</sup><sup>1470</sup>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硕果累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sup>[22]</sup>。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的历史中断了，有的历史消亡了，有的长期动荡不已。唯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长盛不衰，绵延不绝，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又创造了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sup>[25]</sup>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明确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sup>[26]</sup>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追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源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性研究成果。2022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他深入阐述了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他在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山西运城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是古代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成就，为中华民族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sup>[27]</sup>他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事业居功至伟。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sup>[27]</sup>。

在繁忙的调研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文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2021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期间专程来到九曲溪畔的朱熹园考察。他说，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园。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来到藏书410余万册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听取加强文献古籍保护利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鉴证了我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他与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sup>[28]</sup>。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脉。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sup>[2]</sup>。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中国革命在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数次抗争与失败之后，终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速铁路”，一往无前，走向胜利；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脉，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大国找到了落地生根的肥沃土壤，搏风击浪，茁壮成长。

正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高度契合，造就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历史性机缘。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会失去魂脉，失去精神动力，失去前进方向，失去指导思想。如果丢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存在的深厚基础，失去滋养的丰厚源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

的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sup>[2]</sup>。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魂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魂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永葆其蓬勃发展的旺盛活力。

### 三、新时代新征程以“两个结合”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深化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命题，是总结百年党史丰富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续推向前进的必然结果。

####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与丰富经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要以“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俄国十月革命树立了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模仿这一经验，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在中心城市发动的武装起义，但是皆因“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预定计划，秋收起义的目的是占领中心城市长沙。然而，秋收起义初期，毛泽东发现革命低潮时期根本不可能占领长沙，于是果断决定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山区进军，从此开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早来源于列宁提出的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列宁认为，要使诞生在西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亚洲落地生根，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化”。中国革命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以及“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诱敌深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战术，“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范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并作会议总结。他指出“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并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29]</sup>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



全党的共识和行动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阔步前行。

##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30]</sup>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融合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前提和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植根中华大地，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承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新阶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深刻论述了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从而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取“实事求是”思想基因，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首先提出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从中华民族对“小康”的千年期盼获得启发，用“奔小康”“小康之家”“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治国”理念，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实现中国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跨世纪发展。胡锦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的历史基因，提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根据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理念，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主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到新阶段，运用“两个结合”治党治国治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相结合，创造性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阐发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愚公移山”来激励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协和万邦”的历史基因阐述中国周边外交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倡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凡此种种，上接天理，下接地气，明白晓畅，成效显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清泉水。宋代朱熹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多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他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归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克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复制”，更不是“山寨版”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蕴含的深邃政治智慧和丰厚历史智慧，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N]. 人民日报, 2023-07-02(1).
- [3] 韩庆祥. 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0): 93-105+164.
- [4] 尚庆飞. “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2): 41-48.
- [5] 龚格格. 邓小平鉴史资政例谈 [J]. 党的文献, 2012(4): 120-121.
- [6]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34.
- [7]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150.
- [8] 毛毛. 在江西的日子里 [N]. 人民日报, 1984-08-22(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 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1992.
- [1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N]. 人民日报, 1981-07-01(1).
- [11] 薛庆超. 壮丽人生: 第3卷 [M]. 北京: 中国出版集团, 华文出版社, 2014: 69.
- [12] 列宁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9.

薛庆超. “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60-79.

- [13] 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8 月 20 日) [N]. 2014-08-21 (2).
- [14]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N]. 人民日报, 2014-01-01 (2).
- [15]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82.
- [16] 法国《观点》杂志选出邓小平为一九七八年新闻人物 [N]. 参考消息, 1978-12-25 (4).
- [17] 习近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N]. 学习时报, 2012-05-28 (1).
- [18]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2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8-12-19 (2).
- [19] 邓小平文选: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23-324.
- [20] 列宁全集: 第 2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629.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764.
- [2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24]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1.
- [25] 习近平.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2014 年 12 月 20 日) [N]. 人民日报, 2014-12-21 (2).
- [26] 杜尚泽. 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 [N]. 人民日报, 2016-01-05 (1).
- [27] 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丁薛祥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10-29 (1).
- [28]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92.
-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0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田凯华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战略功能，是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源自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的同频共振。回望历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顺应中华文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是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大势所趋。审视当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呼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展望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重要任务在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目标在于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本质要求在于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最大法宝在于统筹推进“两个结合”。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赓续的重要结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承载着凝聚文化共识、增强政治互信，包容文化多样、促进手足相亲，深化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故事的战略功能。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080-10

---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4.008

**作者简介：**田凯华，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成就与经验研究”（22ZXQH30）

**引用格式：**田凯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 80-89.

田凯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80-89.

文化兴盛是民族兴盛的鲜明标志, 复兴中华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sup>[1]</sup>。国家现代化必然包含文化的现代化, 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现代文明是一个政党、民族乃至国家赖以存活、成长、兴起的关键基底。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重要论述: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sup>[2]</sup>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集中表达,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筑了坚实框架, 值得从学理角度加以解读。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以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文化建设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看, 学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以下认识。第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 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态与历史成就”<sup>[3]</sup>,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sup>[4]</sup>。第二,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人类文明新形态。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sup>[5]</sup>,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重构”<sup>[6]</sup>。第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两个结合”的伟大创造。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7]</su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使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引下绽放出生机与活力<sup>[8]</sup>。本文在吸收已有观点的基础上, 从宏观角度探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含的理论要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怎样的战略功能”等问题。

##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 来源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的同频共振。回望历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产生是顺应中华文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是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大势所趋。审视当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呼应,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展望未来,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唤醒全民族文化自信, 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 (一) 回望历史: 认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sup>[9]</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作为“一种历史产物”, 是历史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史为鉴、知古鉴今, 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 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践行的哲学思维方法。推动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要求我们以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把握历史趋势, 自觉遵循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自觉认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性。

其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人告别旧时代、迈入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纵观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一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漫长的前现代化时期独领风骚。在古代社会，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造就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文明逐渐趋于劣势。从那时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肩上。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于中华文化转型的探索。“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sup>[10]</sup>之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星火燎原，很快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随着以李大钊、陈独秀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开始了复兴中华文化的进程。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群众取得当家作主地位后，就开始了剔除封建反动落后文化，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文化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经济崛起，文化复兴成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大业的必然要求；立足中国文化自信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其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契合了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大势所趋。从时代大趋势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当今时代正处于资本主义衰落期和社会主义上升期，这一趋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资本主义将人类带入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探索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方中心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文化领域的“西方中心论”表现为“西方文化优越论”<sup>[11]</sup>。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西方式现代化，被西方自诩为所谓“普世文明”向世界传播。反观中华文化，近代以来一段时期在与西方文化竞争中失势，大大打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使部分民众难以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甚至将国家的落后片面归因于文化的腐朽。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人们渐渐抛弃了“文化决定论”，认识到中国的一度衰落是由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制度造成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世界大战以及帝国主义暴行使人们对业已确立的理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条件下，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和参考。

## （二）审视当下：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除了要厘清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外，还要厘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要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不是别的文明。只有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置于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中去考察，才能找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定位。

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意义上开创了新的

文明形态, 为人类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打开了新视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2]</sup>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对中华文明的摒弃、割裂, 而是在继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化; 同样这条新道路区别于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西方式现代化, 它是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结出的硕果。从内容上看, 这条新道路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从而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广义上的文明来说, 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同样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由此可知, 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而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其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单纯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 还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集中表现形式。它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 既是“人为”的又是“为人”的。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 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服务者、受益者。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把建设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党在新时代领导建设的新文化, 自然应该是服务于人民群众,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的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依托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更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撑。我们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和谐、生态的美丽, 还包括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 较之经济和政治更具竞争力、生命力。”<sup>[13]</sup> 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2]</sup>。

### （三）展望未来：赓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主脉

赓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主脉, 不仅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具有新时代特点、适应新时代需要、适合全社会大力弘扬的新的文化内核。

其一, 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 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百年以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自信打开了一扇窗, 让在黑暗中前行的中国民众看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希望。七十多年前, 新中国的成立帮助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自信迈过了一道坎。获得彻底解放的中华民族, 不仅实现了主权的独立更是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40 多年来, 改革开放将中国再次推向世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将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推进到新境界, 中华文化散发出巨大国际影响力, 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心显著增强。在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深刻阐述。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sup>[12]</sup><sup>42</sup>, 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超越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发展的集中体现, 这一概念的提出吹响了唤起全民族文化自信的冲锋号。强大的政党、完善的制度、优秀的文化相互支撑, 共同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明前途。

其二，推动中华文化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含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一脉相承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华文化复兴并推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经过 70 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然而从文化视角观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仍落后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地位，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综合国力处于不相匹配的状况。对怎样提高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振兴中华文明，有的人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弥补中华文明之不足。出现这种观点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部分人对中华文化的不自信。面对这些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sup>[14]</sup>中华文化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巅，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的带动。在未来的发展路途中，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支点，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时代变迁、立时代潮头、领时代先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性地提出一系列有关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博大精深、抽象深邃的理论体系。从内容构成上讲，它既包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又包括对当代中国各项实践发展的理论性转化；既包括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吸收和运用，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发展。从历史脉络上看，它既包括古代中国的理论创造，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还包括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要义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一）核心要义：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sup>[1] 746</sup>，“中国之治”离不开文化支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文化建设的伟大夙愿。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引入中国，向广大群众庄严承诺要把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sup>[15]</sup>，极大鼓舞了中国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sup>[16]</sup>。他还预测：“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sup>[16] 577</sup>在接续奋斗的 70 余年里，中国共产党愈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迎来了一个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坚强的文化自信逐渐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兑现党的承诺，让中国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担当文化复兴使命的历史条件，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上的核心工作就是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讲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恢复, 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推向世界, 而是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通过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中华文化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巅。

## （二）重要任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其重要任务就在于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深入。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带领人民创造的现代化模式, 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全方位发展的中国智慧。这种中国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现代标识, 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集中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文明, 它将全体中华儿女视为统一整体, “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一盘散沙、相互掣肘的局面”<sup>[17]</sup>, 展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文明, 共同富裕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中国人民百年追求的伟大梦想, 它有别于西方文明中的竞争意识, 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普惠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对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选择的新的方式。新的发展方式有效预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弊端, 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协调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审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历程, 通过牺牲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走向现代化的模式引发了中国人民的警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文明。它区别于西方以战争手段获得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方式, 选择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 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因此,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 （三）根本目标：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 这是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基因<sup>[18]</sup>。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肩负的根本目标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推动新时代文化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必须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激活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蕴含的丰富资源。具体来说,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不断解放文化生产力。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通过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要繁荣文艺创作, 以艺术作品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文物说话,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拓展文化遗产的使用途径。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在国际平台上交流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开创新局面。要实现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可靠保证。

## （四）本质要求：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特性, 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即突出的连续

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论述从根本上认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讲清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关联，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基本遵循。毛泽东也曾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sup>[15] 708</sup>“古为今用”的根本目的在于“推陈出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是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超越与发展。中华文明有突出的连续性，由它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数千年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形成了现代中国倡导国家富强、社会公正、人民诚信的价值理念。“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2]</sup>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由它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勇于接受新事物，形成了现代中国倡导国家民主、社会法治、人民敬业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由它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sup>[2]</sup>，形成了现代中国倡导国家文明、社会平等、人民爱国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由它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承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sup>[2]</sup>，形成了现代中国倡导的国家和谐、社会自由、人民友善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由它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sup>[19]</sup>作为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形成了现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追求。

#### （五）最大法宝：统筹推进“两个结合”

文明的生成总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sup>[2]</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两个结合”创造出的新文化生命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保了中华文明始终沿着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向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打开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新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当代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统筹推进“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一个民族发展的道路选择、理论建构和制度取向，都是由其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都是统筹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放眼未来，走好中国道路、拓展中国理论、完善中国制度，都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结合。统筹推进“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真正做到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将“第二个结合”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给予“第二个结合”更充分、更广泛的肯定，这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更具“中国特色”的自信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统筹推进“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文化创新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发展依然历久弥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在古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中发挥过突出作用，而在于它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从而能够为破解当前世界发展的诸多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在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战略功能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代言者, 是国家形象的宣示者, 是国民素质的承载者<sup>[20]</sup>。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结晶,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同时, 还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一) 政治表达功能: 凝聚文化共识, 增强政治互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现代中华文化的精髓, 对增强政治互信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范围上看, 政治互信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在国家范围内, 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构建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 是指在世界范围内, 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从第一层含义来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 强调公民个人权利、利益和机会的合理公正分配。为此, 必须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律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和道德教育机制等, 使社会所有公民都能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成果, 为构建价值共识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通过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表达功能, 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民心政治”, 提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sup>[12] 46</sup>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增进人民福祉, 从而牢牢将人民群众凝聚在党周围。从第二层含义来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胸怀天下的现代文明。文化的跨国交流和传播事实上就是一种国家形象的对外展示。国家形象是一种无形资产, 能够积累加强政治信任的社会资本。当前,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sup>[12] 60</sup>。政治互信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的价值愈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凝聚文化共识, 频繁开展高层互访, 积极构筑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表达功能, 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以合作共赢的“世界观”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客观平衡的“中国观”。

#### (二) 民族团结功能: 包容文化多样, 促进手足相亲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sup>[19] 299</sup>。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 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生成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文化, 同时承担着“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sup>[21]</sup>的光荣使命。从本质上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各民族群众团结努力形成的智慧结晶。在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从而促进中华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从实践看,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文化发展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姿态包容多样的文化, 促进文化繁荣, 促进各群体之间和谐。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 让少数民族群众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共同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良好局面。从特性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强调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充分挖掘和鼓励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 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 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三）文明互鉴功能：深化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故事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文化交流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源泉。进入近代社会，中国被强行拉入到一个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且中华文明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势竞争对手，文明的根基一度遭到动摇。民族文化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深入发掘独特历史文化资源和五千年文明优势的同时，也要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结出的硕果，它的形成证明了中华文明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有着比西方文明更可持续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构建多渠道、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一方面努力吸收借鉴有益成果，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丰富的养料；另一方面关键是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sup>[12] 21</sup>。坚持胸怀天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倡导并推动的互商互惠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展现了中国对全人类的责任意识，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道义担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深入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就是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就是要促进对外文化贸易加快发展，提高中华文化竞争力；就是要积极参与文化领域的国际对话，增强国际话语权。

## 四、结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伟大创举，也是党应对新时代一切困难挑战的有力武器。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开展文化建设的百余年历史，不同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都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都为解决那一时期党所面临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15] 663</sup>。这里的“新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它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首次鲜明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全党工作的重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sup>[22]</sup>。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成功开创大大助力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催人奋进的精神号角，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利器，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定能在现代文明的指引下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9.
-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N]. 人民日报，2023-06-03（1）.



田凯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理论要义与战略功能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80-89.

- [3] 陆阳. 从李大钊“中华文明之问”到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探析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2 (4): 62-68.
- [4] 苏星鸿, 李夏冰. 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视域下的中国文化形态创新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1): 30-36.
- [5] 寇清杰, 肖影慧.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五重逻辑 [J]. 理论学刊, 2022 (4): 15-24.
- [6] 张超, 李志强.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维度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15-21+177.
- [7] 张传平. “两个相结合”: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 (12): 12-20.
- [8] 徐国民, 王国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 11-20.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73.
- [1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09.
- [11] 陈先达. 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56.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1.
- [13] 蔡武. 文化热点面对面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6.
- [14]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4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4.
- [1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修订本): 下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77.
- [17] 董志勇.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N]. 光明日报, 2021-08-09 (2).
- [18] 樊士博, 齐卫平. 制度话语与话语制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 [J]. 治理研究, 2022 (6): 72-80+126-127.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97.
- [20] 孟宪平, 张文君. 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7.
-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4.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3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44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于颖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不仅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特质，而且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现实路径。在生发逻辑上，“第二个结合”标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明确文化创新发展的思想路径，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在独特内涵上，“第二个结合”过程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经过“第二个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获得深入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多方面的重大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国家层面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层面有利于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层面有利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文化自信；文明形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090-10

---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3.04.009

**作者简介：**于颖，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3ZDA007）

**引用格式：**于颖.“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90-99.

于颖.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90-99.

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1]</sup>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命题的提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揭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与政治责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的理论超越,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建构新文明的决心。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 从现代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共产党逐渐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的具体内涵、重要特质和独特地位的认知。全面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对于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是我们新的历史起点坚持文化自信的必要条件。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提出后, 学界从构建逻辑、价值意蕴等视角出发对其指涉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有学者认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坚持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的高度统一,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担负文化使命和政治使命的高度统一,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促进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高度统一<sup>[2]</sup>。还有学者认为: 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逻辑, 不能单纯拘泥于文化逻辑层面加以理解, 而应当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 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sup>[3]</sup>。目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仍缺少系统性、整体性观照, 呈现出碎片化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特别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鉴于此, 本文以“第二个结合”为视角,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进行探析。

## 一、在“第二个结合”基础上生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不断推进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阐释, 锚定实现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作出了诸多原创性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人类文明发展大势, 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懈探寻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 擘画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宏伟蓝图。文化是实践的产物, 又对实践产生重要作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文化人、凭文传史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通过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 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

### (一) “第二个结合”标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1]</sup>之所以将“第二个结合”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原因就在于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向发展的深层逻辑。“第二个结合”不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且提供了演进动力, 指明了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旨趣具有一致性, 这也是二者能够结合起来、共同推动实践发展的根本原因。“结合”的前提是

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sup>[4]</sup>在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sup>[5]</sup>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历来保持“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自觉。

首先，“第二个结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奠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陷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困境，中华文明遭遇了来自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结果是，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呈现出翻转式变化<sup>[6]</sup>。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各界仁人志士纷纷探寻救亡图存之路，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方案。无论是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的华夷之辨、道器之辨、义利之辨，还是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的闹剧，都贯穿着关于中华文明地位的争论。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人士围绕传统习俗、传统语言文字等内容对中华文明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和落后的因素从而被要求进行改造。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使得人们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对中华文明进行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一起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革命养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推进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保护，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尊重历史，自觉承担延续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革命斗争的胜利以及文艺工作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一步融入现代化浪潮之中，近代产生的文化自卑心理也逐渐转换为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昂首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交锋与交融中，如何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先进性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知，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着重阐释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条件。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充分体现了党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蕴含了深刻的民族记忆，它作为文化血脉，是一个国家建构现实、规划未来的基础。一些民族在看待传统文化时，存在错误倾向。它们或是将传统文化奉为圭臬，未能正确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毫无批判地继承一切；或是固守传统文化，未能根据时代进步及时变革其中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和形式，毫无创新地沿袭一切。这不仅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不利于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倾向的危害，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辩证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价值尤为重大。它秉承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革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与中国具体实际同样重要的因素被独立阐释。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彰显中国共产党深入民族历史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源头的决心，体现出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于颖.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90-99.

化基因的重视和肯定。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自信，党强调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保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发展。

## （二）“第二个结合”明确文化创新发展的思想路径

“第二个结合”阐明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条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现实路径。“第二个结合”揭示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一，“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提供了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且互相成就，这缘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尽管产生地不同，但是二者在价值取向、基本要求等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找到了救国良方。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并非始终一帆风顺。党内一度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认知。毛泽东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结合”已经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要求。毛泽东多次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必然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影响中国现实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点，中国传统民为邦本、大同社会、和合文化、天下为公等理念以及辩证法思想等均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契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因素。

其二，“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根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未曾中断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综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明，它们大都生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上，尽管因民族特色不同而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文明的本质存在相似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作用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7]</sup>，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7] 36</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迅速湮灭，现代文明呈现出了同质化的特点。中华民族也曾遭受来自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击。但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加之中华文明自身深厚的底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以中华文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厚植中国道路的民族文化底蕴，又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赋予中华文明以时代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根基稳固、持续发展，在于“第二个结合”明确了一条正确路径。

其三，“第二个结合”提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创新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第二个结合”时指出：“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1]</sup>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动力，也是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文化传承意味着传统超越时空的限制与现实相融合，在现实中延续自身的价值。就此而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必须与时俱进，为文化传承提供必要性与可能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传统文明唯有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同时，创新绝不是全盘否定，继承和创新是文化发展的两个方面。进一步

讲,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民族发展成就,内蕴民族精神,是我们在当代推进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根基。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必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强调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精神,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创新动力。

### (三) “第二个结合”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将实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价值旨趣与共产主义相一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演绎,也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体现。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深层内涵和重要意义,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是它们彼此契合。这种契合首先就在于社会目标的契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共同期待。“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sup>[8]</sup>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理想社会均蕴含着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生成的现代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第二个结合”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在文化创新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精神,最终目标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生成于“第二个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储备力量,而且应当立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增强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和感召力。

## 二、在“第二个结合”过程中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

文明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物质精髓和精神标识。受生产方式、地理环境、思想传统等因素影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不尽相同。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以及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程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集中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

### (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文化,即便是同一时期的文化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思想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发了“两个结合”的创新论断,阐明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必然路径。坚持“第

于颖.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90-99.

“二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文化影响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样态,关乎民族发展、国家未来。—个国家只有重视和尊重自己的传统,做到知其—来,才能明其所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中,传统文化亦遭遇到了重大挑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的知识分子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中国若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推翻旧文化,建立新文化。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一阵疑古辨伪思潮,反传统与反封建被视为同一任务,传统文化—度被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因素而需要被摒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辩证把握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诸多理论流派中找到了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sup>[9]</sup>在确定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时,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必须尊重中国历史,把握文化的民族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深入。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将之比喻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精神命脉”等,阐明了其在人民价值观塑造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价值。随着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举措,也是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经之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sup>[10]</sup>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塑造了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它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价值精髓,同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创新了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构成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时代要素。优秀文明具有世界性、进步性、开放性等多种特质,它绝不是故步自封、囿于一隅的。综观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明成果,它们虽然由于具有民族特色而迥然相异,但都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笔;它们既包含着深厚的历史色彩,也与时代的先进因素交织交融,从而成为贯穿古今的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中华传统文明。—方面,传统文明具有继承性,它渗透到了国人的精神之中,在日用而不觉中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民族精神和人民品格。另—方面,传统文明必须与现代化“通约”,通过革新以始终保持其先进性。传统文明永葆生机取决于它能革故鼎新,从而使自己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契合。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文明特别是中华传统优秀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展规律,抽象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通过赋予其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融合,实



现了二者的共同进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重构史观、重塑认同、重释文明”<sup>[11]</sup>。中华文明在当今时代仍能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就在于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时代精神以丰富自身的内容。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催生了全面进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包括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过程，其中贯穿着中华文明从被否定到被肯定的发展历程，这一进程同时也是传统文明吐故纳新从而转化为现代文明的变革历程。中国共产党探索到了中华文明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明二者的协调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植根民族土壤，它在汲取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时亦为创造现代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了传统文明的内容和形式，展示了中国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从自发自觉到自信自为的发展过程。

###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

文化对人能够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演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社会主义规定了其价值属性和发展方向。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寻求进步的国家共同探寻的重要命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现代化的先河，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了西方现代文明。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7] 36</sup>资本主义现代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变革，世界市场的建立不仅使得地域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而且也使得地域文明走向了世界文明。资本逻辑主导下世界文明的变革使得现代文明被赋予了制度属性。在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下，它将现代文明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并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sup>[7]</sup>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形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造成了其文明的内在悖谬。一方面，资本主义促使文明超越了时空限制，古今中外文明在全球范围内交流互动。经济发展、科技革命都带动了文明的进步，世界文明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另一方面，这种文明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这就导致它存在根本性矛盾。资本主义文明中贯穿着暴力和剥削，不仅通过压榨劳动者创造其文明果实，而且通过战争等手段占有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了其文明的内在局限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实践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这一文明的先进特质。社会主义内蕴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整体部署，之所以“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sup>[12]</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集中体现，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是各领域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总体文明。在与资本主义的交流过程中，社会主义既坚持底色不变，又吸收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提高自身的先进性。中国积极融入现代化浪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分，创造了融贯中西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内在蕴含着对世界文明的尊重，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共同

于颖.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90-99.

繁荣和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国立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汇点, 力求以社会主义的道义力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通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命题, 推进了不同文明的和谐共生, 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的道义性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

### 三、在“第二个结合”进程中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命题的提出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 塑造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 是一个国家现代文化的血脉源头。同时, 优秀的地域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探寻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规律, 培育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集聚中国传统文明智慧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 对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影响深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党将带领中国人民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

#### (一) 国家层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突出特性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品格, 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价值。一方面,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创新, 为中国道路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化深厚绵长的基础, 悠久的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智慧。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在现实中, 传统文化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不断随着时代内容实现自我革新, 方能保持自身的连续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巩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也能够体现出其创新性, 它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文明基础。另一方面,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和包容性, 型塑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内核。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体, 中华文明是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中华文明博采众长, 广泛汲取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 不断丰富和优化自身, 这也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对国家统一的追求是中国人共同的理想信念, 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原则, 中华民族在多次危机面前始终保持团结一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团结统一的家国情怀。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 (二) 社会层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中华传统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于一体, 它向世界人民展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先进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为其他文明的创新创造提供了经验借鉴, 而且彰显了文化在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 孕育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

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sup>[13]</sup>在文明发展中，如何在坚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完成传统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通约”，将文明转换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现实力量，是每个拥有自身文明的国家都必须解决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历程，部分国家或是因循守旧，拘泥于传统中，或是全盘他国化，抛弃本国历史，这些都导致国家背离了实际，从而制约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遗产与创新的统一，并将其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进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 （三）世界层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利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理念渗透于中华文明的血液之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坚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内维持了社会和谐，对外维系了国家安全，使得中国能够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始终致力于推进自身发展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当今时代，局部冲突频发，有的西方国家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国际局势波谲云诡。面对复杂的世界环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将和平理念印刻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新时代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标准要求自身。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不仅将自身发展成就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和平的价值追求，它为构建和平稳定的世界格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 四、结语

2023 年 6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sup>[14]</sup>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国传统智慧共同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并催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实践成果，它既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当代发展，也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的永续繁荣提供了思想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N]. 人民日报, 2023-06-03 (1).
- [2] 方世南.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政治意蕴 [J]. 学术探索, 2023 (7): 1-6.

于颖.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独特内涵及重大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90-99.

- [3] 尚庆飞. “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2): 41-48.
- [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
- [5]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79.
- [6] 齐卫平, 樊士博. 前提、过程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回眸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3.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
- [8] 艾思奇全书: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682.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0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18.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15.
- [11]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智库报告 [N]. 光明日报, 2023-07-03 (3).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1.
- [13]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 [N]. 人民日报, 2023-06-04 (1).
- [1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N]. 人民日报, 2023-07-02 (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曹一飞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文明“活的灵魂”，是驾驭文明的物质成果的精神力量，是一民族得以凝聚的精神标识。晚清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陷入危亡，文化主体性的滞后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促发了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的文化革新中诞生，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涅槃和重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在精准把握“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脉搏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最集中体现。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建设需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扬主体的灵活性，增强主体的自信，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100-10

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sup>[1]</sup>。其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阐释、高度总结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提出的重要论断，对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解离不开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文化主体性发

---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4.010

**作者简介：**曹一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曹一飞.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0-109.

扬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形成重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 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提出了“新文化”概念。毛泽东指出, “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2]</sup>, “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 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sup>[2] 663</sup>。他强调, 新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sup>[2] 707</sup>, 具有“民族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内容”<sup>[2] 707</sup>, 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sup>[2] 708</sup>。“新文化”概念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怎样发扬文化主体意识、推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初步理论总结。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重视“第二个结合”,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高扬文化主体性。近年来, 有关“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成为热点。有学者从“结合”的原则和方法角度开展研究, 强调新时代推动“两创”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守正和创新、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这五对辩证关系<sup>[3]</sup>。有学者从具体理念的结合着手, 研究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sup>[4]</sup>等问题。现有研究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论断缺乏系统梳理, 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文化主体性发扬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深入探讨。鉴于此, 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 在探讨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和建设进路。

## 一、文化主体性是文明“活的灵魂”

文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明包含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技能、语言艺术、文化五要素<sup>[5]</sup>。狭义的文明则是文化的别称, 主要是指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价值观等。本文主要采用包含生产力等物质成果在内的广义文明概念, 文化则特指文明中主体思想意识的部分。由此, 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因其特定的文化传承、思维习惯、价值观念、风俗传统而彰显的特有的主体意识。从文化哲学角度看, 文化主体性是文明“活的灵魂”, 是一种具有灵活性、独特性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先导作用和弹性作用的社会意识。

### (一) 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主体文化观念的灵活度

相对于科学、技术、工具、资金等文明的实体成果, 文化是一种在文明主体思想观念和意识中的动态、软性的存在。因为文化的这种特殊性, 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润物无声又极为强大磅礴的力量。相比起在人头脑中的观念存在, 那些实体性的物质成果总是更令人瞩目。然而, 正是文化这种动态、软性的存在, 给予了人相对于物体而进行自由选择的灵活性, 使人的尊严和灵性得以彰显。正因为有了文化的力量, 人才可以超脱出所谓既定的命运, 有计划、有目的地实现独属于人的价值追求。不同主体因文化观念不同而拥有在同样场景下做出不同选择的灵活性。

### (二) 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文化在文明变革中的先导作用

文明变革的方向由具有灵活度和自由度的文化主体彰显。科技、工具等文明的物质成果具有凝固性。当它们不符合时代要求、不符合人民利益时, 对它们加以批判性地改造和继承需要具备合适的时间、空间条件, 因而其改造起来是比较繁琐的、长时间的。但对于文明的主体方面, 一旦文明



主体通过一系列的思考和批判，与适应于旧的生产关系的观念开始决裂，一旦支撑这种改造的心理动能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文化的变革将是极为迅捷的。正因为人的观念的变化相对物质变化更迅捷，所以新文化总是能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中率先取得较大发展，从而引导社会文明的整体前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起到了召唤、导引的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正是关注到了文化的先导作用，才在进行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花大量精力关注了民族灵魂的改造问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社会面的新观念开始普及，中国革命的成功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sup>[6]</sup>。文化的进步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 （三）文化的主体性反映为文化的弹性

具有现实性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有意识的人类群体中以动态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人的文化观念不仅是对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也受到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习俗、社会心理等的影响。文化变革并没有一个机械的、量化的临界点，而需要与主体的心理状态、现实情境进行综合。文化变革的这种主体依赖性在赋予文化以极高灵敏性的同时，又给予文化以强大的惯性。或者说，文化相对于一定的变化了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要求，会具有较大的自己维持原状的可能性。又由于现实文化的存在是无形的、非实体性的，新社会的建设者往往容易忽视文化的更新，更注重社会的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这就给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精神领域反过来阻碍物质文明进步留下了空间。文化相对于物质文明发展表现出的滞后可能性与主体阻滞力量即为文化的弹性。其意涵在于文化如果发展缓慢，最终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也会受到文化的极大弹性拉力而停滞或倒退。文化的主体性也是文化适应社会变化的弹性。

### （四）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文化的独特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基因”<sup>[7]</sup>，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一个民族在生理连续性和相似性之外的精神凝聚力的根源。从族群的角度看，每个群体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地理条件、历史积累、习俗风尚中形成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特点是独一无二的，族群的文化特性形成族群的精神标识。不同族群间的文化特性是适应其特定的物质生活生产条件而产生的，并无好坏优劣的评定指标。坚守民族阵地，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益处在于群体心理层面。族群的文化特性往往因为其代表着一族群与它族群得以区分的独特的审美特性和思维惯性，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精神纽带。就中国来看，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伦理美学特性、天人合一传统，重形象思维、重人伦亲情、重言传意会、重精神品格，这与西方文化的重理性、重实用、重形式逻辑、重科学探究、重宗教超脱等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差别<sup>[8]</sup>。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特质使中国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网格，形成一些能促进共同协作、交往的心理默契，这使得中华民族内部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比较高效。愈是鲜明的民族特性愈能增强民族内部的一致性。

##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主要体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塑造这一新文明的实践过程，也是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

融、多元与统一共存、民族与世界汇通三大特质, 彰显了文化主体性。

###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明

从文明延续时间的对比上来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继承了五千年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大量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呈现出极为丰富、极具底蕴的面貌。一方面,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的诸多特性, 例如重含蓄内敛, 重内在修养, 重人伦亲情。另一方面, 中华民族在经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所形成的现代文明, 具有了突出的现代精神。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精神价值。2023年6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时强调, “盛世修文, 我们这个时代, 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 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 要把这件大事办好”<sup>[1]</sup>。中华文明历史悠久, 厚重博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几千年来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整个民族的根和魂。历史和现实共同塑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质, 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具有高度的发达性和丰富性。中国共产党汇聚了全民族具有变革精神、创新勇气的精英分子进行传统文明的重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华民族完成千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文明转型, 中国社会涌现出了大量高水平的文化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将具有高度凝固性的旧中国的文明转化为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形式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种现代文明的一大特质便是克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 同时较好地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 规避了文化断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特质形成的过程。

###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多元与统一共存的文明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有着多元与统一并重的悠久传统。“《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根植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虽也经历过五代十国等分裂割据时期, 但是“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也一次次在历史中重演。历史证明, 尽管中华民族会有内战和矛盾的时期, 但这种矛盾、分裂割据不能长久, 而只是新的更高级别的大一统的前奏。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外族入侵, 但是由于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统合力, 因此往往能够将外族融纳在中华民族文明体系之中<sup>[9]</sup>。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到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 “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sup>[1]</sup>。中华民族地域广大、民族众多, 各民族各地域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 但中华文化使得各地域和各民族都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也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强大的文化容纳力, 由于文明的高度发达而可以通过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吸引各民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并保留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 形成了多元与统一并存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成功地将多民族、各区域的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巩固了石榴籽般紧密团结又姿态各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格局。

###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族与世界汇通的文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古代世界, 中国是世界强国和文化中心。尽管强大, 中华

民族并不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始终以和平为宗旨。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始终愿意敞开自己怀抱，以包容的姿态与世界文明进行交流。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文明蒙尘，恰恰是因为一段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丧失了与世界和平交流的渠道，最终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落后于世界潮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救亡图存的进程中，无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改革中，中华民族始终注重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力量合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1]</sup>。在新时代，中国积极倡导和推进世界和平，将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相统一，以相互合作、共赢发展为主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和平、开放包容精神的当代转化，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特质<sup>[10]</sup>。

### 三、中国共产党对增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贡献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在数千年的时间段中都保持着高度发达的主体性。然而，晚清以降，封建统治者保守的文化心态使得中华传统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陷入停滞，逐步落后于世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落后在教育、思想文化、科技、工业和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都有体现，最终使全民族陷入了危亡，也促发了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华民族有了主心骨，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伴随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而得到重建、更新和升华。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完成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建。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途径的救国探索，却均以失败告终。随着救亡探索转向文化革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开始重建，中华民族的救亡探索迎来光明的前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发挥主体的灵活性，开展文化启蒙，重视通过革命文化的建设和民族自尊心的发扬来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化。党非常重视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提倡发扬民族自尊心，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侵略。在抗日战争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初步形成重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其标志是毛泽东提出了“新文化”概念。毛泽东指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sup>[2]</sup>，强调新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sup>[2] 707</sup>，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sup>[2] 707</sup>，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sup>[2] 708</sup>。“新文化”概念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怎样发扬文化主体意识、推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初步理论总结。在重塑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引导下，党推动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更新运动。例如，党认为文化应当为人民服务，推动艺术和文化创作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弘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党鼓励和支持一批有艺术才华的人民艺术家开展文化创作，使中华文化以人民为基础的新主体性得以建立和发展<sup>[11]</sup>。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也做出了努力。在延安时期，党领导建设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高等院校，注重榜样教育、实践教育、劳动教育<sup>[12]</sup>，注重坚持爱国情怀和科学素养的并重，推动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导向的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文化主体性的更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新民

主义的文化建设目标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一致，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对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争取独立和自由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主体性的生长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文化主体性的生长和发展。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这一阶段党把握到了时代新的脉搏，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注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使文化主体性在顺应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过程中蓬勃生长。党推动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如提高妇女地位、推进农村的土地改革等。这些改革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重塑了个体的爱国意识和主动性。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sup>[13]</sup>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主体的先导作用，通过各项改革和文艺手段积极塑造社会主义的文化氛围<sup>[14]</sup>。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大力倡导文化的普及与发展，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适应、推动和引导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以“双百”方针为标志，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进入快速生长与发展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和引领。这一时期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技术人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主体性的生长与充实进程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需要，丰富的文化成果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繁荣的文化氛围促进了个体参与文化创造，提高了每个公民建设国家的自觉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为新中国建设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主体性的更新与充实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完成了文化主体性的更新与充实。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1978年，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鼓励人民群众敢闯敢试，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改革为文化领域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创作、传播中来。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党时刻注重发挥文化对社会文明的引导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sup>[15]</sup>，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sup>[15]</sup>，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在这些方针的指引下，党鼓励和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文化企业的市场化运作等。这些举措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多元文化的需求<sup>[16]</sup>。这一时期，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我国面临着多元思潮的冲击风险。党的高度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在文化建设进程中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兼顾国内视野与全球关怀、整体的方向与价值观的目标、思想领域的团结与产业层面的落实，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升华与彰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进行着文化主体性的升华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17]</sup>。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进行精确把握，成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最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从多个方面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的主体灵活度。这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需要，也体现了我们党积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主体创新意识。“第二个结合”引导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互促进，创造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明有机体。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并且使通过这种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这一目标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总体方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更加广阔和深远的历史纵深，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主体独特性的重视。我们能够主动掌握思想和文化，并将其有力地应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革新的浪潮中诞生，党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新文化”概念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设开始上升到理论自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面对时代需要、回应人民呼声，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逐步得到生长、充实和彰显。

#### 四、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建设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确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继续发扬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开辟新前景。

##### （一）以主体的灵活性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相对于科学、技术、工具、资金等文明的实体成果和物质存在，文化是一种在文明主体思想观念和意识中的动态存在、软性存在，文化的变革相对于物质实体的变革展现出极大的灵活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新发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以主体的灵活性为基础。发挥主体的灵活性能够促进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该与时俱进。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使其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sup>[18]</sup>。主体的灵活性要求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



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sup>[19]</sup> 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指导实践而存在的, 只有与实际相结合, 才能真正发挥指导作用。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通过实践不断验证和完善理论, 使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 （二）以主体的文化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独特身份标识

文化是一民族与它民族得以区别的标志, 是一民族相对它民族而能凝聚为团体的精神吸引力。一个民族只有具有文化自豪和自信, 才能走向更大的繁荣和发展<sup>[20]</sup>。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 中华民族有足够的为自身的文化身份而骄傲的历史底蕴。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包括诸多独特的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等, 这一切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身份标识。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所依赖的文化源泉。2021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sup>[21]</sup>。2023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 “无论是出台法律法规还是政策措施, 都要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不移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确保各民族青少年掌握和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sup>[22]</sup>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的根本、民族和睦的灵魂。在悠久的文明演化史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身份认识和精神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 （三）以文化的先导性引导社会文明良性发展

文化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核心。文化具有对人类未来需要、社会物质成果发展方向的即时反应力和高度敏感性。文化对社会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进步都可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激发一个民族价值意识和观念体系的充实、发展和更新, 可以促进所在国家科技、政治、生态各方面的良性发展。应更好地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把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融入教育、媒体、社会服务和治理等各领域, 让文化成为扎根人民、深入人心、寓于民生的滋养源泉。要发挥中华文化的引领作用, 塑造中华儿女的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 引导全社会规范道德行为、尊重法治、热爱家园, 共同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是动态的, 文化发展的本质是创新。要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 不断深化和丰富文化内涵, 注重革新文化方式和手段。以文化的先导性引领社会文明良性发展,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进步和美。

### （四）以“家国天下”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建设的精神源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逐级递进的关系, 它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观念。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 国就是大的“家”, “家”就是小的“国”, 二者都是由以“忠孝”为核心的统一的儒家道德修养、伦理架构和责任义务支撑起来的<sup>[23]</sup>。“家国天下”精神这种推“小家”及“大家”, 推“家”到“国”“天下”, 从而将国家的兴衰与个人的荣辱紧密相连的责任意识,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承载和体现。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 传承“家国天下”精神可以促进当代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 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家国天下”强调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和奉献; 在现代社会, 这一精神已经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层面<sup>[24]</sup>。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 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推动全社会形成现代化的“家国天下”精神。这种经历现代转换的“家国天下”精神将超越个人及其国家的范畴, 涉及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 将社会责任与全球视野相结合, 形成更为广泛的“家



国天下”意识。

#### （五）以“和实生物”精神促进文化交流

“和实生物”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中华传统价值观提倡面对差异持一种包容平和的心态，以促进事物共生互利、共同发展，认为一味地追求事物的同质化，反而会造成发展难以为继。在现代社会中，把“和实生物”精神转换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开放心态，能够使其在更广泛的层面成为促进文化交流的积极因素。现代的“和实生物”精神将超越国内的范畴。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的状况，“和实生物”精神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现代的“和实生物”精神也将融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弘扬“和实生物”精神，可以打破文化隔阂和偏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增进友谊和合作，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和实生物”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转换，为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观和行动指南。

#### （六）以“天下为公”精神推动和谐共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精神，能够升华为全人类和谐共生的精神资源。“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古老的社会理想，它主张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公心”，都共同关注天下的事务，为群体利益作贡献，从而达到“大道流行”的和谐状态。新时代发扬“天下为公”精神，可以促进不同群体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建设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天下为公”仍然是中国内部的公平正义。但在现代社会，这一精神已经扩展到了全球的层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推动“天下为公”精神超越国内的范畴。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对“天下为公”精神进行结合与转化，意味着要关注全球的公共利益，追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sup>[25]</sup>。“天下为公”精神与全球和谐共生的理念内在一致。“天下为公”精神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追求共同的幸福和繁荣。弘扬“天下为公”精神，可以促进建立全球共同繁荣的社会。

## 五、结语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党的领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准确把握时代大势，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完成了文化主体性的更新与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持续得到发展和巩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1]</sup>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巩固的最集中体现。坚持“两个结合”，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蔡奇主持[N]. 人

曹一飞. 从新文化到新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00-109.

民日报, 2023-06-03 (1).

- [2]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480.
- [3] 郭丽瑾, 肖周录.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理路 [J]. 学术探索, 2022 (10): 53-59.
- [4] 何鹏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论析 [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23 (2): 26-32.
- [5] 刘永佶. 中国文化现代化 [M]. 河北: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41-92.
- [6] 韩琛. 再造文明与复古革命——世界史上的“五四”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6): 4-11.
- [7] 余双好, 李秀. 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 51-56+2.
- [8] 许苏民.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25.
- [9] 韩昇.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321-400.
- [10] 唐诗.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73-80.
- [11] 王鑫. 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1: 148-230.
- [12] 汪媛, 张正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高校劳动教育的历史审视 [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1): 57-59.
- [13]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692.
- [14] 刘俊, 傅元峰. 中国现当代文学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30-50.
- [15] 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7-18.
- [16] 欧阳雪梅.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化建设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 (12): 33-39.
- [1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18] 高继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守正创新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 (1): 22-30.
- [1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N]. 人民日报, 2023-07-02 (1).
- [20] 邹广文. 以文化自信自强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 [J]. 求索, 2023 (2): 16-23.
- [21]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22]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3-06-09 (1).
- [23] 俞可平. 孝忠一体与家国同构——从丁忧看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 (5): 114-117.
- [24] 李安增.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M]. 山东: 齐鲁书社, 2020: 155-180.
- [25] 肖群忠.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 (5): 66-74.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美国对华认知战：动向、影响与应对

郭永虎 张函语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认知战是指某个国家、政治集团、军队或社会群体从认知域的角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有计划、有目的地渗透他国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故意影响他国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以达到本国政治目标、实现本国利益的一种政治活动。它是一种全新领域的作战方式，集政治战、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智能战、网络空间战于一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有其历史背景、技术背景和现实动因。从历史溯源来看，认知战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心理战的时代延续；从技术层面看，认知战是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升级版”和“加强版”；从现实动因看，渲染“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对立，强化综合威慑效果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初始动机。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问题、涉港、涉台、涉疆、涉藏及军事安全等领域发起了认知战攻势，企图颠覆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美国对华认知战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意识形态安全、民族团结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对华认知战的不断升级，中国要将认知战的应对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同时抢占人工智能这一认知域前沿科技制高点，有效应对美国对华开展的认知战。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认知战；中美关系；人工智能；南海；国际形象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3) 04-0110-14

---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3.04.011

**作者简介：**郭永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函语，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19ZDA169）；吉林省高教学会高教科研课题“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JGJX2023D31）

**引用格式：**郭永虎，张函语. 美国对华认知战：动向、影响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10-123.

随着认知心理学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 认知战逐渐成为大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博弈的重要方式。2022年, 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认知战提升到与物理层面作战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sup>[1]</sup>。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 美国从认知层面加紧了对华意识形态渗透和宣传, 妄图以“政治正确”模式强行以意识形态划界, 孤立和遏制中国, 夺取和控制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美国在中国核心利益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认知战攻势, 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and 国家形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从研究现状来看, 目前学术界对认知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从军事层面对认知战的特征和手段进行了研究。孙金华从叙事理论研究框架出发, 在宏观和微观叙事策略层面上由表及里地探析美军认知战的本质<sup>[2]</sup>。郭瞳霖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探讨了认知战场角逐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模式的启示<sup>[3]</sup>。桂晓等学者从军事领域分析了认知战的特征和主要方式<sup>[4]</sup>。二是从国际政治层面对美西方在全球开展认知战的主要活动进行研究。门洪华等学者从大国博弈的战略设计层面出发, 系统勾勒美国当局围绕认知域的战略布局与战略指向, 思考大国认知域博弈对中国的启示和防范认知风险的可行路径<sup>[5]</sup>。谢文涛对美国认知战为何能影响大国战略稳定以及如何影响大国战略稳定进行了探讨<sup>[6]</sup>。张景全分析了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实践<sup>[7]</sup>。马妍探讨了美西方与俄罗斯认知攻防战的手段与效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sup>[8]</sup>。总体来看, 学界对美国针对中国开展认知战的研究仍非常薄弱, 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鉴于此, 本文拟从界定认知战的概念入手, 分析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背景, 探讨美国在中国核心利益领域发动认知战的新动向, 分析其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进而提出应对举措。

## 一、认知战的概念界定

认知域作战这一思想在我国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 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我国的《孙子兵法》蕴含了认知战的萌芽思想。《孙子兵法》阐述形势、奇正、谋攻、军争、九变、行军、用间等谋略, 都是建立在科学认知之上的高度智慧。比如, 《孙子兵法》写道“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 “是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西方“认知战”的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他提出战争要通过暴力手段打败敌方的意志, 消灭敌人的精神力量。20世纪70年代, 美国战略家约翰·博伊德在克劳塞维茨的基础上提出“精神战”概念, 包括著名的“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理论。该理论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利用和放大敌方个体或群体的焦虑、猜忌、怀疑和恐惧等心理, 在敌人内部形成一种不安的政治氛围, 以达到瓦解敌方意志的目的。这为21世纪美国认知战战略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21世纪初, 美国在报告《网络中心战》中首次在军事上引入认知域概念。该报告将作战域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 认为认知域作战是对人心理和精神的掠夺, 这也是认知域首次作为独立战域被美国军方认可。2017年9月, 美国空军前参谋长大卫·古德芬在军事上正式提出“认知战”这一表述, 认为“战争形态正由消耗战向认知战方向转变”<sup>[9]</sup>。但古德芬所表述的“认知战”仍属于“信息战”范畴, 并非今天所说的影响和改变人类认知的“认知战”。2020年3月, 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推出“作战2040: 北约在未来将如何竞争”认知战项目, 将认知战界定为公众舆论武器化

的意识形态战争，全面展现美国对认知战概念、手段及地位等的深入理解。法军退役中校、现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创新中心主任弗朗索瓦·杜·克鲁泽（Francois du Cluzel）撰写《认知战》报告，从网络媒体、神经科学和法律等多个方面分析认为，认知战是对信息战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意识形态战争，同时也是一种参与式的宣传，旨在利用情绪、人脑的弱点、内心的焦虑和一些固有的观念，配合虚假或真假杂糅的信息，“编程”人的思维，达到削弱、干涉或扰乱目标人群的目的<sup>[10]</sup>。

北约创新中心于 2021 年 6 月发布《认知工作坊：改善认知的创新解决方案》。该报告将认知战定义为结合网络、信息、心理工程、社会工程等非动能作战能力的联合兵种作战方法<sup>[11]</sup>。这标志着认知战正式上升为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成员国为盟国的新型大国博弈战略计划。2022 年，北约科技组织（STO）发布《“认知战”：“认知”概念在战争领域的出现》报告。该报告指出，随着数字化战略决策辅助、新型作战域的出现以及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入侵，“认知域”作为第六战域通过与数字技术的紧密结合得到了很大发展。2023 年，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在《认知战：加强和捍卫思想》文章中指出，认知战是与其他权力工具同步进行的活动，为获得优势，通过影响、保护或破坏个人和群体的认知来影响态度和行为<sup>[12]</sup>。2023 年 4 月 18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安德鲁·麦克唐纳和瑞安·拉特克利夫在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发表《认知战：在人的维度上进行机动》一文，将“认知战”定义为故意针对个人认知以影响人类意志的行动和活动，并对认知战的作战构想进行了具体描绘<sup>[13]</sup>。

在学术研究领域，国外学术界对认知战的概念进行了探讨。法国认知科学家伯纳德·克拉维里在《认知战概念》（The Cognitive Warfare Concept）一文中表示，认知战是一种非常规的战争形式，是与信息战相关的较新的网络技术、软实力的人为组成部分和心理战操纵方面的结合，它利用网络工具改变人的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射性思维引发思维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动<sup>[14]</sup>。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研究者兰德斯（Richard·A·Landes）将认知战描述为在不对称冲突中由弱势一方进行的战争，操纵信息和思想，旨在说服较强一方不要使用其优势力量，以便重新部署、更好地进行军事战争<sup>[15]</sup>。除此以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认知战整合了网络、信息、心理和社会工程能力以实现其目的。认知战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选择地、连续地针对一个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个人、特定群体和大量公民，试图播下怀疑的种子，引入相互矛盾的叙述，使观点两极分化，使群体激进化，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破坏或分裂一个原本有凝聚力的社会<sup>[16]</sup>。

当前，对于认知战的具体内涵，国内缺乏权威定义，国内学者大多围绕“认知域作战”进行概念界定。2012 年，逯记选等学者较早提出认知域作战概念。“所谓认知域作战，就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对对方人员的认知、情感、意志、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进行干扰或攻击，以掌握整个战争的政治态势和心理走向的主导权，是迄今为止人类战争的最高层次。”<sup>[17]</sup>桂晓等研究者认为，认知战源于信息战但不限于信息战，“在美国，认知战是指国家或团体通过影响对方公民或类人类机器的认知过程，渗透、削弱、征服或摧毁认知机制，引发思维扭曲、改变认知水平并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模式”<sup>[4]</sup>。马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认知战指的是以现代认知理论和科学为指导，调用舆论、心理、法律等多领域手段，开展舆论宣传、心理攻防、人心争取、信心颠覆、信仰影响、思维争夺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等活动，意在争夺人们在思维、信仰、价值观、个人态度、情感、认同与评

判倾向方面的主动权, 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sup>[8]</sup>。

随着认知战的理念不断完善和发展, 其概念也在变化和更新。本文认为, 认知战是指某个国家、政治集团、军队或社会群体从认知域的角度,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有计划、有目的地渗透他国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 故意影响他国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 以达到本国政治目标、实现本国利益的一种政治活动。认知战是一种全新领域的作战方式, 是集政治战、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智能战、网络空间战为一体的作战形态。

## 二、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背景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有其历史背景、技术背景和现实动因。从历史溯源来看, 认知战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心理战的时代延续。从技术层面看, 认知战是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升级版”和“加强版”。从现实动机来看, “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争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初始动机。

### (一) 历史缘起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经历了萌芽、发展、不断成熟的历史过程。认知战与心理战可谓同根同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NSC74 文件中提出心理战的目标: “心理战用于国家宣传和其他非战斗行为, 用于交流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国外组织的观点、态度、立场、情绪和行为, 以此实现国家的目标。”<sup>[18]</sup>新中国成立初期, 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 杜鲁门政府加紧了对中国心理战计划的部署。1950 年 7 月 10 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将中国纳入其心理战计划。1951 年 10 月 23 日, 杜鲁门总统在其批准的 NSC10/5 号文件《隐蔽行动的范围与步骤》中明确将“挑拨苏联与其卫星国以及中国的关系, 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作为心理战的目标之一<sup>[19]</sup>。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以涉藏心理战为例,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在 1959 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战略评估, 并确定其宣传战略目标为“向公众传媒最大限度地宣传西藏叛乱”。解密档案显示, 叛乱发生后, 美国新闻署整合全球各类新闻资源对事件进行铺天盖地的歪曲性报道。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发表了多篇社论指责中国政府。该报还将平息西藏叛乱与当时的“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sup>[20]</sup>。1959 年 10 月 8 日,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 小罗威尔·托马斯 (Lowell Thomas) 出版了《西藏的无声之战》一书, 书中蓄意歪曲历史, 污蔑中国共产党所谓“侵略”西藏<sup>[21]</sup>。半个多世纪后, 尤其是特朗普至拜登时代, 美国在涉藏问题上对华发动认知战的动机和本质与 20 世纪 50 年代如出一辙。

### (二) 技术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AI 搜索等新技术支撑的“智能+”时代加速演进, 美国日益重视新兴技术对人类认知方式和观念构建的重要影响, 对于战争的认识出现了变化。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 现代战争已经逐步表现为心理战、信息战、舆论战、贸易战等, 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对抗领域——认知域。人工智能赋能认知战的巨大优势在于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又高度自动化, 不知不觉地高效影响、感染和塑造对手的思维认知<sup>[22]</sup>。它能精准渗透指向性信息, 引导受众群体的思维认知。



人工智能融入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势必会对战争的形式产生一定影响。202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推出 ChatGPT 聊天机器人，标志着搜索 AI 化的到来。ChatGPT 为人类带来搜索便利的同时，也将对人类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若美国将 ChatGPT 作为其发动认知战的手段之一，那么其抹黑中国形象言论的渗透效果将会更强。当前正处于中美激烈博弈的时期，在 ChatGPT 搜索有关美国污蔑中国的内容，ChatGPT 基本会给予肯定回答。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在认知战中充当的角色日益重要。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是美国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领域，或将成为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重要技术支撑。

### （三）现实动因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不仅刺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中美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感到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2017 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sup>[23]</sup>中，将中国定性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正式开启对华战略新阶段。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以及美国国内反华舆论进一步强调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美国造成的所谓“重大威胁”<sup>[24]</sup>。2022 年，拜登更是在其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高度聚焦所谓“中国威胁”<sup>[1]</sup>。为此，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全方位打压。从效果来看，美国的遏制手段难以阻挡中国发展势头。随着中国有效防范重大社会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策略和措施的落实，美国原有的政治孤立、军事围堵、人权干涉等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很难发挥更大的破坏作用。于是美国变换渗透手段，通过认知战发动内容更加隐蔽、形式更加多样、方法更加弥散的具象化渗透、炒作性渗透、诱导性渗透、学术性渗透，妄图以此摧毁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进而策动“颜色革命”<sup>[25]</sup>。

## 三、美国围绕中国核心利益实施认知战的新动向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攻势的领域有着明确的选择性和指向性，即紧紧围绕中国的核心利益展开。2011 年 9 月 6 日，我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第一次正式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界定。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六大方面：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sup>[26]</sup>。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安全、中国政治制度等核心利益，在南海问题、涉港、涉台、涉疆、涉藏和军事安全诸多领域开展了频繁的认知战攻势。

### （一）南海问题领域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南海问题逐步成为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重要领域。针对南海问题，美国刻意误导世界认为中国存在“侵略行为”，“严重威胁”海空安全。首先，美国借“领海权”造势塑造所谓中国霸权形象。2022 年 1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海洋界限》期刊发布“中国在南海的海权声索”报告<sup>[27]</sup>，全盘否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正当权益，诬蔑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报告蓄意曲解、违背《公约》条款和精神。在报告中，美国歪曲事实，谎称中国存在

“过度海洋权益主张”, 污蔑中国在南海以直线划定领海基线“违反”《公约》条款, 并妄称中国的南海管辖海域主张超出《公约》规定。其次, 该报告以所谓“南海仲裁案”为法理依据, 十分荒谬。美国在报告中指责中国“过度海洋权益主张”的法理依据, 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政治闹剧的“南海仲裁案”。报告依据所谓“裁决结果”称中国南海九段线主张“非法”, 否认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最后, 该报告罔顾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合作发展大好局面, 肆意挑拨生事。

美国刻意渲染中国在南海存在所谓“军事威胁”。2022年2月, 拜登政府出台了一份全新版本的“印太战略”报告, 妄称中国的所谓“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 且在印太地区(包括南海)最为严重, 这些行为“违背”了国际法原则、航行自由原则以及该地区繁荣稳定<sup>[28]</sup>。2023年5月, 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圭利(John C. Aquilino)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一次公开活动的演讲中频频抹黑中国, 污蔑中国通过南海“军事化”来“违反”国际规范<sup>[29]</sup>。2023年3月, 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针对印太安全问题举办研讨会,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Ely Ratner)在会上表示, 中国解放军不止变得日益强大, 在做决策时也越来越冒险, 将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执法行动渲染为“不安全军事拦截”, 诬称中国有意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对南海存在所谓“侵略”行为<sup>[30]</sup>。同年6月5日, 美国白宫再次将中国舰艇及战机对美国军队的合法、合理执法活动渲染为“危险行动”, 杜撰中国造成海空安全风险<sup>[31]</sup>。当前, 中国与东盟国家仍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频繁通过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手段介入南海问题, 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 是名副其实的磋商干扰者和氛围破坏者。

## (二) 涉港、涉台领域

香港和台湾也是美国对华开展认知战的重要领域。自香港修例风波后, 美国再打“香港牌”, 其“以港乱中”的图谋不言而喻。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敏感议题, 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支持台湾当局, 以制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首先, 美国污名化“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将香港妖魔化为所谓“无民主”“无人权”地区。2019年上半年, 围绕《逃犯条例》的修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达所谓“关切”和“担忧”, 诬称修例会影响香港自治、干扰香港法治。2019年9月17日, 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在香港局势听证会中, 公然抹黑香港特区政府, 诬称其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自治, 意图颠覆国际社会对香港真实情况及香港特区政府的认知<sup>[32]</sup>。2021年6月21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借新闻自由公然抹黑香港特区政府, 称其以香港国安法压迫独立媒体、扼杀言论自由。2021年7月21日, 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所谓投资报告, 炒作所谓香港国安法风险, 扭曲香港经营环境的真实情况<sup>[33]</sup>。2023年3月, 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2023年香港政策法报告”<sup>[34]</sup>, 无端诋毁香港法治状况、民主状况、人权状况等。

除此以外, 美国还公然为乱港分子进行舆论造势。2019年6月19日,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早餐会发言时, 将反中乱港分子的暴行美化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然鼓动反中乱港分子同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抗<sup>[35]</sup>。特朗普任期内, 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活动较以往更加活跃, 涉港立法数量和通过率激增, 为美国全面介入香港事务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在此期间, 美国国会共提出40余项涉港议案, 其主要意图为: 干涉香港“人权”和选举事务; 策动涉港问题国际化, 联合国际反华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将所谓香港“自治”程度与美国“给予”香港的所谓特别待遇挂钩; 对维护香港稳定的人员实施所谓制裁措施。美国国会涉港立法使美国政府对香港事

务的干涉长期存在，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增加了我国解决香港有关问题的难度，助长了反中乱港势力的嚣张气焰，对香港繁荣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从认知域层面屡次恶意渲染“中国强硬论”，阻挠中国统一大业。假消息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平台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官员也曾在推特、脸书上公开谎称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存在所谓“侵略”行为。推特甚至关闭所谓“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号，意图扰乱国际社会舆论，不断塑造中国具有所谓“攻击性”的认知。2022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会中，诬称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存在所谓“潜在侵略行为”<sup>[36]</sup>。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还在公开演说中用“民主”形容台湾当局，而用“威权”形容大陆，严重损害台湾地区对大陆形象的认知。2022年9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sup>[37]</sup>，声称台湾面临所谓的“生存威胁”。2023年3月，“台湾保证落实法”通过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安·瓦格纳（Ann·Wagner）声称台湾正面临所谓“前所未有的威胁”。

### （三）涉藏、涉疆领域

美国通过干涉我国民族事务妄图实现对华遏制。长期以来，炒作涉藏、涉疆议题是美国塑造对华负面认知的重点领域。首先，将中国塑造为一个所谓“反人权”的“威权”国家。在涉藏认知战中，美国主流媒体、行政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都参与其中。2020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发布一篇名为“美国制裁‘限制’国际社会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的报道，报道中将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歪曲为中国“非法兼并”西藏<sup>[38]</sup>。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开展涉藏认知战的急先锋，其创设的涉藏宣传项目数不胜数，内容涉及资助反华涉藏媒体、举行涉藏学术会议、涉藏信息收集、网络传播，旨在争夺国际涉藏话语权，影响世界有关舆论和价值导向。2022年7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员麦戈文提出所谓“推动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第8365号法案）。该法案企图从历史认知层面对西藏主权归属进行歪曲定性。在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同时，该法案拒绝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妄图否定中国对西藏治理的合法性。为了鼓吹“藏独”论断，该法案还为此提供专门的宣传资金，要求依据“2018年亚洲再保险倡议法”相关条款为美国相关部门提供资金拨款宣传所谓“西藏独立”<sup>[39]</sup>。

在涉疆问题上，近年来，美国政界、学术界、媒体等密切合作，炮制出涉疆所谓“强迫劳动”“集中营”“种族灭绝”“强制绝育”等谎言，妖魔化新疆。其中“强迫劳动”是美西方和新疆分裂势力炮制出的一个典型认知战概念。“强迫劳动”是美国政府、反华智库与媒体相互勾结，以主动关联度和信息确定度二维需求为原则而恶意设置的议题。国外民众对“民主”“自由”具有较高的话题关注度和情感认同度，但对新疆缺乏基本了解。美国通过认知战，迫使国外民众将涉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交付媒体，并落入多方先行设置好的舆论泥潭之中。

美国还形成了“强迫劳动”的谎言生产链。首先，美国“智库学者”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2020年12月，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发布报告，诬称中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扶贫计划，“强迫”数十万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手工采摘棉花<sup>[40]</sup>。2021年4月，美国人权观察发表文章，罗列中国所谓“侵犯”少数民族群体人权的“罪证”<sup>[41]</sup>。美国媒体逐步沦为涉疆谎言制造链条的传播终端。近年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接连发布关于新疆的文章，编造一系列所谓“证据”，

妄图向大众宣传新疆地区存在所谓“侵犯人权事实”。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编造、拼凑了新疆所谓“镇压”少数民族的所谓“内部文件”<sup>[42]</sup>。2022年9月,《纽约时报》再发表文章,罗列了一些所谓“证人”的证词<sup>[43]</sup>。2023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妄称“中共正在努力从历史上抹去其在新疆行动的痕迹”<sup>[44]</sup>。这无一不是对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恶意负面报道,美国想在认知层面引导有关舆论走向的意图昭然若揭。

#### (四) 军事安全领域

渲染“中国军力威胁论”,营造中国“霸权”形象,是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对华开展认知战重要议题。近年来,美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妄议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无端指责中国国防开支、核政策、军备等问题,毫无根据地宣称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妄图将中国塑造成“好战”“野蛮”“咄咄逼人”“不遵守国际秩序”的威胁者形象,企图改变世界对中国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的认知。

美国声称中国造成了所谓“军事威胁”。2019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发表演讲时声称,中国近年对军事的投入不断增加,中国军费已接近2500亿美元,还污蔑中国近年来不断“侵犯”亚太地区国家主权。2022年1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sup>[45]</sup>中,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球军事后勤网络可能会对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所谓威胁,曲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美国“2022年国家防务战略报告”<sup>[46]</sup>中的涉华内容,延续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威胁驱动”的错误论调,罔顾事实渲染所谓中国“挑战”和大国竞争,借规划美国防务战略抹黑中国正常军力发展。2020年12月8日,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sup>[47]</sup>,诬称中国解放军将在20年内建立全球基地网络。同年,埃斯珀在一篇题为“美国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应对中国”<sup>[48]</sup>的文章中,无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声称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所谓“军事威胁”。

美国知名媒体也多次负面解读中国。2021年,《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在哈密地区建造了11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诬称中国在扩展巨大的核武器库<sup>[49]</sup>。在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削减全球核力量时,美国发布这样的文章刻意抹黑中国,旨在引导世界形成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在脸书的讨论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威胁”字眼。2020年10月,美国之音中文网脸书官方账号发布抹黑中国的帖子,内容多次提及“中国威胁”“防御中国”,妄图在民众认知中树立“美国正义、中国霸权”的概念。

### 四、美国对华认知战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随着美国先后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和“中国工作小组”,美国已形成以国务院为主导,国防部与国家情报部门协同,社媒、智库、对华强硬派及非政府组织上下一体联动的全方位对华认知战体系。美国将对华认知战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由于美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发表的不当言论和虚假消息,已经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为此,我国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对华发动的认知战。

### （一）负面影响

#### 1. 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相近、合作密切，美国对中国的抹黑污蔑更容易获取美西方国家民众的信任。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占有强大的话语权，美国围绕所谓“人权”、新冠疫情、军事安全等方面进行话语构建，为中国打上“不尊重人权”“不担责”“危险”的标签，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近年来，美国发布了一系列报道、报告等指责中国存在所谓“人权”问题，污蔑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时，美国将病毒标签化，肆意攻击和诋毁中国的抗疫政策和抗疫成果，丑化世界认知中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发动认知战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逐渐下降。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 10 月 6 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英、德、荷、加拿大和西班牙等国的对华负面看法已显著飙升，达到十几年来最高点<sup>[50]</sup>。2022 年初，晨间咨询公司以“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为主题的调查结果显示，超 80% 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及超 62% 的美国人 and 英国人对中国持所谓负面态度。同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报告《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与对其人权政策的“批评”有关》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19 个国家中，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仍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有“82%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sup>[51]</sup>。此外，美国还不断干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近年来，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不断地在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越南及周边地区以当地语言制作网络、电台与电视节目，污蔑中国在东南亚投资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负面影响，渲染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人民的所谓冲突。这些诋毁行动在无形中埋下了认知隐患，可能降低当地民众的对华认同度<sup>[52]</sup>。

#### 2. 干扰我国国内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全球策动认知战背景下，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形势更加复杂。美国对华认知战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将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公民政治鉴别力、民族凝聚力以及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力、影响力、破坏力、危害力。借助艺术传播美式认知观是美国渗透他国认知体系的重要方式。部分好莱坞电影中渗透了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英雄主义等美式价值观，凭借其在国内的影响力，试图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塑造我国民众的认知观念和价值体系。这影响了少数狂热“崇美”分子，他们逐渐偏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轨道，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时至今日，美式价值观、美式生活观、美式认知观带来的消费主义思潮、后现代生活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非主流思想和行为仍有存在。这与美国意识形态渗透不无关系。

#### 3. 干扰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

美国围绕涉疆和涉藏领域对华发动的认知战，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不利于我国民族大团结。美国的一些政要和非政府组织常常指责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其散布的不当言论往往会通过全球化传播渠道进入中国，影响国内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边疆民族政策的认知。这些言论甚至可能导致一部分国内民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质疑。这无疑会对民族团结产生破坏。其次，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支持和资助民族分裂分子，助长其嚣张气焰，破坏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最后，



美国针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虚假宣传, 妄图制造民族对立和民族矛盾, 带来风险隐患。

## (二) 中国应对

### 1. 将认知战应对提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为了有效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 务必将认知战应对提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将认知域纳入常态化安全形势分析议题, 推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关键领域等严密防范认知域风险<sup>[5]</sup>。首先, 必须警惕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 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反颠覆、反渗透的防线, 旗帜鲜明地抵制美式价值观侵蚀。其次, 制定认知战应对的战略计划。明确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和实施计划, 包括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信息传播的掌控、媒体的引导与管理、网络状况的监测与干预等内容, 全面提升国家在认知战中的竞争力。再次, 要培养具备专业能力和战略视野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具备对信息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 熟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观, 同时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和危机处理能力。最后, 巩固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要充分调动一切资源, 打造优质媒体平台, 官方新闻媒体、社媒、智库等及时回应热点问题和舆论关切, 准确地澄清美国编造的涉华谎言并予以回击, 同时深入开展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

### 2. 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要加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发声能力, 占据国际涉华舆论制高点, 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首先, 要加强主流媒体影响力, 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 通过收购、合作等方式扩大媒体影响力, 增加报道覆盖面和影响面, 更广传播中国的声音和观点。要积极地国际社交平台上建立多主体、立体化、层级化的传播体系, 切断智能算法操纵认知的链条。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 我们要对传播内容进行有效转化、精准传递, 讲好中国故事。其次, 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和展示中国的发展成就、文化传统和国际贡献, 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出版物、电影、音乐内容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传播我国正能量的人物和故事, 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最后, 加强国际舆论场域中的参与和发声。要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倡议,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增进他国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 更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正面积的角色, 争取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 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积极倡导和平的负责任大国。

###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美国屡屡干涉我国内政, 并借机挑起争端。美国对我国国家制度、执政党、人民军队肆意抹黑, 恶意挑唆民族分裂分子, 妄图打击我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有效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应然之策。中国已经挫败了美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 现在面临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新攻势, 这将是一场长期较量<sup>[53]</sup>。为此, 要在全社会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首先, 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 使民族团结思想深入人心, 提高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 要深化五个认同教育, 引导民众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五个认同”增强“四个自信”, 引领民众形成正确的认知观, 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后, 要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提高我国民众明辨是非的能力, 自觉抵御美国恶意编造谎言的认知战攻势。



#### 4. 着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互联网是认知战的主战场，因此务必全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首先，要不断优化互联网核心技术手段。加强互联网核心技术和安全设备的研发与应用，建立先进的网络监测和过滤系统，阻止不实内容和有害内容的传播。务必深刻意识到互联网核心技术对于认知战的重大作用，加快制定互联网核心技术的中远期发展战略。与此同时，运用采集技术对搜索引擎的涉华实时关键词、海外社交媒体上的重大消极言论、各方最新发布的中国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关联量化和汇聚整合。对有关舆情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完成溯源工作，利用时间差阻隔任何对华首轮舆论攻势以外的后续联动反应<sup>[52]</sup>。其次，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明确和规范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管理与监管措施，加强对网络内容和网络舆情的监督。最后，要加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高民众对不良认知的辨识与抵御能力，牢牢筑起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 5. 抢占人工智能这一认知域前沿科技制高点

当下，美国在认知域前沿科技领域加大对华封锁与遏制，我国务必努力提升在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力，抢占人工智能这一认知域重要前沿科技的制高点。人工智能作为“力量倍增器”，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因此，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研发，也是在努力抢占认知战的制高点。首先，要大力发展认知域前沿科技，加强前沿科技领域人才培养与保护，通过建立攻防技术跨学科创新综合体、网络认知域攻防模拟实验平台等，提升把控相关核心技术的水平<sup>[5]</sup>。其次，要加强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交叉学科背景的顶级人才，打造认知域前沿科技优秀研发团队。最后，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在情报搜集与数据分析领域的天然优势，它能高效分析和挖掘海量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各类新兴技术已经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数据搜集、整理与分析能力，将信息优势转化为认知优势，抵御美国发起的对华认知战。

#### 参考文献：

- [1] 2022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2022-10-12) [2023-06-15]. <https://news.usni.org/2022/10/12/2022-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 [2] 孙金华, 孟浩瀚. 叙事理论视角下美军认知战的本质探析 [J]. 国防科技, 2022 (6): 65-70.
- [3] 郭橦霖. 俄乌冲突认知战场博弈对人民军队的深刻启示 [J]. 中国军转民, 2022 (17): 81-83.
- [4] 桂晓, 王雁鹰, 田碧. 美国认知战的主要特点与手段 [J]. 军事文化研究, 2022 (4): 133-137.
- [5] 门洪华, 徐博雅. 美国认知域战略布局与大国博弈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6): 1-11+61.
- [6] 谢文涛. 浅析美认知战对大国战略稳定的影响 [J]. 军事文摘, 2023 (5): 22-26.
- [7] 张景全, 巩浩宇, 周帝言. 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及其实践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3 (4): 59-78+151.
- [8] 马妍. 俄乌冲突中的认知战及其镜鉴意义 [J]. 对外传播, 2022 (10): 78-80.
- [9] Defense Visual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Service. 2017 Air, Space & Cyber Conference: Air Force Update [EB/OL]. (2017-09-19) [2023-06-15]. <https://www.dvidshub.net/video/552609/2017-air-space-cyber-conference-air-force-update>.
- [10] Francois du Cluzel. Cognitive Warfare [EB/OL]. (2021-01-22) [2023-06-15]. <https://www.innovationhub->

郭永虎, 张函语. 美国对华认知战: 动向、影响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10-123.

- 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20210122\_CW%20Final.pdf.
- [11] NATO Innovation Hub. Cognition Workshop: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Improve Cognition [EB/OL]. (2021-06-01) [2023-06-15].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7/210601%20Cognition%20Workshop%20Report-%20v3.pdf>.
- [12] NATO's Strategic Warfare Development Command. Cognitive Warfare: Strengthening and Defending the Mind [EB/OL]. (2023-04-05) [2023-06-15]. <https://www.act.nato.int/article/cognitive-warfare-strengthening-and-defending-the-mind>.
- [13] U.S. NAVAL INSTITUTE. Cognitive Warfare: Maneuvering in the Human Dimension [EB/OL]. (2023-04) [2023-06-14].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april/cognitive-warfare-maneuvering-human-dimension>.
- [14] B, Claverie, &, F.D, Cluzel. The Cognitive Warfare Concept [EB/OL]. (2022-02) [2023-06-15].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CW%20article%20Claverie%20du%20Cluzel%20final\\_0.pdf](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2/CW%20article%20Claverie%20du%20Cluzel%20final_0.pdf).
- [15] R. A. Landes. Orientalism as Caliphator Cognitive Warfare: Consequences of Edward Saïd's Defense of the Orient [EB/OL]. (2021) [2023-06-14]. <https://doi.org/10.4018/978-1-7998-7180-4ch003>.
- [16] K. Cao, S. Glaister, A. Pena, D. Rhee, W. Rong, A. Rovalino, S. Bishop R. Khanna, J. S. Saini. 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 [EB/OL]. (2021-05-20) [2021-12-16]. <https://www.nato.int/docu/review/articles/2021/05/20/countering-cognitive-warfareawareness-and-resilience/index.html>.
- [17] 余运来, 陈茜. 认知域作战的致效机理与策略选择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2 (4): 128-139.
- [18] NSC74, Jul 10, 1950, CK3100377860, Database: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DB/OL]. (1950-07-10) [2023-06-14]. <https://www.gale.com/c/us-declassified-documents-online>.
- [19] NSC 10 /5, Scope and Pace of Covert Operations, The CIA Under Harry Truman [G]. Washington D. C.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4: 437-439.
- [20] Revolt in Tibet [N]. The New York Times, 1959-03-28 (16).
- [21] 郭永虎. “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J]. 史学集刊, 2015 (3): 67-74.
- [22] 陈东恒. 人工智能: 认知战的制胜刀锋 [N]. 解放军报, 2021-11-04 (7).
- [2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2017-12-18) [2023-06-14].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24] 徐金金, 罗雅琳. 2021年以来的中美关系: 战略相持 [J].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 73-82.
- [25] 刘建华. 当前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手段及其应对 [J].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1): 18-28.
- [26] 中国的和平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1-09-07 (14).
- [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in the Seas No.15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B/OL]. (2022-01-12) [2023-06-15].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

- uploads/2022/01/LIS150-SCS.pdf.
- [28] 王传剑, 张佳.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话语叙事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 225-232.
- [29] Preserving a Legacy of Liberty and Peace in the Indo-Pacific [EB/OL]. (2023-05-23) [2023-06-14]. <https://www.ncuscr.org/video/indopacom-aquilino/>.
- [30] Hudson Institute, Building a More Resilient Indo-Pacific Security Architecture: A Conversation with Dod's Ely Ratner and Lindsey Ford [EB/OL]. (2023-03-02) [2023-06-15]. <https://www.hudson.org/events/building-more-resilient-indo-pacific-security-architecture-conversation-dods-ely-ratner>.
- [31]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Karine Jean-Pierre and NSC Coordinator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John Kirby [EB/OL]. (2023-06-05) [2023-06-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3/06/05/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karine-jean-pierre-and-nsc-coordinator-for-strategic-communications-john-kirby-13/>.
- [32] Rubio Co-Chairs CECC Hearing on Hong Kong's Summer of Discontent and U.S. Policy Responses [EB/OL]. (2019-09-17) [2023-06-15]. <https://www.rubio.senate.gov/public/index.cfm/2019/9/rubio-co-chairs-cecc-hearing-on-hong-kong-s-summer-of-discontent-and-u-s-policy-responses>.
- [33]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09-25 (4).
- [34] 2023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EB/OL]. (2023-03-31) [2023-06-15]. <https://www.state.gov/2023-hong-kong-policy-act-report/>.
- [35] C-SP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Breakfast with Speaker Nancy Pelosi [EB/OL]. (2019-06-19) [2023-06-14]. <https://www.c-span.org/video/?461888-1/christian-science-monitor-breakfast-speaker-nancy-pelosi>.
- [3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pening marks by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B/OL]. (2022-04-26) [2023-06-15]. <https://www.state.gov/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antony-j-blinken-before-the-senate-foreign-relations-committee-2/>.
- [37]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EB/OL]. (2022-09-14) [2023-06-14].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BS%20Taiwan%20Policy%20Act%20FINAL%20\(1\).pdf](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SBS%20Taiwan%20Policy%20Act%20FINAL%20(1).pdf).
- [38] State Department Bars Chinese Officials Who Restrict Access to Tibet [EB/OL]. (2020-07-07) [2023-06-15].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7/world/asia/china-tibet-pompeo.html>.
- [39] H.R. 8365 - 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Act [EB/OL]. (2022-07-13) [2023-06-15]. <https://www.congress.gov/117/bills/hr8365/BILLS-117hr8365ih.pdf>.
- [40] Report from The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Coercive Labor in Xinjiang: Labor Transfer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Pick Cotton [EB/OL]. (2020-12-15) [2023-06-15]. <https://www.saveuighur.org/report-from-the-center-for-global-policy-coercive-labor-in-xinjiang-labor-transfer-and-the-mobilization-of-ethnic-minorities-to-pick-cotton/>.
- [41] Break Their Lineage, Break Their Roots China'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argeting Uyghurs and Other Turkic Muslims [EB/OL]. (2021-04-19) [2023-06-15]. <https://www.hrw.org/report/2021/04/19/break-their-lineage-break-their-roots/chinas-crimes-against-humanity-targeting>.

郭永虎, 张函语. 美国对华认知战: 动向、影响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10-123.

- [42] The New York Times. 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z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 [EB/OL]. (2019-11-16) [2023-06-15].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
- [43] The New York Times, For Uyghurs, U.N. Report on China's Abuses Is Long-Awaited Vindication [EB/OL]. (2022-09-01) [2023-06-15]. <https://www.nytimes.com/2022/09/01/world/asia/china-xinjiang-uyghurs.html>.
- [44] The Washington Post, How to fight China's memory-holing of the Uyghur genocide [EB/OL]. (2023-07-03) [2023-07-0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7/03/china-uyghur-genocide-history/>.
- [4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2-11-29) [2023-06-14]. <https://navyleaguehonolulu.org/maritime-security/ewExternalFiles/2022-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 [4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its 2022 Strategic Reviews-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uclear Posture Review, and Missile Defense Review [EB/OL]. (2022-10-27) [2023-06-15].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201683/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its-2022-strategic-reviews-national-defense-strategy/>.
- [47] RAND, China's Global Basing Ambitions Defen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22-12-08) [2023-06-14].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496-1.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496-1.html).
- [4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sper Discusses Moves Needed to Counter China's Malign Strategy [EB/OL]. (2020-8-27) [2023-06-14].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326863/esper-discusses-moves-needed-to-counter-chinas-malign-strategy/>.
- [49] The New York Times. A 2nd New Nuclear Missile Base for China, and Many Questions About Strategy [EB/OL]. (2021-07-26) [2023-06-1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26/us/politics/china-nuclear-weapons.html>.
- [50]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Majorities Say China Has Handled COVID-19 Outbreak Poorly [EB/OL]. (2020-10-06) [2023-06-15].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 [51]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Tied to Critical Views of Its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EB/OL]. (2022-06-29) [2023-06-15]. [https://www.pewresearch-org.translate.google/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_x\\_tr\\_sl=en&\\_x\\_tr\\_tl=zh-CN&\\_x\\_tr\\_hl=zh-CN&\\_x\\_tr\\_pto=sc](https://www.pewresearch-org.translate.google/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_x_tr_sl=en&_x_tr_tl=zh-CN&_x_tr_hl=zh-CN&_x_tr_pto=sc).
- [52] 阎国华, 何珍. 网络空间“认知战”的生发背景、主要形式与应对之策 [J]. 情报杂志, 2022 (12): 98-103.
- [53] 俞新天. 西方对华认知战的威胁与中国民间外交的提升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 (6): 30-46+13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 运作机制与中国应对

罗昕 张骁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技术的更迭使现代战争正迎来范式转变。传统意义上通过控制信息流以辅助军事目标的信息战正转向以改变公众认知、追求持久效应的认知战。美西方认知战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以广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宣传战阶段(20 世纪初—20 世纪 80 年代); 为夺取信息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信息战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初); 旨在改变受众思想、追求持久认知效应的认知战阶段(2020 年及其后)。当前, 美西方国家所开展的认知战呈现出战略叙事、多元主体参与、智能技术驱动三大特征。在战略叙事方面, 美西方善用名词建构, 扭曲事件性质; 制造虚假信息, 模糊受众认知; 利用情感叙事, 引起情绪爆发。在多元主体参与方面, 美西方的官方、媒体、智库三者协同发力; 个体参与传播, 创造“个人叙事”。在智能技术驱动方面, 美西方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精准化传播, 利用社交机器人达成高强度传播, 并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完成虚假信息传播。对此, 我国应从叙事、主体、技术和制度四个层面建立相应的认知战响应体系, 通过增强叙事自主性、增强社会协同能力、增强认知作战技术优势以及共建全球性治理框架, 沉着应对此类新型作战方式, 提高我国认知作战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

**关键词:** 认知战; 人工智能; 战略叙事; 社交机器人; 虚假信息; 信息战; 宣传战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4-0124-10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4.012

**作者简介:** 罗昕,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骁,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 2023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后真相时代美西方涉华议题的舆论动态分析及应对策略”

**引用格式:** 罗昕, 张骁. 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24-13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愈臻完善, 如今舆论战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与传统宣传战和信息战的目的不同,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认知战旨在对人们的认知领域发起进攻, 通过信息操纵最大限度地改变受众认知和行为方式。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认知战的“制胜刀锋”<sup>[1]</sup>。当前, 国内有关美西方认知战的研究大多以俄乌冲突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战争, 标志着人类战争形态与方式的转变<sup>[2]</sup>。美国及其联合成立的北约组织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借助算力、算法、数据和平台的强大智能优势, 发动了强大的算法认知战, 极大地改变了俄乌冲突态势。由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正向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迭代, 展现出战略性、短视频化、情感化等特征<sup>[3]</sup>。

如今, 美西方国家已经对认知战进行了基本的战略布局, 相关行动计划已进入实操阶段<sup>[4]</sup>。因此, 对美西方认知战展开系统研究十分必要和紧迫。目前国内针对美西方认知战具体运作机制的研究还较少, 缺乏从整体层面对美西方认知战运作原理、实践做法进行深度分析。对此, 本文旨在对美西方此类新型作战方式开展研究, 分析其运作机制、运作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为未来可能面临的认知战做好准备。

## 一、美西方认知战的发展脉络

近两年, 认知作战成为全球范围内广泛讨论的话题。军事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领域都对认知战开展了相关研究。加拿大军方将认知战视为整合网络、虚假信息、错误情报、心理和社会工程能力对认知领域发动的进攻, 其目的不仅在于改变民众的想法, 还在于改变民众的行为<sup>[5]</sup>。美国神经学家詹姆斯·乔尔达诺 (James Giordano) 则在西点军校的一次演讲中将人类的大脑称为“21 世纪的战场”<sup>[6]</sup>。

综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 通过散布虚假信息、传播错误情报影响敌人心理与决策的作战方式早已有之。从冷战时期美国大规模开展的“宣传战”, 到 21 世纪各国为争夺信息权而进行的“信息化战争”, 再到如今基于认知领域而实施的认知战, 其作战目的都是通过信息资源为国家赢得战略优势。然而, 随着支撑技术与基础设置的更迭升级, 学界认为这些战争正迎来范式转变。为了厘清美西方认知战的发展脉络, 本文将其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以广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宣传战阶段 (20 世纪初—20 世纪 80 年代); 为夺取信息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信息战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初); 旨在改变受众思想、追求持久认知效应的认知战阶段 (2020 年及其后)。

早在 20 世纪之前, “宣传”一词就开始使用。然而, 真正较大规模的“宣传战”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交战各国无论是在国内开展舆论引导, 还是向盟友和敌人进行海外宣传, 都以广播为主要宣传工具。冷战时期, 宣传更是成为美国对外广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sup>[7]</sup>。当时除了美国新闻署合法开设的美国之音外, 美国还秘密开设了总部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 在欧洲开展大规模反共产主义宣传战, 成为现代“心理战”的一部分<sup>[8]</sup>。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 一个具有开放性、共享性、互联程度不断扩大的全球信息传播系统逐渐形成, 使基于信息基础设施和基于计算机网络开展的信息战得以发展。信息战 (information war) 作为一个概念, 最初在美国军事学说下创立和发展, 随后被几个国



家以不同形式采用。美国海军军官斯图亚特·格林 (Stuart Green) 指出：“信息作战是美国最接近认知战理论的概念，由五种‘核心能力’组成。其中包括电子战、计算机网络作战、心理战、军事欺骗和作战安全。”信息战旨在控制信息流，其设计主要是为了支持军事上定义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取得持久的政治成功<sup>[9]</sup>。1991 年的海湾战争正是人类历史上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的第一次由电视直播的战争。美国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全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等电视媒介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公众展现这场战争。美军火气冲天的导弹、伊拉克上空刺耳的防空警报等，给全世界的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动摇了伊拉克士兵的作战决心。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创新技术的发展，正在赋能新的作战方式——基于认知域所开展的认知战。事实上，早在 2008 年，就有西方学者对认知战这一概念展开探讨。然而，当时学者们对认知战的理解还主要停留在信息战阶段，仍以如何在战前、战中获取信息以辅助军事决策过程为主要目标。直到 2020 年，认知战才开始受到美西方重视，并对其作战组织和战争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2021 年，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隆索·伯纳尔 (Alonso Bernal) 认为大众媒体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正在成为战争的焦点，而应对这一威胁的战争就是认知战。伯纳尔指出，当前技术赋能下的认知战与网络时代发展起来的信息战不同，其目的不只是控制信息流，更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强大的算法能力，基于深度伪造技术 (Deepfakes) 制作虚假内容，产生具有情绪煽动性的信息，以扩大的媒体代理人团队等实现公共舆论武器化，最大限度地改变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sup>[10]</sup>。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加速发展，认知战逐渐发展成为有可靠算据、算力、算法支撑的作战样式<sup>[5] 116</sup>。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认知战也被称为“算法认知战”，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正在向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迭代。

表 1 伯纳尔指出信息战与认知战的区别

特征	信息战 (Information Warfare)	认知战 (Cognitive Warfare)
大量消息动态/数据的使用	√	√
致力于信息的流通	√	√
拥有极大的公众影响力		√
处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

随着如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世界经济面临严重衰退风险，认知域作战或许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场。作为一种成本相对较低、影响范围又可触及全世界的作战方式，认知战正在成为一些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以及确保其地缘政治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几年，西方国家开始重视认知战在当代战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纷纷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2017 年，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算法战跨职能小组”，并通过该机构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研究，以期重新获得对潜在作战对手的压倒性优势。2020 年，北约赞助的创新中心发布《2040 年作战项目报告》，明确提出“人类思维已成为一个新的战争领域，北约应该在信息领域和认知领域内准备防御和进攻工作”<sup>[11]</sup>。2022 年日本新修订的《国家防卫战略》提出，日本应从根本上加强防卫省和自卫队应对信息战的体

罗昕, 张骁. 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24-133.

制和功能, 在 2027 年前建立应对包括认知战领域在内的信息战的情报能力。2023 年 1 月, 美国国防大学《联合部队季刊》刊文《美国必须参与战略认知领域的斗争》, 提出美军应明确认知领域作战概念<sup>[12]</sup>。美国《2023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特别强调在军事领域对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应用, 并为相关项目授权 4.1 亿美元<sup>[13]</sup>。在未来智能化时代, 认知可能远比炮弹重要, 谁能率先抢占人们的大脑、影响公民和军事人员的认知机制, 谁就能为其战争胜利赢得巨大优势。

## 二、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

鉴于技术加持下的认知战展现出同信息战完全不同的特点, 以及其对个人和群体认知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探究其背后“塑造认知”“促使行动”的运作机制变得很有必要。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螺旋下降、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斗争不断激烈, 认识、了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更具紧迫性。我们需要弄清楚三个问题是美西方认知战在做什么、哪些人在做、通过什么手段来做。这涉及叙事、主体和技术等三个核心议题。

### (一) 战略叙事, 抢占舆论高地

话语建构和意义生产一直是信息战、认知战的主要内容。通过话语竞争和意义争夺, 潜移默化地形成有利于话语主体的国际舆论, 为其后续的相关行为提供正当性, 实现“合法化”自我和“非法化”他者的目的。智能时代下, 美西方的国际叙事体现出强烈的战略性。一方面, 美西方在虚拟空间开展战争的主要方式依旧是话语体系建构和议程设置, 通过“战略传播”来抢占命名权、阐释权和议程设置权<sup>[3] 5</sup>。另一方面, 美西方的叙事模因包含虚假信息、具备情绪感染力, 是当下认知战中模糊受众认知、感染受众意识、影响受众判断的关键工具。

#### 1. 善用名词建构, 扭曲事件性质

名词建构是指媒体对已有概念做出新表述, 模糊人们对原有概念的理解, 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sup>[14] 96</sup>。这种转换叙述的策略一直是美西方建构话语体系的手段之一。在此次俄乌冲突中, 美西方便不断创造概念, 为其在国际舆论场上谴责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制裁俄罗斯创造“正当”条件。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美西方主流媒体便不断渲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威胁。在冲突正式爆发后, 美西方给俄罗斯贴上“入侵者”标签, 把俄罗斯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定义为“侵略战争”, 并将普京塑造为“独裁者”, 将俄乌之间具有复杂历史成因的矛盾冲突简化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垒, 影响国际社会对此次事件性质的认知。事实上, 近两年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操纵涉疆叙事, 同样使用了以上策略。在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新疆人民的自愿就业劳动被定义为所谓“强迫劳动”, 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被污称为所谓“集中营”, 有关新疆计划生育的条例被贴上所谓“强制绝育”的标签。美西方通过一系列名词概念构建, 抹黑中国的治疆成就, 妄图使中国背上“侵犯人权”的污名, 为美西方自身对中国新疆产业实施制裁行动赢得所谓“正当性”。

#### 2. 制造虚假信息, 模糊受众认知

21 世纪,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与普及为“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渠道。不少国家行为体通过制造与散布“虚假信息”来迷惑对手、影响对方信息决策。某些西方政客也将操纵“虚假信息”视为诽谤竞争对手、模糊受众认知、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国主流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唐纳德·特朗普、不利于希拉里·克林顿的虚假信息。相关研究证明这些虚假信息能影响党派媒体的议程设置，使 CNN、《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更多地报道了有关希拉里的阴谋论。此次选举之后，希拉里曾公开表示自己为假新闻的“受害者”，柯林斯词典则将“假新闻”（Fake News）确定为 2017 年的年度关键词。2019 年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美国更是出现了大量关于病毒来源、口罩和疫苗有效性的虚假信息，假新闻以及有关大流行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这些言论不仅极大误导了美国民众，还导致了部分群体对亚裔的欺凌和仇恨。

### 3. 利用情感叙事，引起情绪爆发

战略叙事的另一大特点是利用带有鲜明情感色彩的叙事文本，引起大众情绪爆发，从而促成某些极端反应。这类叙事文本往往能引起受众强烈的情绪反应，在“情绪先行、理性滞后”的后真相时代，受众更容易受到此类信息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内容的传播速度、情感强度以及回音室效应，使得某些情绪像“病毒”一样感染大众，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诱发社会运动或问题。俄乌冲突中，情绪叙事成为干扰受众意识、引发受众同情以及反战情绪的关键手段。有关儿童和年轻女孩的照片、视频，经常被用来引发受众的情绪反应。此类信息传播时常配有情绪性的标点符号和表情包。例如，一张受伤的儿童图片和一段乌克兰士兵上前线与妻子道别的视频，在推特平台上得到了大规模转发和评论，大量配文都附有“heartbreaking”（心碎）以及痛哭的表情符号。尽管事后证明这些图片视频都不是拍摄于当下，但仍有许多网民对乌克兰表示深切同情，并谴责俄罗斯，认为普京应该尽早停止战争。在现代的认知战中，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战略层面，情感叙事的影响力都在逐渐提升。

## （二）多元参与，形成复调传播

智能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复杂态势，对于许多个体用户来说，信息并不是通过一个媒介传播出来，而是以多种形式、多种传播渠道围绕在他们周围，渗透到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数字生活中。一方面，官方政府、智库机构、新闻媒体多管齐下，以自身话语参与议题建构，在国际舆论场上相互交织、互相放大。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人类传播范式发生变革，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发声途径。个体自身也成为战争叙事主体的一部分，在与社交网络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形成观点的新一轮传播。

### 1. 官方、媒体、智库三者协同发力

认知战中，议题的生产与推送往往由多个主体协同参与，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智库和媒体之间形成复调传播闭环，以不同的渠道和形式对特定的价值观念进行洗脑式的反复申说<sup>[3] 5</sup>。2016 年的“南海仲裁案”闹剧正是美西方国家政府、主流媒体以及智库合力对中国发起的一场舆论攻势。在此期间，美国奥巴马政府、英国首相卡梅伦、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等纷纷表态，胁迫中国接受仲裁；而美西方媒体《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悉尼先驱导报》等异口同声宣扬仲裁“合法和有效”。在这场美西方针对中国南海所开展的来势汹汹的舆论战中，美国智库扮演了关键角色。2015 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独家发布了南海上空的侦察卫星拍摄到的南海诸岛施工图，而就是这些卫星图成为所谓“中国军事扩张”的重要证据。在其发布后，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转载，将中国逼向国际舆论场的墙角<sup>[14] 5-14</sup>。无论是“南海仲裁案”闹剧，还是近几年掀起的所谓“武

汉病毒起源论”“新疆集中营”“中国债务陷阱”等谎言, 美西方国家政府、智库、媒体协同发力, 在交相互映中形成话语联动, 完成一整套针对中国的战略叙事建构, 企图让中国进入美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

## 2. 个体参与传播, 创造“个人叙事”

当代认知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体用户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叙事建构和信息传播。社交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得个体既是信息内容的接收者, 也是内容的主要生产者。作为互联网终端, 个体不仅是各类叙事内容、战略信息到达的终点, 同时也是相关内容、类似信息再传递的起点。在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网民碎片式的“个人叙事”为乌克兰塑造的“宏观叙事”增添了新维度。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有关战争社会叙事的互动空间, 这种互动在介于主流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的广阔社会领域中发生<sup>[15]</sup>, 个体创造的叙事在其社交网络中发挥作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标签工具则进一步增强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互动, 在这一方面最为显著的就是推特平台上的“Hashtag”功能。通过添加标签, 不仅能让个体生产的叙事内容增加曝光量, 也便于个体迅速找到相关话题的内容讨论, 起到“观点聚合”的作用。同质化声音的汇聚形成“回音室效应”, 使个体认知和观点在不断窄化的信息圈中得到加强。

### (三) 技术驱动, 增强认知塑造

如果说多元主体为战略叙事创造多条传播路径、实现多声部复调传播, 那么与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的社交媒体平台, 则使得个性化呈现和大规模传播得以可能。技术加持下的社交媒体, 成为现代认知战中强有力的传播工具。机器学习和算法技术不仅能对个体实施精准化传播, 还能通过自动创建的社交账户在特定人群中开展大规模信息操纵、普及叙事。当下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生成的信息内容, 能够操纵图像和声音, 创建更先进、更令人信服的虚假信息, 使公众几乎观察不到任何造假的痕迹。

#### 1. 运用智能算法实现精准化传播

美国传播学者哈特曾将人类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分为三类: 第一类示现的媒介系统、第二类再现的媒介系统和第三类机器媒介系统。在前两类媒介系统中, 信息接收者无需使用物质工具和机器便能获得信息。在最后一类机器媒介系统中, 接收一方必须使用机器才能获得信息。如今, 人们为获取信息而广为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 正属于第三类。这意味着信息在抵达接收者之前, 必然经过“平台”这个中介。然而, 当前以算法技术作为底层逻辑的社交媒体平台, 会根据个体用户留下的“数字痕迹”, 如点赞、评论、分享、浏览等, 对个体用户进行分析, 综合他们的政治信仰、所属的社会群体以及当前平台优先考虑的议程, 对数据库中的信息内容进行优先排序, 最终向用户实施精准化的个性传播<sup>[16]</sup>。

正如剑桥分析公司(CA)丑闻所示的那样, 该公司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 利用数百万 Facebook 用户的个人数据, 通过机器学习了解用户偏好、性格特征, 并针对其中立场摇摆的选民, 通过带有某种偏向的视频、广告和博文进行信息轰炸, 对其进行个性化的政治宣传, 直到他们选择剑桥分析公司想让他们选择的特朗普。例如, 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的核心承诺是捍卫美国人的持枪权, 剑桥分析公司便针对不同用户推送不同广告: 对冒险型用户, 通过脸书平台向他们推送以暴制暴型广告, 告诉他们枪能消除外部威胁、捍卫自由; 对保护者型性格用户, 广告是“枪是保护他人不可或缺的

工具”；对理性思考、运筹帷幄型性格用户，广告是“枪能保护家人和美好未来的信息”。此类定向推送的广告暗合受众心理，能在潜移默化中操纵受众的大脑<sup>[17]</sup>。

### 2. 利用社交机器人达成高强度传播

在实施精准化、个性化传播之余，开展高强度、高密度传播是当下技术赋能的另一大特点。在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中，不仅有政府、媒体、智库、民间等传播主体，还有数以百万的社交机器人。2017 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Twitter 中高达 15% 的活跃用户是社交机器人<sup>[18]</sup>。社交机器人通过传播大量虚假信息、营造舆论氛围，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塑造大众认知。例如，有学者对《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新疆的系列报道在推特上的一级传播和二级传播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分析机器人传播频率、影响力以及转发关系的基础上，发现大量社交机器人在初级和次级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初级传播中，社交机器人生产了高达 22.5% 的相关内容；次级传播中贡献了 13.6% 的信息内容。而且在次级传播中，它们更倾向于转发负面叙事，为在新疆议题上操纵舆论、塑造大众认知提供强有力支撑<sup>[19]</sup>。随着智能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信息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规模将呈指数级增长，使公众淹没于海量具有引导和认知建构作用的信息之中，塑造、改变个人和群体的信仰以及行为，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规范和价值观。

### 3. 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完成虚假信息传播

深度伪造已被广泛运用于虚假信息的制造中，当下的舆论生态愈加复杂多变。随着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成熟的技术被用于虚假信息的制作，其中“深度伪造”成为当前应用较频繁的技术之一。深度伪造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算法来合成逼真的伪造内容的技术。它可以创建虚假的图像、视频、音频和文本，令人难辨真伪。有学者指出，由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信息内容正在通过散布虚假宣传、干预选举等方式威胁国家安全、阻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俄乌冲突中，在推特上被广为分享的视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频中宣布已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对俄罗斯投降”，正是当下智能认知战中运用深度伪造来生产虚假内容的典型案例。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模拟重要人物的声音、表情、动作等逐渐成为常见操作。有关主体通过制造此类虚假信息，实现大规模的舆论攻击、心理攻击，动摇对方的军心和士气，从而达到在对方内部制造混乱的目的。202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室(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和社交平台分析公司 Graphika 联合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在美国针对阿富汗开展的叙事中，同样利用了人工智能技术造假人物头像、散播虚假信息。

## 三、美西方认知战升级之下的中国应对

俄乌冲突使美西方的认知作战活动在近几年达到高潮，而伴随着国际动荡变革加剧、地缘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未来认知战并不会随着冲突结束而就此终止。认知领域的斗争将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现实表明，美西方国家已多次在虚拟空间对中国发起攻势，利用其战略叙事手段、多元传播主体和人工智能技术，妄图在国际舆论场上抹黑中国，操纵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认知。我国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认知战制定应对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叙事、主体、技术和制度四个层面建立认知战响应体系。



### **(一) 叙事层面: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增强叙事自主性**

当前, 面临美西方国家在构建国际话语与叙事体系中的先发优势, 中国必须加强自身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述好中国故事, 阐明好中国方案, 展现出中国故事及中国方案背后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今年, 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讲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故事已成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传达中国天下观和义利观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 诸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等概念, 也在不断融入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中。未来, 我们应从中国丰富的实践成果中总结出更多经验和理论, 凝结成具有中国特色、蕴藏中国智慧的概念术语。通过创新表达方式, 为国际舆论场注入新话语, 为国际受众提供新的认知框架和概念阐释体系, 打破长久以来西方塑造的“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框架, 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新视角。

### **(二) 主体层面: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加强社会协同能力**

国内多元主体要加强合作交流, 共同构建认知领域内的协同作战机制, 合力应对当前人工智能时代下的认知作战。一方面, 充分发挥智库顶层设计作用, 集中智库力量对美西方国家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开展研究, 为我国主流媒体提供议题内容, 以此主动设置议程、揭批美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顽疾。另一方面, 加强政府、媒体、智库以及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 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在面临重大国际议题时, 通过协同出力、共同发声, 利用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的组合传播, 奋力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 提升我国话语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 充分调动大众网民参与叙事。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普及的时代, 大众网民不仅是各类信息、叙事内容的接收者、影响者, 同时也是个人叙事、信息内容的活跃生产者, 因此要走网上群众路线, 发挥个体在认知作战中的作用。

### **(三) 技术层面: 加快智能技术研发, 增强认知作战优势**

当前, 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认知战发挥巨大“威力”的核心驱动力, 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伪造等新兴技术必将甚至已经成为现代战争制胜的关键优势。对此, 我国需正视智能技术已经带来战争形式和大国博弈范式变革的客观现实<sup>[20]</sup>, 从加强智能技术研发与建立相应监测和防御系统两方面入手, 增强在未来认知领域的作战优势, 提升认知域的进攻和防御能力。

在技术研发层面, 我国应把发展人工智能等相关新兴技术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加紧出台规划和政策, 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在监管防御层面, 我国应警惕当前智能技术在认知战中的广泛应用, 对相关认知活动的开展和技术识别建立起一套监测和安全警报系统。2021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联合在《北约评论》(Nato Review)发表的《对抗认知战: 意识与抵抗》(Countering Cognitive Warfare: Awareness and Resilience)一文中提到, 为了应对认知战, 北约应建立一套认知战监测和警报系统。该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和模式识别算法, 从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等收集信息, 快速识别和分类各种新兴活动, 实时监控可疑的认知战苗头, 追踪其发展趋势, 并向北约提供及时警报, 帮助其在认知活动出现时迅速制定措施。我国也可利用相关算法技术, 通过大量模拟训练对社交网络中的各类信息进行监测识别, 对可能的认知活动采取适当反应和相关反制, 提高我国的话语博弈能力。



#### （四）制度层面：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共建全球性治理框架

随着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普及和发展，认知领域的作战范围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边界，其影响正在向全球蔓延。对此，一个国家要想有效地打击认知战，不仅要加强国内相关战略部署和技术部署，同时还要考虑多边合作努力，通过经验共享和交流对话，明确界定认知战及开展认知战的相应规范和标准，并合法化开展针对认知战的相应行动。

当前《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战争的内容，如第 2 条第 4 款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第 51 条允许“在对联合国会员国发动武装袭击时进行自卫”，主要是以动态战争（lethal-kinetics）的形式而制定的。诸如“使用武力”和“武装袭击”已经不适用于当下认知战这样的非动态战争。因此，必须制定出一套新的制度和规范来防范认知战。在这一方面，北约 2020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认知战：对真理和思想的攻击》（Cognitive Warfare: An Attack on Truth and Thought）中提到，参考“施密特框架”，即从“严重性（Severtiy）”“即时性（Immediacy）”“直接性（Directness）”“侵略性（Invasiveness）”“可衡量性（Measurability）”“推定合法性（Presumptive legitimacy）”“责任性（Responsibility）”<sup>[21]</sup> 七个方面来区分一般意义的网络活动和认知战争。“施密特框架”为制定认知战争行为的法律定义和衡量标准提供了一定参考。

鉴于技术加持下的认知战具有颠覆性力量和操作的隐匿性，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致力于建构未来认知领域作战的共同防范和治理框架，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1] 陈东恒. 人工智能：认知战的制胜刀锋 [N]. 解放军报, 2021-11-04 (7).
- [2] 方兴东, 钟祥铭. 算法认知战：俄乌冲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 [J]. 传媒观察, 2022 (4): 5-15.
- [3] 史安斌. “图文信息战”正向“算法认知战”迭代 [J]. 经济导刊, 2022 (3): 5.
- [4] 门洪华, 徐博雅. 美国认知域战略布局与大国博弈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6): 1-11+61.
- [5] 孙鹏, 黄格林. 西方对认知战的研究历程及其特征述评：2008—2021 [J]. 思想理论战线, 2022 (6): 115-124.
- [6] MWI Staff. MWI VIDEO: The brain is the battlefield of the future [EB/OL]. (2018-10-29) [2023-06-24]. <https://mwi.usma.edu/mwi-video-brain-battlefield-future-dr-james-giordano/>.
- [7]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55-292.
- [8] 达雅·基山·屠苏. 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 [M]. 第 3 版. 胡春阳, 姚朵仪,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21.
- [9] Francois du Cluzel. Cognitive Warfare [EB/OL]. (2020-11) [2023-06-24].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20210122\\_CW%20Final.pdf](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1/20210122_CW%20Final.pdf).
- [10] Alonso Bernal, Cameron Carter, Ishpreet Singh, and Kathy Cao. Cognitive Warfare: An Attack on Truth and Thought [EB/OL]. [2023-06-24].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3/Cognitive%20Warfare.pdf>.
- [11] Innovation Hub. Warfighting 2040 Project Report [R/OL]. (2020-03) [2023-06-24]. <https://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Warfighting%202040%20Project%20Report.pdf>.

罗昕, 张骁. 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认知战的运作机制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24-133.

[//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WF2040Report.pdf](http://www.innovationhub-act.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WF2040Report.pdf).

- [12] Daniel S. Hall. America Must Engage in the Fight for Strategic Cognitive Terrain [J]. Joint Force Quarterly, 2023 (108): 75-86.
- [13] 117th United States Congress. James M. Inhof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3 [EB/OL]. (2022-12-23) [2023-06-24]. <https://www.congress.gov/117/plaws/publ263/PLAW-117publ263.pdf>.
- [14] 王冠. 让世界听懂中国 [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1: 5-14+96.
- [15] 蔡润芳, 刘雨娴. 从“推特革命”到“WarTok”——社交媒体如何重塑现代战争 [J]. 探索与争鸣, 2022 (11): 68-78+178.
- [16] Bakir, Vian, Andrew McStay. Fake news and the economy of emotions: Problems, causes, solution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 (2): 154-175.
- [17] 孙宝云, 李艳, 齐巍. 网络安全影响政治安全的微观分析——以“剑桥分析”事件为例 [J]. 保密科学技术, 2020 (4): 27-34.
- [18] Varol, Onur, Emilio Ferrara, Clayton Davis, Filippo Menczer, and Alessandro Flammini. Online human-bot interactions: Detection, estim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2017 (1): 280-289.
- [19] Han, Na, Hebo Huang, Jianjun Wang, Bin Shi, and Li Ren. Information Diffusion Model of Social Bots: An Analysis of the Spread of Coverage of China Issues by The New York Times on Twitter [J]. Complexity, 2022: 1-9.
- [20] 方兴东. 全球社会信息传播变革趋势研判——从智能传播时代的算法认知战谈起 [J]. 人民论坛, 2022 (15): 96-99.
- [21] Foltz, Andrew C. Stuxnet, Schmitt Analysis, and the Cyber Use of Force Debate [R/OL]. (2012-02-15) [2023-06-24]. <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1018135.pdf>.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ChatGPT：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转向及后果

曹克亮

（中国计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ChatGPT 与人类的对话式交往流畅而又极具“人性”并深得“人心”。ChatGPT 作为大语言预训练模型和人类反馈学习的最新智能机器，正在改变人机交互的方式和知识生产模式。ChatGPT 超越了苏格拉底知识“助产术”的主体限制，来到了机器的知识“助产术”阶段。ChatGPT 以自身机器语言模型和算法模型扮演了“机器意识形态家”角色，完成了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机器学转向。ChatGPT 实现了意识形态智能生成与分发的个性化、适配化和整体化，提升了意识形态智能塑造中的人机交互关系的感知性、切身性和可信性，智能化融合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配置和智能行为仪式双重能力。ChatGPT 是融合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重机器”，它实现了意识形态产销的一体化、隐秘化和加速化。ChatGPT 作为“机器意识形态家”的后果是引发数字意识形态进一步智能化、具身化和霸权化，造成了虚假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的加速主义运动，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型出平台型意识形态的机器学形式。

**关键词：**ChatGPT；人工智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家；阿尔都塞

**中图分类号：**D64；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134-11

---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4.013

**作者简介：**曹克亮，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22JDSZ3004）；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理念、方法、路径研究”（22GXSZ019YB）

**引用格式：**曹克亮. ChatGPT：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转向及后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34-144.

ChatGPT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机器, 奠基于大型语言模型和机器深度学习基础之上。ChatGPT 以人工标注数据的方式进行语言逻辑和知识系统的升级, 以便大语言模型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 更加精准和顺畅地理解人类的语言、逻辑、思想。这是 ChatGPT 展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一面的关键, 其中涉及 ChatGPT 大语言预训练模型重要的方法, 即“人工标注”。对于一个如此智能和强大的对话机器, 为什么还要进行人工标注, 通过人类反馈并对其打分赋值呢? 答案很简单: 人类给其“投喂”的不仅仅是数据知识, 更是经过人类评价后的“好知识”和“好观念”。这些彰显“好”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评价、道德评判不是机器能够完成的, 因此机器不能代劳也不可以代劳。如此一来, ChatGPT 所生成的不仅仅是文本内容、综合知识 (如果算作知识的话), 还包含人类的意识形态。

ChatGPT 在很多涉及性别、种族、人工智能主体性等问题时, 会被训练为“价值中立者”或“价值无涉者”。这样一来, ChatGPT 就变成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意识形态机器” (IM, Ideological machine)。ChatGPT 与其他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体系一起, 实现了由智能系统组成的虚拟意识形态机器“国家”系统。这个“国家”系统显然不是真正的现实国家, 也不是社会。它奠基于是社会, 却区别并高于社会。它是由智能系统组网、大数据支撑、算法提供动能、人类参与指导并建构的虚拟“国度”。ChatGPT 作为意识形态机器, 在回答人类各种奇怪甚至荒唐问题时, 一直在“表达”的正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我是” (IM, I am) 问题或“我想” (IT, I think) 问题。当一个智能机器在“表达”“我是”或“我想”时, 不管其所“言”是真或假、善或恶、美或丑, 它都在不时地与人类交换着意识形态观念。一种更切近、具身、个体化维度的意识形态塑造机器, 对于知识形塑机制、政治认同表达、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都提出了更高挑战。

## 一、ChatGPT: “机器意识形态家”的知识生成与观念塑造运行机制

ChatGPT 正在以新的语言发生机制、人机交互方式、智能劳动范式构型着人类的知识观念系统。ChatGPT 对知识生成与观念塑造的革命性影响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助产术”思想有着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进而导致 ChatGPT 不仅仅是知识生成者、观念塑造者, 还是“机器意识形态家”。它实现了对马克思所述“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转向。

### (一) ChatGPT 与知识“助产术”

ChatGPT 作为人工智能对话者与人产生知识交互的过程, 似乎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助产术”思想不谋而合。“苏格拉底把自己的方法比作他母亲从事的‘助产术’, 两者有这样一些可比之处: 苏格拉底在对话时并不宣布问题的正确答案, 正如助产士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 她自己并不生育; 对话者对自己既有成见的否定好比是临产前的阵痛, 这是每一个获得真理的人必经的途径; 对话的结果是对话者在自己内心中发现真理, 正如产妇从自己体内产生新的生命。”<sup>[1]</sup>只不过, ChatGPT 这个对话者从“人”变为了“机器人”,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从灵魂和大脑出发, 而 ChatGPT 将其转变为从算法和数据库出发。意识形态塑造的“既有成见”变革问题转变为既有机器的数据知识和既有个体知识的阵痛调整。知识“助产术”思想实际上是对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的遵循和延深。知识“助产术”的深层意义在于知识生产的逻辑是一个“解蔽”过程, 这种“解蔽”是通过对话和

反诘的方式获取被偏见和谬误所蒙蔽的真理与知识，进而达成对知识发现及自我意识与观念的修正。因此，“认识你自己”不仅是知识生成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塑造的过程。

ChatGPT 作为智能对话者，在以机器语言解读和理解人类自然语言过程中生成新的知识。这种知识发现和观念改造不仅是对人类既有知识观念的简单复制和临摹，也在用机器语言自身的机制（二进制）来重塑知识生成模式和知识进化机制本身，并在这种知识交互过程中持续化、具身化地塑造人的自我意识形态。有观点认为，ChatGPT 是一个高级剽窃者，这是在坚持传统知识论（或者说原创知识论）意义上谈论何谓真正知识以及价值的问题。但是，对于一般知识生产论而言，人类的所有知识可能都是“剽窃”，“剽窃”的对象就是既有人类群体和既有知识范畴。如此一来，“正是 ChatGPT 坚持不懈的学习能力，使其拥有可能超越人的能力，尽可能多地学习人类积累的知识，从而在当下这个时代产生新的‘知识大爆炸’。知识的生产模式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前人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重构，而不可能空穴来风”<sup>[2]</sup>。这说明人类知识的生成机制本来就是一个对前知识的综合过程。如果将 ChatGPT 归入一般性知识进化的群体之中，它归纳、总结、重新整合而成的知识就先天带有机器语言和机器的“意识形态”。由此，ChatGPT 就是一个“机器意识形态家”。

## （二）ChatGPT 与“意识形态家”

马克思曾多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意识形态家”<sup>①</sup>这个词。“意识形态家”（Ideologe），一直都具有“思想家”和“玄学家”的双重意涵。马克思在批判中使用“震撼世界的”词句、“最大的保守派”以及“编造幻想”和“使一切本末倒置”来形容“意识形态家”。马克思批判的是从施特劳斯到黑格尔“绝对精神体系”瓦解（精神残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人类是先通过“劳动”再生产，创新与更替人类知识和智能，而 ChatGPT 则是先拥有数据知识（一种知识展现和标注的文本、图像、视频等模式）再发展为类人的“劳动”和“智能”。二者的根本区别是人类通过劳动创生知识，形成观念、思想、意识形态等智能表现，而 ChatGPT 是通过知识进行劳动、创生智能（非人智能），展现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前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具有属人性质的“意识形态家”，后者是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上再“机器化”和“机器话”的“意识形态机器”。笔者将其称为“机器意识形态家”，有学者将其称为“意识形态世界机器”。ChatGPT“所具有的空前的网络话语生成霸权，使其不仅成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成为有着全球影响的‘意识形态世界机器’，从而发挥出无所不在的对人的询唤的功能”<sup>[2] 46</sup>。

ChatGPT 作为“机器意识形态家”是显而易见且亟须重视与破解的话题。ChatGPT 在更深层面上不仅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国家教育或学校系统，甚至可能作为“世界导师”（World Tutor）和“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出现。ChatGPT 不仅是单一的智能体对话者，它在与每个人的交互中，生成了一个属于每个人的知识元宇宙世界。有学者对类似的元宇宙、元知识和元意识问题深表焦虑并呈现出悲观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元宇宙逻辑下虚拟空间与拟态仿真成为可能，人的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012年版，第141页。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哲学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把鼓吹这种哲学的人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

主体性沦为了意识形态唤问中非经验的绝对之思、非实在的指称代词和非自我的他性认同；实践活动堕化为了意识形态的技术欺骗、虚拟生产的异化模式和知识劳工的生产之源；自由成为了虚实重叠的空白假象、自在自为的意识悖论和国家机器新形态的规范自觉。”<sup>[3]</sup>这种悲观情绪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技术决定论”悲观成分。事实上，不论是国家还是技术（或技术人工物）都是意识形态塑造的“主体”，而且久已有之，类似元宇宙、ChatGPT只不过是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进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的训唤、规制都是将人的主体性由特殊具体性转换为一般具体性。他说：“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sup>[4]</sup>从具体的个人到具体的主体“传唤”过程，不仅是人的作用过程，也是机器的作用过程；不仅对人的个体“具体性”进行传唤，也在塑造和形成意识形态社会所需的主体“具体性”。ChatGPT作为“机器意识形态家”的可怕之处不是机器具有意识形态偏见或技术性的算法偏见问题，而是人类对于“技术合理性”“技术至上主义”及其生态的意识形态抵抗力、免疫力的下降和不自知。一切人工智能机器都是人类自身通过知识和技术所创造的物，然而，技术物所展现的一切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或问题不过是人类既有意识形态偏见，也是人类太依赖和信任技术物本身所导致。不得不说，人类在日益普遍的人工智能生态中对“技术合理性”和“技术至上主义”的免疫机制退化了。这种退化是达尔文自然生态主义在技术生态系统中的具体体现。那些撇开技术物及其系统客观实在性、建议高扬人类主体性旗帜和主体精神来恢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事实上已经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家”的玄思和玄学之中。

## 二、ChatGPT作为“机器意识形态家”的运行特点

ChatGPT以技术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实现了意识形态塑造的智能合理化与合法化。它所具有的“机器意识形态家”的特点是：实现了意识形态智能生成与分发的个性化、适配化和整体化，提升了意识形态智能塑造中的人机交互关系的感知性、切身性和可信性，智能地融合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配置和智能行为仪式双重能力。这些新的特点都让意识形态治理面临诸多困境。

**第一，ChatGPT实现了意识形态智能生成与分发的个性化、适配化和整体化。**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观念集合，它是从人的社会属性中积累并升华的观念、思想、价值观等集合体。自特拉西开始，意识形态就是“观念学派”一直探讨的核心问题。观念冲突的调和、驯化、塑造就是意识形态教育与治理。在传统意识形态生成和分发领域中，依赖的主导性力量就是教育，并且这种传统意识形态教育是以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并行的逻辑模式展开的。它承载着知识教育、观念塑造、政治认同等多重使命。然而，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塑造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从传统教育走向了智能教育、从学校教育走向了社会教育、从集体教育转向了个性化教育。

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信息数据系统、用户分析系统、信息分发系统实现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完美过渡和接管。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它极具个性化和适配性。“从技术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智能算法推荐的一般技术逻辑其实就是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复杂组合而动态建构起信息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的个性化适配关系。”<sup>[5]</sup>个性化的信息生产机制、个性化的算法精准推荐不断形成了对个体



的柔性引导和变相控制。这是一种具身个体化、具象个性化以及具体个别化的适配整体化机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整体维度进行。智能技术和媒介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和功能的技术性迁移，将教育过程变得智能多样和极具个体性，进而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技术性权力接管与掌控。当数字媒介和智能网络渗透于各种社会观念、价值秩序、思想结构的机体之中时，传统教育的意识形态权威性就会被搁置或取代，意识形态的形塑权就让渡给了智能算法系统，并且发展出了意识形态技术决策和技术治理的绝对科学化假象。

另外，智能系统生态作为一个日益整体化的趋势，已经组成了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塑造格局。“一旦我们采用智能关联主义的新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审视人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人工智能并不是一种客观主义的产品，更不是一种价值中立、与人类行为无关的物，而是一种与人类的交互行为处于纠缠关系之中的共生整体。”<sup>[6]</sup>在强化个体化、适配化的过程中，各类人工智能媒介、平台、系统“以‘生活方式的智能化’、‘集体认知的合理化’达成‘现存秩序的合法化’”<sup>[7]</sup>的过程就会不断走向深入。生活方式、认知实际或基本秩序都在智能普遍化、意识统合整体化的过程中进行。ChatGPT 及其智能系统所需数据、内含算法和所用算力一起构成了意识形态内容生成与分发的整体性机制。在算法权力泛在化、商业逻辑扩张化、数字资本集中化的趋势下，人的意识形态塑造日益变得个性化、适配化和整体化。

**第二，ChatGPT 提升了意识形态智能塑造中的人机交互关系的感知性、切身性和可信性。**ChatGPT 将人机共在和人机共生的交互关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已经成为人类的智能导师并改造着我们的教育学习模式和观念进化方式。“它可以像人类一样高效地完成智力任务，通过人机高效协同，颠覆所有智力行业的内容生产模式，实现高效、高质、海量、实时、多样性、个性化的内容生成，对于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传统行业的改造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sup>[8]</sup>基于此，ChatGPT 作为智能知识导师角色的智能劝导术已经实现了感知性、切身性、可信性的全方位升级，成为智能劝导术的存在论事件。劝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是由福格（B. J. Fogg）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概念，后发展成为“计算机劝导术”（Captology）。“福格在 2003 年出版的《劝导式技术：运用计算机来改变我们的所思所做》一书中进一步编撰了‘计算机劝导学（Captology）’术语来描述和泛指传统的劝导设计和基于计算机的技术相互重叠而产生的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sup>[9]</sup>ChatGPT 的智能劝导术通过对人类语境的大数据纳入、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的嵌入，达到了对人类自然语言理解能力的革命性跃升。“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用户所受到的影响不只是来自所推送的信息内容，还取决于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对隐形设置的无意识接受。”<sup>[10]</sup>

这种基于语境的人机交互模式显著提高了作为机器理解的语言逻辑的基本层面、人类强化学习层面和使用进化层面。特别是在应用层面，“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使用，就可以通过用户对话互动不断优化语境。大型语言模型采用的模型具有人机深度交互性质，使用作为训练方式的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在人机互问互答中不断迭代，使模型不仅能生成可以不断更新的答案，而且逐渐获得对其所生成答案的评判能力，从而不仅在持续的反馈循环中不断优化答案，而且生成和发展人机融合的语境，使对话具有语境层次越来越高从而越来越强的整体关联”<sup>[11]</sup>。如此一来，ChatGPT 以强大的计算和数据理性辅之以人类强化学习反馈理性，推动了人机交互关系的感知性和切身性的提高。在各种类型的具体应用场景中，ChatGPT 有望成为智能时代新的更加强大的智能操作系统的接口。“第

一种形式是将 ChatGPT 嵌入到特定应用中, 从而极大地提升自然交互体验, 如微软的 365 Copilot 和 Copilot X 分别将 ChatGPT 融入 Office 和 Github。第二种形式是在 ChatGPT 搭建的自然语言交互框架上开发各类信息服务应用……人机交互界面将从磁带、键盘字符、鼠标图形全面进化到自然语言时代。”<sup>[12]</sup>

人工智能塑造人类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可信性将进一步增强, “当用户感知到算法更公平、更负责、更透明、更可解释时, 他们认为算法更可信、更有用”<sup>[13]</sup>。就人工智能的信任问题来说, 可以分为理性信任、情感信任、规范性信任, “ChatGPT 对于个体需求的积极回应达到了更为全面的状态, 为理解深度智能化时代的信任机制提供了视角”<sup>[14]</sup>。ChatGPT 能够提升人机交互关系的感知性、切身性和可信性, 更接近成为一个具有强大自我意识的“政治机器人”。由此, ChatGPT 及其后续的其他强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干预政治事件的走向、推动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sup>[15]</sup>, 将变得更加普遍而切近。极端政治操作和意识形态操纵将变得智能而无形。ChatGPT 作为“机器意识形态家”的危害显而易见, 除去传统的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对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 还有作为语料库和数据库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 产生诸如英语世界与非英语世界的意识形态机器对抗等新的意识形态难题。

**第三, ChatGPT 智能化融合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配置和智能行为仪式双重能力。**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运行的两个核心论点, 即“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sup>[16]</sup>。前一个论点意在揭示意识形态作为想象性置换是在表述人们的生存条件和实在世界。后一个论点则意在表明观念之“物”是以实在之“物质”(机器)为基础。因此, 阿尔都塞鲜明指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当中, 存在于这种机器的某种实践或多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物就是物质的存在”<sup>[16] 479</sup>。ChatGPT 让意识形态机器具体化为人工智能机器这一“实在物”, 将“某种实践”或“多种实践”具体化为智能对话的实践。这种转变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巨大变革和革命性过程。在阿尔都塞所列举的信仰上帝、职责、正义这三种意识形态的表述中, 都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智能行为意识。比如, 信仰职责的仪式化实践就是规矩式地采取行动, 上班、上学、开会、体育运动等, 信仰正义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法律法规、参与政治集会等。这种“仪式化”的物质实践活动, 在 ChatGPT 的智能实践中都获得了提升或转变。

ChatGPT 让信仰问题转变为对机器和智能信仰问题, 它融合了信仰的上述领域于一身, 并智能化地升级了这种信仰的“物质存在”配置, 成功地将上帝信仰变为智能信仰、职责信仰变为依赖信仰(人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正义信仰变为数据信仰。这种对智能信仰的“物质存在”配置的升级使得帕斯卡尔的那句“跪下, 开口祈祷, 你就会信”, 变成智能行动和仪式——“点击, 开口说话, 你就会信”。在仪式性的智能行动中, 阿尔都塞式的“唤问”性主体自然获得了物质性机器的落实。在人与 ChatGPT 的“唤问”式对话中, 主体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生产、被塑造、被传播、被支配。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依赖的知识、观念等实现了智能生产上的“物质存在”配置升级。意识形态塑造实现了智能加速主义的提升, 将“人天生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的“物质存在”和仪式性实践活动变得日益智能化和生活化。

这种认识获得了众多人的承认。比如, 比尔·盖茨认为 ChatGPT 的出现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强调 ChatGPT 技术的诞生不亚于互联网或个人电脑的诞生; 而马斯克则表示“我们离强大到

危险的人工智能不远了”<sup>[17]</sup>。“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马斯克和上千名人工智能专家、政商界人士所发出的“暂停更强大的 ChatGPT 训练”的呼吁，表明人工智能发展到对人类构成威胁“并非不可想象”。意识形态所需的知识和观念来源到了“数据吞咽”与输出的规模、程度和修正的自动化、智能化阶段。在 ChatGPT 更多融入人类再生产的诸多实践领域之后，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的智能化配置将变得更加普遍化，智能行为仪式的程度将会更高。人类实践从海德格尔上手的“操劳”变为“动嘴”的活动，人类认知存在和形成自我意识的“操心”活动将变得愈加智能自如。然而，这种由 ChatGPT 所引发的“操心”活动和意识形态困境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化解和治理。

### 三、ChatGPT 作为“机器意识形态家”的后果

ChatGPT 作为深度对话机器所需的语料库和知识数据库，已经通过开放和开源的方式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担心也日益增多。纽约大学认知科学名誉教授盖理·马库斯对以深度学习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方法持怀疑态度，“通过将制造虚假信息的成本降低到几乎为零，ChatGPT 这样的系统可能会引发一波虚假信息的浪潮，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结构构成了真实而迫在眉睫的威胁”<sup>[18]</sup>。马斯克联合上千名科学家发起了对 ChatGPT 暂停的呼吁，在版权界、教育界、知识界、语言界都引发了作者身份、教育机制、知识生成方法变革和语言机制与独特性的热烈讨论。ChatGPT 正在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存在论事件”，正在引发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安全、版权安全、数据安全等多领域的风险。有学者担心“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将可能冲击全球安全互动中的‘主体责任制’，造成安全主体的模糊化与责任缺失、安全客体责任的离散化与安全责任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sup>[19]</sup>。其中，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将可能引发舆论操纵、价值观渗透、政治误导、干涉内政等问题。“技术霸权国针对他国公众的心理弱点，利用大型语言模型输出意识形态偏好，针对目标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制度破坏，干涉他国内政。”<sup>[20]</sup>

从政治传播视角来看，ChatGPT 引发“第五代政治传播”的革命性变革，即更加强化受众取向自由，政治传播的“宣传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等传统观念或将逐步消解或退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代表着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性升级。‘政治传播专家’在未来不再单纯指人，而是技术的非偏性、高效性特征加持之下的‘人机融合’之物。”<sup>[21]</sup>因此，ChatGPT 及类似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智能生态网络和“国家”概念，将政治安全、意识形态治理等问题引向“技术政治学”和“智能意识形态学”的深处。

**第一，ChatGPT 引发数字意识形态进一步智能化、具身化和霸权化。**ChatGPT 是由“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构成的智能对话聊天系统，并正在接入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应用领域。ChatGPT 的意识形态权力已经发展为自动信息知识权和自动数据整合权。传统意识形态权力塑造从阿尔都塞的“八大 AIE”<sup>[16] 454-455</sup>（AIE 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法文缩写，“八大 AIE”是指宗教、学校、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的 AIE）延伸至智能 AIE 机器层面。ChatGPT 通过自主机器语言和机器智能统合了既有知识和观念，并在与人的交互过程中交换由机器语言生成的知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观念。ChatGPT 适应了智能媒介社会“分布式社会”权力弥散、传播权力下沉、情感要素具身化

的需要。带给对话交互者更加具身的感受性，数字化的“圈地运动”不再仅仅围绕大众的虚拟空间商品生产展开争夺，更是在思想观念、情感情绪的具身交互感受性上展开竞技，并在一系列算法系统中构建出人机交互的智能“舒适圈”。ChatGPT的“算法技术借助被人类所信赖的数据信息进一步与人类的生活、工作融合、互通，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将算法推荐信息嵌入人类的选择偏好中，并通过迎合受众喜好来建构可以束缚受众思维的‘舒适圈’，对受众的社会共识、价值选择、认知建构产生影响”<sup>[22]</sup>。

智能算法“舒适圈”建构了观念和意识形态算法具身性，不论是何种智能算法机制（有限性算法或递归性算法）本质上都是建构人与机器交互的感知适应性和协调性，赢得用户的信任并产生依赖。这样一来，类似元宇宙的“地平线世界”“地平线之家”等概念就是一种在算法和数据主导下的典型的虚拟智能“舒适圈”。然而，这种个体的舒适圈却极有可能被个别意识形态霸权国家或机构所利用，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渗透或进行“颜色革命”的新武器。“一国可针对他国公众心理弱点来供给带有政治目的与本国意识形态偏好的内容产品，进而影响目标国公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间接把控政治走向，对目标国意识形态安全阵地进行隐形渗透。”<sup>[23]</sup>这种霸权化不仅是政府、机构或公司的，它也连带地造成了个体意识形态塑造的自我霸权化。主体不再将ChatGPT系统作为外在“物质存在”，而将其视为生活、工作的“观念器官”“知识器官”“记忆器官”的一部分，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唤问”形态转化为对智能系统的“自然而然”和自我承认形式。“意识形态的特性就是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作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而又不动声色，因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使得我们无法不承认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且在它们面前我们还免不了要产生一种自然的反应。”<sup>[16] 486</sup>ChatGPT正是通过“显而易见的事情”让个体自我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智能化、具身化和霸权化。

**第二，ChatGPT造成虚假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的加速主义运动。**ChatGPT的知识生成虽然综合了人类既有知识，并在人工标注的情况下减少了错误信息和虚假意识产生的可能性。但是，ChatGPT对于自己不曾掌握的知识有时显得过于“热情”，经常生成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与人类中的任何聊天者一样，ChatGPT作为对话者也会犯错误，存在对话风险。一是对话的真实性问题，它能否完全避免虚假信息 and 信息偏差，而不‘吹牛’；二是对话的准确性和专业性问题，它是否成了‘伪专家’；三是对话的‘格式化’问题，即无所不能地生成一些格式化的文本来‘搪塞人’。”<sup>[24]</sup>虚假意识形态不是机器的“专利”，更像是人的“杰作”。人类创造人工智能就是要一定程度上化解因错误偏见和意识形态隔阂所造成的生产效率、协作劳动等低下的问题。然而，ChatGPT作为秉持机器语言的“专家系统”，对于虚假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却具有加速主义倾向。这不是说ChatGPT生成了更多虚假意识形态和错误偏见，而是ChatGPT作为人类生产劳动的智能辅助工具，将可能的虚假意识形态进一步泛化和扩大化传播。这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扩大化“再生产”。

马克思曾指出：“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sup>[25]</sup>这里道出了意识形态生产和分配的关键机制，即“统治阶级”机制。当下的ChatGPT是融合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重机器”，它不仅改变物质的生产方式也改变精神的生产方式。它生产了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之上



的数字意识形态。它实现了意识形态产销的一体化、隐秘化和加速化。这可以被称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生产模式，即通过数字资本、数字平台、数字技术、数字劳动者全方位的系统化建构，主导物质生产也主导精神生产并融合成意识形态数字化生产全过程的模式。“数字资本通过建构以数字平台为纽带的数字劳动体系获得操控数字生活世界的强大意识形态力量。数字劳动是按照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资本逻辑而规划的，并衍变为具备强大的意识形态性并隐秘地控制着数字劳动者。”<sup>[26]</sup>

自《加速主义宣言》发布以来，“加速主义”一词颇受关注。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的加速主义是超越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宣言，将政治、生产、加速放在一个维度思考今日资本主义问题及其超越可能性。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以加速异化的人类社会生活为主线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无一例外，这些“加速主义的理性思辨首先便体现在对技术潜能的识别及其意识形态转化上”<sup>[27]</sup>。ChatGPT 作为生产加速的人工智能机器，将“效率至上主义”发挥到极致，连带着将虚假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最终就是要解决阿尔都塞意义上“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实现的总体过程的难题”<sup>[16] 498</sup>。ChatGPT 将可视的物质生产与不可视的意识形态生产统一于人工智能机器的加速之中。由于数据样本、数据延迟以及算法内嵌的偏见和不透明性等因素，ChatGPT 将意识形态偏见深藏于生产之中、隐匿于产销一体之中、消弭于自动体系之中，实现了个体自动化之下的意识形态生产维度和意识形态霸权国家（机构）整体自动化意识形态生产维度的合流。

**第三，ChatGPT 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型出平台型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笔下，意识形态由意识形态家所主导，通过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思想批判代替实际斗争的方式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福柯、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及迈克·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都在从权力视角、再生产视角、文化工业化视角、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视角，阐发意识形态构建所发生的系统性变化。如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为技术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平台型经济模式和在线虚拟工作和生活模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奠基的基础已经转向数字化的智能平台，意识形态的生产、消费、传播都内化于平台之上。ChatGPT 将更多接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智能平台系统，成为各类新平台接口的关键技术。ChatGPT 实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型出平台意识形态的新类型，进而实现马克思所形容的意识形态家“撼世界的”词句的机器学升级和阿尔都塞文化 AIE、传播 AIE 等方面的智能化升级。

ChatGPT 是算法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可能加速生产和剥削，也可能加速意识形态这一生产关系的智能化再造过程。“在算法资本主义时代，算法技术帮助数字资产阶级构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新型监视和管控空间，不仅形塑了权力政治的新形式——‘算法利维坦’，且重构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和输出的逻辑。”<sup>[28]</sup>阿斯特丽德·麦吉尔认为“技术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sup>[29]</sup>。这恰恰表明作为平台的技术公司意识形态、算法意识形态正在发展为资本主义新的意识形态且日益合流。她以搜索引擎为例揭示了这个过程。她以“生物燃料”以及“生物燃料辩论”为主题在谷歌进行搜索，除了基本的知识链接外，谷歌在最为显眼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商业链接，同时她的虚拟购物车里出现了“绿色汽车”图标。平台在用户的知识搜索过程中，移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虚拟消费理念到个人观念之中。正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往往具有商品美学意识形态，其欺骗、隐藏和重新编码了实际

曹克亮. ChatGPT: 意识形态家的机器学转向及后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34-144.

的血腥与汗水, 使其变成具有娱乐性、充满欲望、外观漂亮、吸引人的设计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sup>[30]</sup> 平台资本主义的建构过程和发展模式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式或商业模式, 而是一种发展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产关系再生产模式。“在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整个过程, 数据资本权力不但支配包括用户在内的整个平台生态系统, 而且对人的观念世界进行再建构。”<sup>[31]</sup> 这也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型为平台意识形态的秘密所在。

#### 四、结语

ChatGPT 不是一般的人工智能机器, 它是拥有自我语言(二进制语言)、能进行自我思考(算法模型)并产生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机器意识形态家”, 是拥有“机器之心”的“数字利维坦”。雷·库兹韦尔在《机器之心》的最后一章“2099年: 人类的定义被彻底颠覆”中指出: “这些基于机器的智能体完全由人类智能模型衍生而来, 虽然其大脑构造并非由碳基细胞演化而来, 而是电子和光子的‘对等物’, 但它们仍声称自己是人类。这些智能体大都未与具体的计算处理单元(即一种硬件)直接相连。使用软件进行计算的人数远多过使用自身神经元计算的人数。”<sup>[32]</sup> 这段想象的未来学话语恰恰暗示我们今后的人工智能可能是“有心无体”的智能体, 可能获得与人类同等的主体地位。未来人类的思维和观念进化模式主要是基于计算和算法的模式, 原来人类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属性已经不是人与机器的意识形态, 而是恐怖的(以目前人类意识形态观念观之)“有心无体”的智能体的意识形态。它代表了人类未来意识形态形塑的某种整体性格局。或许, 这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器学转向的最终可能。

#### 参考文献:

- [1]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2.
- [2] 张生. ChatGPT: 褶子、词典、逻辑与意识形态功能 [J]. 传媒观察, 2023 (3): 42-47.
- [3] 张彦, 杨思远. 元宇宙的意识形态规训批判——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分析进路 [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 (4): 90-99+159.
- [4]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 [G] // 陈越.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364.
- [5] 张林. 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J]. 探索, 2021 (1): 176-188.
- [6] 蓝江.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从 ChatGPT 智能革命谈起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4): 12-18.
- [7] 朱晓彤. 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发展进路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 (11): 86-92.
- [8] 焦建利. ChatGPT: 学校教育的朋友还是敌人?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3 (4): 5-15.
- [9] 成素梅. 劝导式技术的伦理审视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 61-69+174.
- [10] B. J. Fogg. Persuasive Technology: Using Computers to Change What We Think and Do [M]. ResearchGate, pp. 213-222.
- [11] 王天恩. ChatGPT 的特性、教育意义及其问题应对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 (4): 19-25.



- [12] 桑基韬, 于剑. 从 ChatGPT 看 AI 未来趋势和挑战 [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23 (6): 1191-1201.
- [13] Shin Donghee. User Perceptions of Algorithmic Decisions in the Personalized AI System: Perceptual Evaluation of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Explainability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0 (4): 1-25.
- [14] 喻国明, 滕文强, 郅慧. 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态系统演化的再认知——基于自组织涌现范式的分析 [J]. 新闻与写作, 2023 (4): 5-14.
- [15] 张梦, 虞崇胜. 智能时代政治机器人的初步应用、挑战及风险治理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 90-99.
- [16] 路易阿尔都塞. 论再生产 [M]. 吴子枫,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474, 478.
- [17] 令小雄, 王鼎民, 袁健. ChatGPT 爆火后关于科技伦理及学术伦理的冷思考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 123-136.
- [18] 赵安琪. ChatGPT 席卷全球 人工智能面临“伦理转向” [N]. 中国青年报, 2023-02-16 (9).
- [19] 高奇琦, 张莹文. 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 ChatGPT 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3 (3): 3-27+157.
- [20] 西桂权, 谭晓, 靳晓宏, 等. 挑战与应对: 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的多样态安全风险归因及协同治理研究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 1-9.
- [21] 苏颖, 汪燕妮.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走向——基于 ChatGPT 的讨论 [J]. 党政研究, 2023 (3): 34-41+124.
- [22] 张爱军, 贾璐. 算法“舒适圈”及其破茧——兼论 ChatGPT 的算法内容 [J]. 党政研究, 2023 (3): 22-33+124.
- [23] 吉磊, 李大琨. ChatGPT 技术潜在的政治安全风险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3-29 (8).
- [24] 谢新水. 人工智能内容生产: 功能张力、发展趋势及监管策略——以 ChatGPT 为分析起点 [J]. 电子政务, 2023 (4): 25-35.
-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9.
- [26] 温旭.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意识形态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9): 149-158.
- [27] 姜淑娟, 关锋. 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加速启蒙——当代左翼加速主义思想探析 [J]. 国外社会科学, 2020 (4): 83-90.
- [28] 杨又. 算法资本主义: 重新定义监控和剥削的逻辑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 (12): 56-64+104-105.
- [29] Astrid Mager. ALGORITHMIC IDEOLOGY: HOW CAPITALIST SOCIETY SHAPES SEARCH ENGINES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2 (5).
- [30]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380.
- [31] 王卫华, 杨俊. 平台资本主义下的数据资本权力: 生成机理、基本谱系与主要特征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 89-101+171.
- [32] 雷·库兹韦尔. 机器之心 [M]. 胡晓姣, 张温卓玛, 吴纯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03.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张威

(黄冈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 在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确立的大背景下, 包括联邦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等在内多元主体协同涉疆行动架构的形成, 是美国“以疆制华”策略实施的突出体现。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地位、对别国进行干涉颠覆的重要工具。在新疆事务上,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充当干涉渗透的“排头兵”。其干涉手段包括充当新疆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机构的幕后金主; 支持新疆分裂势力发布虚假涉疆报告, 干涉中国内政; 炮制涉疆虚假信息, 炒作反华言论; 设立所谓“民主”奖项和资助培训班、讲座, 推进意识形态渗透。在美国政府对华关系朝着遏制、围堵方向不断演进的趋势下,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表现出若干新特征: 非政府组织日渐成为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战略力量; 完善“以疆制华”策略实施架构, 发挥聚合释能的战略效应; 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成为美国对华政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战略竞争;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新疆事务; 政治战; 反干涉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4-0145-12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4.014

**作者简介:** 张威,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研究项目“西方非政府组织与民族事务研究”(2021-GMD-121)

**引用格式:** 张威.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45-156.

以“争霸”保底，以“称霸”塑局，瞄准中俄两个大国，以战略竞争为“底色”进行战略设计，是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构建的首要关切。在对华战略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所谓“修正主义竞争者”，实行“反华、遏华、抗华”战略<sup>[1]</sup>。在对“特朗普外交遗产”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拜登政府深度聚焦“中国威胁”，拉开“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幕，将中国视作所谓“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sup>[2]</sup>，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所谓“民主与专制对立的关系”，强调通过“全域竞争”，实现“在竞争中胜出”的对华战略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颁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将中国新疆地区与香港、西藏地区一并作为对华发动“人权攻势”的重要据点<sup>[2]</sup>。这一举动不仅是中国行政区域首次出现在 21 世纪以来美国顶层战略设计文本中，而且说明新疆地区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美国将新疆地区作为对华实施全面竞争攻势的重要战略抓手，以众多非政府组织为“先锋”，“强化与私营部门、慈善事业和民间社会的合作”<sup>[2]</sup>，形成“主体捆绑+立体干涉”的涉疆行动框架，企图对中国进行破坏和颠覆，已成为一股难以逆转的趋势。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作用来展开<sup>[3]</sup>；而以国家民主基金会为研究对象，探究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背景下其对新疆事务干涉的专题研究不多<sup>[4]</sup>。为此，本文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内在机理、组织框架出发，探讨近年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干涉的手段、特征，并提出反干涉的应对策略。

## 一、美国多元主体协同涉疆行动架构的形成

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未来 10 年将是中美之间“全域竞争”的“决定性 10 年”。美国声称“已经处于能否在竞争中胜出的拐点之上”<sup>[2]</sup>，鼓吹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与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均面临中国的“竞争威胁”。在所谓“中国威胁”面前，美国实施“综合威慑”，聚焦“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组织原则。“全政府+全社会”的基础在于“全”，即参与力量的全面性、竞争的广泛性，但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保持“协调”<sup>[5]</sup>。美国对涉疆问题的介入和干涉从属于其对华战略<sup>[6]</sup>。形成包括联邦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学术界在内五大主体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彼此呼应，注重发挥系统效应和联动效应的总体架构，是“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组织原则在美国“以疆制华”策略实施过程中的直接体现。

**其一，联邦政府发挥“执行官”和“协调者”作用。**美国国务院作为“枢纽”，其基本功能是制定政策、表达立场，形成资源积聚和优化配置优势，最大限度地推进“以疆制华”策略实施进程。以涉疆人权问题为切口，美国国务院近期加大了以外交制裁方式对我国进行干涉和恐吓的力度。与美国国务院在涉疆问题上形成“共振”的美国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机构，以所谓“强迫少数群体劳动”为由，打压我国棉花、光伏等产业，开列“实体清单”，实施“暂扣令”，对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2020 年 5 月以来，美国政府已先后发布 8 批次、共计将 152 家中国企业纳入出口管制的清单。2022 年 6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出台新政策，对来自新疆的产品开展生产、供应链的所谓“纵贯追溯式调查”，开列涉疆企业“黑名单”，进一步加大涉疆经济制裁力度。

**其二，国会扮演新疆分裂势力“幕后支持者”和“压力传导施动者”。**一方面，美国国会公然会见新疆分裂势力头目，充当新疆分裂势力“保护伞”，直接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要求美国行

政机构加大对涉疆事务干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通过制定涉疆决议案、举办听证会等方式, 对中国间接施压。2020年5月、12月, 美国国会分别通过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前一部法案要求“总统应定期向国会提交在新疆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高层官员名单”, 胁迫中国关闭“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下文简称“教培中心”)<sup>[7]</sup>, 向中国政府传递“极限施压”政治信号。后一部法案基于所谓“可反驳的推定”原则, 认定“所有雇佣维吾尔族人员的企业(包括未在新疆进行生产加工的企业)”存在“强迫劳动行为”, 禁止“所有原产地为新疆”“在产销供应链层面雇佣维吾尔族人员和使用产自新疆的原材料”<sup>[8]</sup>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以上两部法案的出台不仅说明美国国会的涉疆立法主旨与美国政府的涉疆政策目标趋向一致, 而且在对华“全政府+全社会”战略打压态势塑造上, 已经形成府会协同干涉新疆事务的联动机制。

**其三, 媒体充当涉疆负面舆情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制造者”。**近年来, 美国网络社交媒体异军突起, 成为以媒体塑造政治的重要“助推器”。一方面, 在美国媒体的支持下, 境外新疆分裂势力纷纷建立门户网站, 将其作为从事意识形态渗透与破坏活动的网络阵地, 丑化和歪曲中国政府形象, 煽动民族仇恨, 企图分裂中国。与此同时, 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大量为新疆分裂势力服务的专门账号, 为煽动反华情绪、传播暴恐思想推波助澜。比如, 研究报告《未闻之声: 对五年来“亲西方秘密操纵舆论行动”的评估》(Unheard Voice: Evaluating Five Years of Pro-Western Covert Influence Operations)发现, 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技术武器化, 利用“机器人水军”传播虚假或垃圾政治信息, 扶持“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等虚假信息网络<sup>[9]</sup>。

**其四, 美国学界部分人士充当政策供给的“排头兵”。**从护持美国霸权利益的视角出发分析、界定涉疆问题, 产出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术成果”, 企图增强美国在涉疆研究上的国际话语权, 是近年来美国学界在涉疆问题研究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疆工程》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格雷厄姆·富勒主持, 16位美国涉疆问题研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的课题。该课题的系列成果包括论文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新疆: 中国的穆斯林边陲》)和所谓研究报告《The Xinjiang Problem》(《新疆问题》)。《新疆问题》罔顾历史事实, 支持新疆分裂势力, 把新疆地区视为“未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有效施压的一张牌”<sup>[10]</sup>。这一结论在美国加紧对华战略遏制布局的当下尤显负面作用。

**其五, 非政府组织充当以压促变的“特洛伊木马”。**从理论上讲, 非政府组织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 具有独立性、非营利性等特点<sup>[11]</sup>。但在实践中, 非政府组织很难完全做到独立和公正。组织成立及运作的地域分布、以政府资助为重要资金来源等因素, 往往导致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独立性缺陷”<sup>[12]</sup>。非政府组织愈加成为美国推进战略扩张、向所谓“低度民主国家”进行民主输出的政治工具。2010年5月, 奥巴马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非政府组织视为“能在国际社会代表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诉求”, 并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作出贡献”的“战略伙伴”。在新疆事务上, 美国非政府组织与联邦政府、国会积极配合, 形成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龙头”, 其他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为策应的伞状网络。其主要作用在于服务并服从于美国对华战略、推动涉疆问题国际化和主导国际涉疆舆论。这些非政府组织种类繁多、成分复杂, 对于新疆事务关注重点、行为方式、实际影响各有不同, 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竞争,

但在服务美国对华战略需要，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国会遏制和打压中国上是一致的。其行为选择体现了战略价值（遏制中国）与工具策略（支持新疆分裂势力）的统一。其实施破坏、渗透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资金、非暴力抗争的策略与技巧培训、宣传手法、公关援助），散布政治谣言，导演街头政治和策划暴恐行动等。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对新疆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

总体而言，“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在美国“以疆制华”策略实施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捆绑+立体干涉”，波及贸易、科技、能源、传媒、文化等领域，广泛采取禁购、禁售和制裁、拒签以及制造谣言、操控舆论等三类工具。在美国国内业已形成遏制中国的强烈共识之下，反华势力将新疆事务作为遏制、围堵中国的战略抓手，妄图通过分化西化渗透、经济打压遏制、外交孤立围堵等“组合拳”遏制中国崛起，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 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干涉新疆事务的主要手段

长期以来，美国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借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煽动分裂对抗，干涉别国内政，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为美国政府的“马前卒”和“白手套”，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别国合法政府，培植亲美傀儡势力。2022 年 5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这份包括六大部分内容、约 12 000 字的材料，通过数百条从公开报道中搜集的具体事例，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真实面目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尽管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自诩为“私有的非营利性基金会”，但“私人身份”与“政府资助”的互嵌融合恰是其“活动有效性”<sup>[13]</sup>受到保障的关键。究其实质，它是一个既非国家机构又非纯粹的非政府组织的“准基金会”，以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存在价值，替美国政府实施渗透、颠覆行动的辅助工具<sup>[14]</sup>。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使用经费依赖于美国国会、国务院、国际开发署的年度拨款和相关项目资助，只有极少部分经费来自布兰德利基金会、欧林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的捐赠。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计划拨款数额逐年增加：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计划拨款 1.7 亿美元；2019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 月，计划拨款 3 亿美元；2020 年 1 月至 2025 年 9 月，计划拨款 3 亿美元；2021 年 1 月至 2026 年 9 月，计划拨款 3.15 亿美元。通过官僚机构的层层过滤，这些国家拨款变成“私人资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以“对别国民主提供支援”之名，为美国国会、国务院“洗钱”的机构<sup>[14] 221</sup>。

在组织架构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效仿私人基金会治理模式，设立董事会、执行机构及其附属机构。除“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和“国际私营企业中中心”等 4 个“核心受让”机构之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建有“国际民主研究论坛”“国际媒体援助中心”“世界民主运动”以及“非暴力行动与战略运用中心”等附属机构。其中，董事会掌控对外援助资金的支配权，并以项目资助的形式向目标国的民间组织、独立媒体、协会等提供资助。由董事会而非美国政府决定资金的用途和流向，使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与美国政府实现了“表面上的分离”同时<sup>[14] 221</sup>，能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全球民主输出。其“促进民主”是假，破坏渗透

张威.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45-156.

是真。在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大幕徐徐落下之际，新疆地区已经成为其所谓“以民主对抗专制”的前沿地带。作为美国政府“民主十字军”主力之一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以疆制华”策略实施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其一，对新疆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机构提供持续资金援助，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金主。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流亡海外反动势力的资助力度，既重点突进，又全面协同，以干涉议题的联动化对华实施全面遏制。以中国为目标对象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的项目投入分属四个部分——“中国”和“中国（香港）”“中国（西藏）”“中国（新疆）”。第一个项目重点资助流亡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极端女权组织和民间团体，后三个项目的资助重点聚焦香港、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与国家统一。尽管“中国（新疆）”项目设立时间最晚，但经费投入持续递增，后来居上。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的总经费投入为647.7万美元，其中，新疆项目54万美元、西藏项目82.7万美元、香港项目53万美元。到2021年，上述四个部分的经费投入分别达到1154.2万美元、317万美元、127.8万美元、55.8万美元。从新疆项目经费投入的年度比较来看，2019年经费投入开始大幅上涨：相比于2018年，2019年增长175%，达到90.5万美元；2020年增长42.5%，达到129万美元；2021年增长145.7%，达到317万美元。经费的涨幅起落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重点地区的经费投入，与美国政府构筑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总体布局之间存在匹配关系。

表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华项目经费投入情况（2017—2021年）

（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中国项目	中国（新疆）项目	中国（西藏）项目	中国（香港）项目	合计
2017年	458.0	54.0	82.7	53.0	647.7
2018年	470.6	32.9	95.2	44.5	643.2
2019年	377.8	90.5	50.6	64.3	583.2
2020年	586.0	129.0	108.0	204.5	1027.5
2021年	653.6	317.0	127.8	55.8	1154.2
累计	2546.0	623.4	464.3	422.1	4055.8

备注：相关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网站，网址为<https://www.ned.org/where-we-work/asia/china/>

在持续的经费支持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愈加广泛和深入，目标划分也愈加清晰。其目的是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动向，炒作所谓新疆“人权危机”，企图“以疆制华”。2004年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项目竞标形式，先后向所谓“维吾尔美国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下文简称“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国际维吾尔笔会”“维吾尔人权项目”等组织提供高达11161001美元的经费，并声称其是“维吾尔民主与人权组织的唯一资助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涉疆项目主要包括所谓“捍卫和倡导维吾尔人权”“赋权妇女和青年进行宣传和公民参与”“促进维吾尔人的言论自由”等六个方面。其具体内容包括所谓“提高维吾尔人对人权的认识和支持”，对新疆分裂势力青年群体进行“领导力和宣传技巧的研讨培训”；



伪造所谓新疆地区“侵犯人权”证人证据，将新疆“教培中心”蔑称为“集中营”，炮制“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聚焦妇女和青年两大群体进行“宣传技巧”“公关援助”方面的针对性培训，唆使其参与反华活动；呼吁通过“跨部门协调行动”以结束所谓针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以市场机制为杠杆向中国政府施压。

另一方面，为国际反华机构持续提供资金支持，企图打造反华同盟。所谓“终止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是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反华势力“大杂烩”。包括“世维会”“国际劳工权利论坛”等在内的众多反华机构都是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sup>[15]</sup>。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是当今国际社会反华“智库”的代表，尽管其对外界宣称是一个“独立、无党派的”防务研究机构，但绝大多数涉华项目研究均得到国外资金力量（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援助<sup>[16]</sup>。该研究所《2020—2021 年度报告》披露，美国国务院通过战争与和平报告研究所向其捐赠了 985 140.4 澳元<sup>[17]</sup>，聚焦“新疆人权”等议题，提高对华“人权攻势”的调门。战争与和平报告研究所官方网站对其资助者进行公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赫然在列。2021 年 10 月 17 日，自由撰稿人布莱恩·贝莱蒂奇在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上发表署名文章《在“维吾尔特别法庭”背后：美国政府支持的分裂势力将激化美国与中国的冲突》<sup>[18]</sup>。该文章揭开“维吾尔特别法庭”背后的黑幕，指出“美国已经建立一个打着人权旗号的国际组织网络，以存在对人权可疑指控为由，专门针对美国试图胁迫的国家，进行所谓的‘法庭调查’和报告发布，‘维吾尔特别法庭’就是最新‘产品’”。在这一“特别法庭”背后，“世维会”发挥重要作用，提供 12 万英镑的资金。而“世维会”的最大金主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其二，支持新疆分裂势力发布涉疆报告，干涉中国内政。**打着“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力量”的幌子，资助新疆分裂势力发布所谓“调查结果”“研究报告”，攻击中国治疆政策、广布谣言，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干涉新疆事务的又一重要手段。以“维吾尔人权项目”为例，2016—2022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其提供总计 1 544 698 美元的资助，产出 37 篇涉疆报告。总体而言，这些涉疆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政策炮制一系列研究报告。例如，《中国新反恐法及其对维吾尔人的人权影响》妄称 2015 年 12 月 27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将会使维吾尔族“边缘化”，加剧地区“紧张态势”<sup>[19]</sup>；《中国政府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加快同化政策》对 2018 年 4 月 3 日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做法》白皮书进行攻击，渲染所谓“维吾尔人维护民族身份的权利正在进一步受到侵犯”<sup>[20]</sup>等谬论。二是聚焦“文化认同”出台一系列研究报告。《摧毁信仰：维吾尔清真寺和神社的破坏和亵渎》《强迫亲属关系：石榴花计划与维吾尔儿童的强迫同化》等多份所谓报告通过伪造证据，抹黑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妄称“维吾尔民族文化认同正在消亡”<sup>[21]</sup>。三是以“跨国镇压”为持续关注议题拼凑研究成果。2021 年 8 月 11 日发布的《新报告记录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中国对维吾尔族的跨国镇压中的同谋》<sup>[22]</sup>、2022 年 3 月 24 日发布的《超越沉默：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在跨国镇压维吾尔人方面的合作》<sup>[23]</sup>等多份所谓报告将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在反恐、地区安全治理等领域开展的合作污名化，蔑称为所谓“跨国镇压”。这些报告漏洞百出，与学术研究的标准相距甚远，是彻头彻尾的伪学术产品，旨在配合美国政府的涉疆政策。

**其三，支持炮制涉疆虚假信息，为遏制中国造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张威.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45-156.

利用流亡海外的新疆分裂势力炮制涉疆虚假信息, 并勾结西方反华机构、媒体大肆向世界扩散, 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进行渗透、颠覆的又一重要手段。“维吾尔美国协会”及下属准军事组织“阿勒泰防务”在新冠疫情期间, 大肆散布所谓“中国阴谋论”, 妄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制造的生化武器”<sup>[24]</sup>。该论调为有关美西方国家煽动反华、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2019年12月21日, “灰色地带”发表题为“中国政府拘押上百万维吾尔人? ——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极右翼研究员对北京的指控存在严重问题”的文章<sup>[25]</sup>, 首次详细披露了“百万维吾尔人被拘押”的虚假新闻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又是如何被西方媒体视作“信源”并广为传播的过程。该文章指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在采访8个“证人”的基础上, 就将估算比例应用到整个新疆地区, 荒谬得出25~100万人“被拘留”、200万人被迫接受“再教育”的谣言。美国著名记者麦克斯·布鲁门特尔披露, 在2018年8月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承办的一次会议中, 时任“世维会”主席奥马尔·卡纳特亲口承认“有关集中营拘押近百万维吾尔人”的真正源头是“西方媒体的估计”和“少数匿名消息来源的证词”<sup>[26]</sup>。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支持其他非政府组织炒作涉疆议题。美国“工人权利协会”名为“独立机构”, 实为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献金、掀起谣言声浪的代理人。2019年6月24日, “工人权利协会”发布所谓调查报告, 以新疆和田泰达服饰公司为攻击对象, 指控该公司“强迫维吾尔人劳动”, 拉开国际反华势力策动“新疆棉”舆论战的序幕。这篇报告的信息来源既包括“世维会”“维吾尔美国协会”等新疆分裂势力提供的所谓调查资料, 也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的所谓报道、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和反华“学者”郑国恩的所谓研究成果<sup>[15]</sup>。根据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的分析, 这些信源均缺乏坚实的、可供公开核查的证据, 存在相当严重的可靠性问题<sup>[27]</sup>。

**其四, 设立“民主”奖项、开设培训班和资助讲座, 推进意识形态渗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非暴力”之名, 通过举办培训班、学术讲座等“软实力工具”, 在支持新疆分裂势力的同时, 极力“促销民主”, 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019年6月和2021年10月,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分别将所谓年度“民主奖”“民主勇气奖”颁给“世维会”及其分支机构“维吾尔运动”。“族群青年领袖研习班”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将“民主改造”视为解决民族冲突重要手段的载体之一。这一研习班的参加人员多为分裂势力代表。2018年12月,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时任主席卡尔·格什曼在第十三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班”发表主题演讲, 鼓噪在中国争取“民主”。“世维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赞助下, 以新疆分裂势力青年骨干分子为培训对象, 常年举办“领导力培训研讨班”<sup>[28]</sup>。2020年, 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利普塞特讲座上, 美国学者裴敏欣以“极权主义暗长阴影笼罩下的中国”为题, 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 提出通过培养“青年活动家”为美国在新疆的长线布局提供后续动能<sup>[29]</sup>。

### 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干涉新疆事务的新特征

在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逻辑下, “民主”已成为一种美西方有关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形象的工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以维护“维吾尔族人权”为理论预设, 将民主“武器化”, 既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金主, 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又披着“专业主义”的外衣, 资助新疆分

裂势力炮制虚假涉疆报告、进行思想渗透。在美国政府对华关系朝着遏制、围堵方向不断演进的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表现出新特征。

**其一，以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日渐成为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战略力量。**美国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战略组织原则，设定实现“竞胜”中国的目标，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动员所有资源，使用国家权力中的所有工具。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政策倡议与舆论引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积极参与美国对华全域竞争<sup>[3]</sup>。在“以疆制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国会、媒体等相互勾连、明暗互补。一方面，以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为由，为美国国会出台反华法案提供所谓“事实依据”，为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制裁助推发力。另一方面，以维护“维吾尔族权益”为由，支持新疆分裂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联动制造危机、祸害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既是国家战略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国家战略力量日益向国家战略目标趋近的过程<sup>[30]</sup>。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涉疆问题上的作用不断凸显，推动美国改变过去在涉疆问题上的“事件反应式”干涉，更加系统化和常态化。

**其二，完善“以疆制华”策略实施架构，发挥聚合释能的战略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国会等机构多元联动、相互策应，形成涉疆问题上多链条聚合体系。在资金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接受国会、政府的资助，充当美国政府涉疆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诸如《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样的反华涉疆法案，就是建立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人的工作基础上”<sup>[22]</sup>，推动资源高度聚焦所谓“中国威胁”。在人员组成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不少高层人员都曾在美国政府、国会等机构担任要职。例如，董事会现任主席戴蒙·威尔逊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副主席戴维·斯凯格斯曾任美国国会道德办公室董事会联合主席，董事会成员威廉·伯恩斯曾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首席执行官卡尔·格什曼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人员交叉任职使美国政府、国会乃至两大主要政党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高层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共同体。该政治利益共同体针对不同的国家战略需求和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彼此之间的作用关系，实现多元力量的聚合释能。这使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力量深度参与美国涉疆政策的制定，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服务。在情报搜集方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涉华情报的重要来源。以文化交流、宗教活动、社会调查、学术研究之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流亡海外的新疆分裂势力、中亚地区的“代理人”广泛搜集涉疆情报，为美国政府“以疆制华”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国会涉疆法案干涉力度和可操作性的进一步强化提供信息支持。

**其三，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成为美国对华政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战是“体系化的力量运用”，美国视其为护持霸权地位的利器。在与中国的全域竞争与对抗中，通过内外合围、多域协同，谋求通过“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赢得胜利”<sup>[31]</sup>，这是美国实施对华政治战的核心要旨。出于围堵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全球战略考量，美国政府将非政府组织作为策动“颜色革命”、实施政权颠覆的重要活动力量，以“自由”“人权”“民主”为口号，对新疆开展渗透活动，刻意制造乱局，强化对华战略压制。在操作层面上，“整合政府和非政府力量”“直接与间接策略相配合”<sup>[32]</sup>，是美国保障对华政治战实施效能的策略选项。就前者而言，非国家行为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政治战”，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正是典型代表。就后者而言，新疆地区是美国主动发起对华政治战攻势、谋求产生连锁破坏效应的重要场域。

#### 四、遏阻美国非政府组织干涉新疆事务的对策

2019年12月,国家民主基金会等5个美国非政府组织被中国政府实施制裁。但是,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对华渗透、破坏的脚步仍未停止。2021年4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载明,在2022—2026财年将以每年拨款3亿美元的方式,设立“对抗中国影响基金”,用于支持“民间组织”和“独立媒体”扩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影响;在“独立新闻报道”中加大“普通话、藏语、维吾尔语和粤语”服务的覆盖面<sup>[33]</sup>,向中国社会深度渗透。类似法案完成立法程序后,将为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提供依据。虽然法案所确定的总体拨款额度有限,但考虑到官方资金对民间资金投入的带动作用,未来美国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事务的活动经费将会显著上升。相应地,美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关联机构针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渗透、破坏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亦将进一步增大。在重大风险和挑战面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清醒头脑、斗争意识和战略定力,制定和运用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挫败美国“以疆制华”图谋。

**其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防范化解涉疆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sup>[34]</sup>。防范化解涉疆领域重大风险尤其是政治安全风险,是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治疆兴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党对防范化解涉疆领域重大风险的全面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政治要求,是有效应对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新疆社会稳定的根本政治保证。我们必须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在防范化解涉疆领域重大风险方面的绝对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党作为领导者、引领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其二,统筹新疆发展与安全,制定多维协作、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政治战是美国实现“竞胜”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是系统化的力量运用,而新疆地区则是美国实施对华政治战的重要场域。有效反制美国对华政治战攻势,挫败“以疆制华”图谋需要我们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旨归,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运用国家各种战略资源,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sup>[34] 53</sup>。在美国的战略攻势面前,我们必须把科学统筹作为战略运用的根本方法,讲求新疆发展与安全的同步推进,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整体推进,又突出重点;既重维护,又重塑造;既讲原则性,又讲策略性;既讲需求,又讲能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愿景的实现为根本目标,我国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立足积极防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疆内疆外两条战线、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条战线上合理配置资源,形成战略合力,争取战略主动,积小胜为大胜,形成反制政治战战略绩效的最大化呈现。

**其三,依法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提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严密防范体系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sup>[34] 53</sup>。其中,严防境外非政府组织意识形态渗透是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平台显示,截至2023年3月14日,我国登记在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数量达到684个。我们要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切实严防境外非政府组织以任何名义进行渗透、破坏、颠覆。一方面，以法治为抓手，建强拱卫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2017 年 1 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是有效惩治境外非政府组织从事破坏、颠覆活动的法治利剑。我们还应积极借鉴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依法治理的经验，进行合法性身份甄别，设立“外国代理人”身份审核制度，重点关注资金来源和组织活动两大领域，强化法律规制。“外国代理人”是指“接受外国势力委托和支持并为其从事非商业性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其已有相关管制规定<sup>[35]</sup>。比如，《俄罗斯联邦非政府组织法》规定：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只要符合接受海外资金和从事政治活动这两点，皆要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登记，列入特别清单，加强监管，定期向俄司法部汇报<sup>[36]</sup>。另一方面，利用开源情报，全面掌握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动向。积极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穿透境外非政府组织与在华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流向、人员异动、组织活动等方面的联系，对登记注册信息进行前置性预审，及时跟踪和分析境外非政府组织动向，防患于未然。

## 五、结语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只是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围剿的冰山一角。对中国而言，有效应对美西方反华势力的战略围堵、战略遏制乃至战略剿杀将是长期且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面对新形势、新威胁、新挑战，要实现总体国家安全，消除潜在的、长期的、综合的安全威胁，必须精准把握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战略运用的新样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统筹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运用，以能力提升为基础，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耐力，以不变应万变。

### 参考文献：

- [1] 徐海娜，楚树龙. 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J]. 美国研究，2021（6）：35-53+6.
-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2022-10-12) [2022-10-15]. <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 [3] 孙海泳. 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作用与前景 [J]. 国际展望，2021（5）：89-108+156-157.
- [4] 刘强，李环.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对“疆独”组织的资助 [J]. 国际资料信息，2009（9）：12-14.
- [5] 刁大明，马嘉帅. 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 [J]. 当代美国评论，2021（2）：21-41+121.
- [6]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美国“以疆制华”的危机政治阴谋及路径 [EB/OL]. (2021-12-15) [2022-03-16]. [http://icas.lzu.edu.cn/FHup/files/202112/12-15\\_085812-27.pdf](http://icas.lzu.edu.cn/FHup/files/202112/12-15_085812-27.pdf).
- [7] S. 3744-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 [EB/OL]. (2020-06-17) [2022-09-15].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744/text?s=5&r=3&q=%7B%22search%22%3A%5B%22Uyghur%22%5D%7D>.
- [8] H. R. 6720-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 [EB/OL]. (2020-01-10) [2022-09-15].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6720/text?s=5&r=2&q=%7B%22search%22%3A%5B%22Uyghur%22%5D%7D>.
- [9] 是谁在操纵新疆叙事？斯坦福大学的这份报告亮了 [EB/OL]. (2022-09-11) [2022-10-06]. <http://www>



张威.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45-156.

chinanews.com.cn/gj/2022/09-11/9850142.shtml.

- [10] Graham E. Fuller, S. Frederick Starr. The Xinjiang Problem [EB/OL]. (2003-03-17) [2021-12-15]. [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docs/publications/OLD/xinjiang\\_final.pdf](https://www.silkroadstudies.org/docs/publications/OLD/xinjiang_final.pdf).
- [11] 张丽君. 全球政治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上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 3.
- [12] 徐莹. 残缺的独立性: 国际非政府组织首要结构性困难解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8 (3): 108-112.
- [13] Susan B. Epstein.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Policy and Funding Issues [EB/OL]. (1999-08-16) [2022-10-07]. <https://congressionalresearch.com/96-222/document.php?study=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Policy+and+Funding+Issues>.
- [14] 银培荻. 暗金政治: 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74.
- [15] Max Blumenthal. Xinjiang shakedown: US anti-China lobby cashed in an ‘forced labor’ campaign that cost Uyghur workers their jobs [EB/OL]. (2021-04-30) [2022-11-05]. <https://thegrayzone.com/2021/04/30/xinjiang-forced-labor-china-uyghur/>.
- [16] 郭珊. 澳大利亚国防安全智库对华认知的转变 [J]. 社会科学论坛, 2021 (3): 179-189.
- [17] ASPI. ASPI Corporate Plan: 2020—2021 [EB/OL]. (2021-02-06) [2022-08-12]. [https://ad-aspi.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2022-02/ASPI%20Annual-Report\\_2020-2021.pdf?VersionId=B7LG1EptgVEw39hBwyXhrxAzLueB3BSL](https://ad-aspi.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2022-02/ASPI%20Annual-Report_2020-2021.pdf?VersionId=B7LG1EptgVEw39hBwyXhrxAzLueB3BSL).
- [18] Brian Berletic ASPI Corporate Plan Behind the ‘Uyghur Tribunal’, US govt-backed separatist theater to escalate conflict with China [EB/OL]. (2021-10-17) [2022-10-05]. <https://thegrayzone.com/2021/10/17/uyghur-tribunal-us-government-china/>.
- [19] China’s new Counter-Terrorism Law and its human rights implications for Uighurs [EB/OL]. (2016-02-01) [2022-10-23]. <https://uhrp.org/report/political-persecution-uyghurs-era-war-terror/>.
- [20] Chinese Government Accelerates Assimilative Policies in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Campaign [EB/OL]. (2015-05-09) [2022-10-23]. <https://uhrp.org/report/briefing-chinese-government-accelerates-assimilative-policies-in-sinicization-of-religion-campaign/>.
- [21] Coerced Kinship: The Pomegranate Flower Plan and the Forced Assimilation of Uyghur Children [EB/OL]. (2022-01-27) [2022-10-26]. <https://uhrp.org/report/briefing-ban-islamic-names-absurd-intrusion/>.
- [22] New report documents the complicity of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i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Uyghurs [EB/OL]. (2021-08-11) [2022-10-26]. <https://uhrp.org/statement/new-report-documents-the-complicity-of-pakistan-and-afghanistan-in-chinas-transnational-repression-of-uyghurs/>.
- [23] Beyond Silenc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rab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f Uyghurs [EB/OL]. (2022-03-24) [2022-10-26]. <https://uhrp.org/report/beyond-silence-collaboration-between-arab-states-and-china-in-the-transnational-repression-of-uyghurs/>.
- [24] Ajit Singh. “Wipe out China!” US - funded Uyghur activists train as gun-toting foot soldiers for



- empire [EB/OL]. (2021-03-31) [2022-11-05]. <https://thegrayzone.com/2021/03/31/china-uyghur-gun-soldiers-empire/>.
- [25] Ajit Singh and Max Blumenthal. China detaining millions of Uyghurs? Serious problems with claims by US-backed NGO and far-right researcher ‘led by God’ against Beijing [EB/OL]. (2019-09-21) [2022-10-26]. <https://thegrayzone.com/2019/12/21/china-detaining-millions-uyghurs-problems-claims-us-ngo-researcher/>.
- [26] Max Blumenthal. Inside Americas meddling machine: NED, the US-funded org interfering in el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EB/OL]. (2018-08-20) [2022-11-02]. <https://thegrayzone.com/2018/08/20/inside-americas-meddling-machine-the-us-funded-group-that-interferes-in-elections-around-the-globe/>.
- [27] Gordon Dumoulin, Jan Oberg, Thore Vestby. Behind The Smokescreen: An Analysis of the West’s Destructive China Cold War Agenda and Why It Must Stop [R]. The Trans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eace&Future Research, 2021: 30.
- [28] Ajit Singh. Inside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The US-backed right-wing regime-change network seeking the ‘fall fo China’ [EB/OL]. (2020-03-05) [2022-11-03]. <https://thegrayzone.com/2020/03/05/world-uyghur-congress-us-far-right-regime-change-network-fall-china/>.
- [29] 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 [EB/OL]. (2022-05-07) [2022-05-12].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
- [30] 孙新彭. 关于国家战略力量评估的几点思考发展研究 [J]. 发展研究, 2018 (6): 22-25.
- [31] Linda Robinson, ToddC. Helmus, RaphaelS. Cohen. Modern Political Warfare—Current Practic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EB/OL]. (2018-04-05) [2022-08-15].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772.html](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772.html).
- [32] 唐健. 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国政治战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0 (5): 41-68+155-156.
- [33] S. 1169—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EB/OL]. (2021-10-05) [2022-09-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toc-idF826870FA41342A89DD0FA5F7B7A921C>.
- [3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6.
- [35] 毛欣娟, 陈映锦, 刘小焯. 美俄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及启示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5): 51-63.
- [36] 李兴, 姚威.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分类透视与政策评析 [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2 (6): 39-56+16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 二、著录格式

###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4期 总第40期 第7卷

双月刊 2023年7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20.00 元